3952

财经研究

上海財政經济学院財經研究編輯委員会編

第四期

一九五七年

1957:4

6
Copy

95129
178e58

CHINESE SECTION
ORIENTALIA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新知識出版社出版

目　　录

駁斥資产阶級右派在工农关系問題上的謬論……吳麟鑫(1)

駁斥右派分子对我国农業合作化的汚蔑……崔　皚(6)

駁斥資产阶級右派在粮食統購統銷問題上的謬論……彭輝芳(9)

試談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兩面性及分化……裘逸娟　曹麟章(13)

資产阶級国家干預經济与資本主义經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張淑智(19)

斬断右派分子伸向人口問題的魔爪……張文賢(25)

*　　*　　*

过渡时期社会生产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間的比例关系(下)……鄒宗伊(28)

农業社收入分配核算問題的研究(上)……吳滬生　陈治鈞　何俊祥(38)

*　　*　　*

論統計学是一門社会科学……鄒依仁(45)

*　　*　　*

苏維埃政权四十年来的成就……苏联"眞理报"(50)

*　　*　　*

讀者来信　対于成本計划完成情况的檢查方法的一些意見……林志健(59)

财经研究

（季　刊）

1957年　第4期

（总第6期）

1957年12月15日出版

編輯者　上海財政經济学院財經研究編輯委員会

出版者　新知識出版社（上海瀏南路9號）

印刷者　商务印書館上海厂

总發行者　邮电部上海市邮局

訂閱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代訂代售处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預定价目

每季一期　定价(5)0.49元

国内平寄邮費免收

定費一律預收

印張：3¾　字数：122,000　印数：3,943册

駁斥資产阶級右派在工农关系問題上的謬論

吳 麟 鑫

我們的国家是工人阶級領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农民是工人阶級可靠的同盟軍。在民主革命时期，工人阶級和农民在革命斗爭中曾經結成了巩固的軍事和政治的联盟；主要依靠了这个联盟的力量，我們的人民民主革命終于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工农联盟又在建設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繼續下去，而且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事实証明，不断發展工农友誼和巩固工农联盟是建設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証。正因为这样，所以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在共产党整風期間，为了挑撥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發出了一系列的荒謬言論。他們說："农民生活比解放前还苦"，"工农的生活太悬殊了"，"农民負担过重"，"工农業产品的差价扩大了，这是国家剝削农民"，"工农关系处在崩溃的边緣"等等。他們妄想动摇我們国家的基础，搞垮社会主义，恢复資本主义。因此，关于这个問題，我們必須摆事实、講道理，駁斥右派分子的謬論，粉碎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陰謀。

农民生活比解放前还苦嗎？

右派分子說："解放以来农業生产沒有什么成就"，"农民吃不飽、穿不暖，接近餓死的边緣"，"农民生活比解放前还苦"。

事实是这样的嗎？

全国解放后，由于土地改革和农業合作化的胜利，农業生产力先后从地主阶級的剝削和个体經济的束縛下解放出来，农民的生产积極性大大提高，党和政府又从經济上給予农民巨大的支持；因而几年来农業生产获得迅速增長。

我国历史上农業生产水平最高的一年是1936年，这一年农副業总产值（按1952年不变价格計算，下同）为408.3亿元。經过战爭和敌伪与国民党反动派長期破坏之后，到1949年农副業总产值下降到325.95亿元；在党和政府的領导和支持下經过全国农民的努力，1952年农副業总产值上升为483.92亿元，在短短的三年中就超过了历史上农業生产的最高水平。1956年全国許多地区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台風和旱灾等灾害，但是农業生产仍有增加，农副業总产值达到582.85亿元，与1936年比較增長42.8%，比1949年增長78.8%①，解放七年来平均每年增長11.26%。这个增長速度不但快于許多亞洲国家，而且也高于西欧及北美許多主要資本主义国家。解放后，我国主要农作物的产量都有显著的增長②。如果按每人平均产值計算，1949年全国农業人口將近四亿七千万，每一农民的平均产值約70元；1956年全国农業人口約五亿二千八百万，每人平均产值約110元，較1949年增加了40元，③就是大約增長57%。据福建省农業厅所提供的材料，該省历年来每一农業人口的平均产值（包括列入計划的指标，其他农家副業畜产品不包括在內）的增長情况如下表④：

年份	每人平均产值（元）	比1949年增長数（元）
1949	50.60	—
1950	58.78	8.18
1951	60.81	10.21
1952	66.89	16.29
1953	70.59	19.99
1954	68.80	18.20
1955	69.92	19.32
1956	76.73	26.13

上表說明，解放后福建省每一农業人口的平均产值，除1954年因受严重灾害較上一年略有降低外，历年都是不断增長的，1956年比1949年增長50%以上。其他省份及各地农業生产合作社的材料也都表明了几年来农業生产显著提高的事实，这里不一一列举。这些事实駁斥

① 参看"关于1956年度国民經济計划执行結果的公报"第23頁，統計出版社出版。

② 增長情况参看上引書，第40頁。

③ 参看譚震林："关于我国农民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人民日报1957年5月5日。

④ 資料来源見張明养："憑什么說农民生活降低了"，人民日报1957年7月27日。

了右派分子所謂"增产多少是否眞有其事","解放以来农業生产沒有什么成就"的謬論,粉碎了他們否定社会主义农業建設巨大成就的企圖。

在农業生产發展的基础上农民生活水平有沒有提高呢?事实也証明农民生活不仅有提高,而且有显著的提高。

随着农業生产迅速恢复与發展,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民購买力和消費額也大大提高了。1950年全国农民的購买力总額为81亿元,1956年上升为191亿元,卽增加136%①。每一农民的实物消費額(包括农民自給性的消費和商品性的消費兩部分,按1952年不变价格計算)1952年为72.8元,1956年增加到84.2元②,比1952年提高了15.7%。当然,这是全国平均数,有的地区增長速度可能快些,而另一些地区也可能慢些。

农民的实物消費額中有一部分是出售农产品后購买的商品部分(其中主要是工業品),由于历年来农产品的采購价格有所提高,而工業品的价格則基本未动,农民在价格方面也得到了不少利益。据統計,1956年的农产品采購价格比1952年上升了16.6%,乡村工業品零售价格則下降0.1%③。这就是說,1956年农民出售与1952年同量的农产品能多換工業品16.7%(农業生产增長因素不包括在內)。

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在每一农業人口的平均实物消費量的增長上。据統計1949年与1956年农民平均实物消費量如下表④:

品　名	1949年	1956年	1956年比1949年增長%
粮　食(斤)	330	488	47.9
植物油(斤)	1.7	3.8	123.5
猪　肉(斤)	6.9	7.7	11.6
食　鹽(斤)	8.2	11.4	39.0
食　糖(斤)	0.3	1.7	466.7
棉　布(尺)	6.9	20.0	189.9

上表說明农民的主要生活資料的消費量有显著的提高。应該指出,在1949年的数字中还包括地主、富农的实物消費量在內,如果只算一般农民的消費,那末数字还要低些,換言之,1956年每一农民的平均实物消費量增長的百分数还要高一些。这个情况証明解放后农民生活不是下降而是显著地改善了。

不仅如此,解放后农民的生活与解放前最好的一年,卽1936年相比,也有显著的提高。1936年每一农民的实物消費額为61.2元,1956年为84.2元,1956年比1936年提高了37.58%⑤。至于每一农民的主要生活資料的消費情况,手头缺乏全国性的材料,現在以湖南省为例,加以說明。1936年(历史上农民消費水平最高的一年)与1956年(这一年遇到近百年未有的旱灾)相比,湖南省每一农民主要生活資料的消費量是:粮食由476斤增至556斤,增長16.8%;食油由3斤增至4斤5兩,增長43.8%;肉类由8斤11兩增至9斤6兩,增長7.9%;食鹽由8斤8兩增至13斤3兩,增長55%;棉布由9.3尺增至16.6尺,增長78.4%⑥。由此可見,解放后农民的生活比解放前也是有显著提高的。目前全国絕大多数农民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其中一部分还有积余。这与旧中国农村广大貧苦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飽肚、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是一个鮮明的对比。

在物質生活提高的同时,农民的文化衞生狀况也在不断地改善。解放七年来农村教育事業迅速發展,从中小学(大部分是在农村)学生数的增長情况来看,就可得到証明。1956年有中学生516万多人,与旧中国教育發展最高的年份——1946年相比,增加近二倍半;小学生現有6,346万多人,而1946年只有2,300万。1956年全国参加業余学習的农民达7,500万人以上,这是解放以前所沒有的。解放前劳动农民的子弟讀大学是極少的,而目前在大学生中农民子弟已占一定的比重。此外,农村中还建立了許多文化館、文化站、圖書室、俱乐部和农村广播站等,为农民学習文化学習技术創造了条件。在衞生医疗方面也有显著的改善。

农業生产的發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也反映在农村阶層的变化方面。在旧中国农村人口中,除地主、富农約占10%以外,中农約占20%左右,他們在通常情况下,經济上能自給自足;約占农村人口70%的貧农、雇农,他們的生活惊人地貧困。目前的情况是怎样呢?据估計:全国农民純收入每人每年平均在70元以上,过着富裕或比較富裕生活的上中农,約占农業人口的25%到30%;每人每年平均在40元以下,仍然过着貧农生活的約占15%左右⑦,而大多数农民則是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应該指出,今天过着貧农生活的农民,在农業社的照顧下,他們的生活比起解放前的貧雇农来說也是好得多了。

---

①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第28頁,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資料来源見"我国劳动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人民日报1957年10月7日。

③ 資料来源見許剛:"全国解放以来职工和农民的生活是否改善了",大公报1957年8月10日。

④⑤資料来源見"我国劳动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人民日报1957年10月7日。

⑥ 資料来源見"說'农民生活沒有改善'是弥天大謊"(周祉在全国人代会上的發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⑦ 参看譚震林:"关于我国农民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人民日报1957年5月5日。

这些事实肯定不移地說明了解放后广大农民的生活已有显著提高，这种改善在旧中国是不可想像的。右派分子叫喊农民生活比解放前还苦，眞是一个弥天大謊！他們的叫声無非是反映少数地主、富农剝削者以及反革命分子的意見。农村中一小撮地主、富农不能再騎在广大农民头上进行殘酷的剝削，因而他們的生活比过去降低了，这是完全应該的。广大农民特别是原来的貧农，他們根据自己生活提高的切身体驗，清楚地知道誰好誰坏；正如全国人民代表、农業劳动模范張泗洲同志所說的："我們农民文化还不高，可是眼睛却亮得很"。他們坚决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右派分子想借口所謂农民生活苦，挑撥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这是枉費心机的。

工农生活是否太悬殊了？

右派分子不但叫喊农民生活比解放前还苦，而且还說："工农的生活太悬殊了"，企圖伤害工农感情，挑撥工农关系。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

为了說明这个問題，現在把职工和农民的消費水平作一比較。根据中国科学院經济研究所和国家統計局的調查，职工和农民平均消費額的增長情况如下①：

（按1952年不变价格計算，單位：元）

	1936年	1952年	1956年	1956年为1936年的%	1956年为1952年的%
职工	130.0	167.7	199.8	153.7	119.1
农民	61.2	72.8	84.2	137.6	115.7

从上表可以看出：（1）职工和农民的消費水平都比抗战以前有很大的提高。我国职工的消費水平1956年比1936年提高53.7%，比1952年提高19.1%；农民的消費水平1956年比1936年提高37.6%，比1952年提高15.7%。这一事实有力地批駁了右派分子所謂党和政府只关心工人生活不注意改善农民生活的謊言。

（2）职工和农民消費水平提高的速度是比較接近的。从1952年到1956年，职工消費額每年平均增長4.8%，农民增長3.9%，兩者差距是很小的。必須指出：1956年在职工中进行了工資改革，职工工資有所提高，因而增長速度較快；而在同一年，由于灾情重、农業歉收，农民收入增加不多，因而增長速度較慢。我們認为这是暫时的現象，很快就会改变的。如果以1952—1955年計算，那末工农消費額的增長速度几乎相等。这个事实也就否定了右派分子所謂工人生活改善过快，农民生活改善过慢的論調。

（3）职工和农民按貨幣計算的消費水平是有一定差别的。例如职工和农民的消費比例，1952年为2.30比1，1956年为2.37比1。如果除去城乡物价差别等因素，那末1952年为1.83比1，1956年为1.95比1②（1956年比例扩大的原因上面已經說明）。在职工中包括一部分高級知識分子，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增長了职工的平均消費額，也就扩大了消費比例。如果扣除这部分因素，工农之間消費水平的差别就并不很大，所謂工农生活太悬殊的說法是沒有根据的。

周恩来总理指出，現在全国农民平均每人每年收入約70元，每一农戶收入大約300元左右；1956年职工全年的平均工資是610元，比农民一家人的全年收入高一倍多③。如果只从收入的貨幣数字比較，似乎工农生活差别很大。但是，城乡生活条件不同，在比較工农生活时必須加以考慮。首先，职工的收入只有工資，在职工的消費額中几乎全部都是商品性的消費，从吃飯、穿衣、住房、坐車、到用水、用电等等都要支付貨幣。而农民的生产和消費还帶有很大的自給經济性質（目前农民自給性的消費占其全部消費額的60%左右），不需要处处支付貨幣。其次，在一般生活消費品中，大部分实物的銷售价格，城市高于农村。以浙江省为例，如果以在杭州出售的各項商品的价格水平作为100，那末在嘉兴农村是90，在溫州是77，在金华和建德是83；④因之，購买同量的消費品，农民支付的貨幣大約要比工人少20%左右。据譚震林同志的調查，湖南省攸县大兴农業生产合作社社員李裕芳1955年全年消費的实物，折成貨幣为302.46元。如果把李裕芳在乡村消費的实物，折算为北京和上海的物价，加上在城市中必須开支的燃料、房租、水、电等費用，則在北京要花728.86元，在上海要花743.76元⑤。城乡相比相差一倍多。可見，在貨幣收入上工人比农民多一些是应該的。目前一般在农村維持有吃有穿的生活水平，大約每人每月的平均开支只要5元，在城市維持同等的水平却需要10元。把这种情况估計在內，工农生活的差别就不大了。根据有关方面的調查，上海市工人和江、浙一些县份的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为120:100，也可說明工农生活的差别是不大的。

工农生活水平应否保持一定的差别呢？我們認为是应当保持一个合理的差别的。这不仅因为历史上城乡生活水平有所不同，更因为工人的劳动比农民复杂和紧張，工人一年至少做300个工作日，而农民的劳动由于受自

①② 資料来源見周靜宇："誰說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人民日报1957年8月3日。

③ 参看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第30頁。

④ 資料来源見沈毅："浙江农民生活水平的研究"浙江日报1957年4月6日。

⑤ 参看譚震林："关于我国农民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人民日报1957年5月5日。

然条件限制，还有一定的間歇性。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也高于农民，工人所創造的价值比农民大得多。根据对一些工厂的产值推算，工人每人每年平均产值大約有几千元；而农民（有劳动力的）的平均产值，根据几个地方的推算，大約只有几百元。工人所創造的价值絕大部分作为国家的收入（据对一些工厂的調查，大約占净产值的85%以上）；而农民所創造的价值絕大部分归农民自己所有，例如1956年上海郊区农民所創造的价值中，交給国家的农業税只占7%。由此可見，工人的劳动收入应高于农民，这是符合按劳取酬的原則的，因而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保持合理的差别是完全应該的。

从上面的分析論証，可知职工和农民的消費水平比抗战前有显著提高，解放后工农消費水平增長的速度是比較接近的，按貨幣計算的消費水平，工农之間虽有一定差别，但相差不大；由于历史上城乡消費水平不同，更由于工农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工农生活水平保持合理差别是必要的。右派分子恶意夸大工农生活悬殊、挑撥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的陰謀，在上述事实面前，必然会遭到可耻的失敗。

农民負担重不重？工农業产品的差价是否扩大了？

右派分子更恶意地攻击說："农民負担太重了，工农業产品的差价扩大了，这是国家剝削农民"。

解放后农民的負担重不重？工农業产品的差价是否扩大了？讓我們还是拿事实来回答右派吧。

首先看农民的負担情况。解放后国家向农民征收的农業税折成粮食不到300亿斤，連地方附加也不过360亿斤。把税額和实产量比較，税額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1950年税額約占总产量的13%，1953年降为12%，1956年又降低到10%①。

如果按农副業总产值計算，那末农民的負担（包括农業税及其他农村税收）占总产值的比例，已由1952年的7.5%下降为1956年的6%。1957年农副業总产值預計比1950年增加239.23亿元，而农民的負担只增加9.38亿元，增产部分只有3.92%交給国家，絕大部分归农民所得②。以上是就全国范圍說明农民負担下降的情况，个别地区因丰歉关系，負担率有所不同。由于我們实行增产不增税的政策，今后随着农業生产的不断發展，农業税收占农副業总产值的比重还將逐漸降低。

不但解放后农民負担逐漸降低，就是和抗战前比較也是大大降低的。在抗战前，就全体农民来說，要把自己净收入的37%以上，就貧雇农来看甚至要把净收入的70%左右交給地主、高利貸者以及反动政府；而現在，农民只要把自己净收入的7%左右交給人民政府③。如果以农民的負担与农副業总产值相比，1936年單就田賦、攤派、农村其他税收、地租、高利貸等五項計算，农民的負担共64.9亿元（折成人民幣），占同年农副業总产值的15.9%。1956年农業税及附加（包括乡村自筹經費、农村其他税收）共为35.21亿元，占同年农副業产值的6%。1956年农民的負担仅为1936年的54.25%，亦即減少將近一半④。就个别地区而言也可看出目前农民負担比解放前大为減輕。例如根据广东省南海县五戶农民的典型調查，解放前他們所繳租税平均占全年收入的41.4%，而現在他們的負担只占全年收入的10%左右，兩者相比，現在減輕了四分之三⑤。可見右派分子所說的：农民負担太重了、农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是完全沒有根据的。

其次，看工农業产品的差价情况。解放后党和政府坚持了稳定物价的方針，并实行逐步縮小工农業产品差价的政策。国家在稳定物价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購价格。1955年全国主要农产品价格比1950年提高12.4%，其中粮食提高15.7%，經济作物中的芝麻、苧麻、大麻、油菜籽及茶叶、蚕茧等价格提高13—45%。1956年和1957年又提高了一部分农产品如油菜籽、芝麻、大豆和生猪等的收購价格⑥。由于农产品收購价格的提高，工業品价格的稳定，几年来工农業产品的差价不是扩大了，而是縮小了。如果以1950年工农業产品的差价作为100，那末1952年为90.26，1953年为81.02，1954年为80.67，1955年为82.75。⑦1955年的差价比1950年縮小了17.25%，平均每年縮小3.45%。由于工农業产品差价縮小，从1951到1956年的六年中，农民大約增加收入110多亿元⑧。

或者有人說，解放后这几年工农業产品的差价是縮小了，但是比抗战前則扩大了。是的，据計算，1956年工

① 資料来源見农村工作通訊1957年第9期第21頁。

② 参看南冰："斬断右派分子破坏工农联盟的兩支毒箭"，学習1957年第19期第18頁。

③ 資料来源見薄一波副总理在全国农業劳动模范代表会議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2月24日。

④ 参看南冰："斬断右派分子破坏工农联盟的兩支毒箭"，学習1957年第19期第18頁。

⑤ 資料来源見南方日报1957年8月28日所載的"正确認識工农关系，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⑥ 参看中国农报1957年18期第20頁。

⑦ 参看南冰："斬断右派分子破坏工农联盟的兩支毒箭"，学習1957年第19期第18頁。

⑧ 資料来源見农村工作通訊1957年第9期第21頁。

农产品差价比1936年扩大了17.82%①。但这里有着許多复杂的原因須作具体分析，不能籠統地說現在不合理。首先，抗战前有的工業品价格偏低，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現象。因为那时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政治上和經济上的优势向我国低价傾銷商品，打击我国民族工業。像上海的民族工業普遍开工不足，大批工厂倒閉，工人失業。同时，这种情况对农業生产也是不利的。目前的差价就是同那样一个極不合理的情况作比較的。其次，抗战以后由于反动政府的通貨膨脹，物价飞漲，工农業产品差价也扩大了。解放后我們在这个基础上使物价稳定下来，对差价不可能大規模地調整，只能逐步調节，使差价慢慢縮小，因而目前它还沒有縮小到抗战前的水平。再次，解放后工人的工資有所增加，原料的收購价格也有提高，工業品的成本也随之加大。因之有些工業品的价格較高。此外，由于部分工業品的稅率提高一些，也使工業品的价格提高。国家增加工業品稅收而不增加农業稅收，这是有利于农民的，因为工業品稅收是由全民来負担的。由此可見，現在工农業产品的差价是历史上形成的，它比抗战前扩大也有历史的根源，目前客观的經济条件还不允許我們立即把差价縮小到抗战以前的水平。然而随着工农業生产的發展，工农業产品的差价是会日益縮小的。

工农業产品的差价是一种类似"貢稅"的东西②，它構成国家資金积累的一部分。如果以1936年工农产品比价为基数，(应当指出1936年工农产品比价也是有剪刀差的)目前农民通过差价大約把自己净收入的5%交給国家。这部分的負担是不算重的。固然我們一方面看到农民在这方面的負担，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农民过去不可能获得而現在可以得到的收入。据估計工农業产品的差价虽未縮小到1936年的水平，但农民的所得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何况实际上解放后的差价是在逐年縮小着。右派分子籠統地說工农产品的差价扩大了，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这种謬論在事实面前只好宣告破产。

右派分子借口所謂农民負担重、工农業产品的差价为扩大了，肆意誣蔑說，这是国家"剝削"农民，其用意更恶毒。我們的国家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大家知道，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業国变为先进的工業国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全体农民的最高利益。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工業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并在最后达到幸福和富裕的境地。这是一个偉大而艰巨的事業，需要大量的建設資金。这些資金从那里来呢？农民是不是应尽一部分責任呢？是的，这是完全必要的。目前农民每年繳納的农業稅約占其净收入的7%，加上差价方面的負担約5%，兩項合計約占农民净收入的12%，仅为抗战前农民負担的三分之一。何况我国的稅收以及其他方面的收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單是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国家直接地和間接地用于农業生产的支出共达128.3亿元，相当于同期农民交納的农業稅的80%以上③。我国历史上沒有那一个統治阶級、那一种制度为农民帶来过这么多的利益。右派分子說什么国家"剝削"农民，分明是睜着眼睛說瞎話！

* * *

总上所述，右派分子叫囂"农民生活比解放前还苦"，"工农生活太悬殊了"，"农民負担太重"，"工农業产品的差价扩大了"等等，無非是要挑撥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企圖动搖我們国家的基础，破坏社会主义建設，使資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从而他們可以重新騎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可是，右派分子的荒謬言論在鉄的事实面前已被駁得体無完膚了，他們的政治陰謀已經遭到可耻的失敗。經过反右派的斗爭，再通过全民性的整風，特别是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毫無疑义，工农友誼將更加發展，工农联盟將愈益巩固。

① 参看南冰："斬断右派分子破坏工农联盟的兩支毒箭"，学習1957年第19期第18頁。

②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39—140頁，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

③ 参看1957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所載"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国家大力支援农業生产"的消息。

啓　　事

我刊自創刊以来，承蒙讀者愛护和关心，紛紛来信要求將季刊改为双月刊或月刊，并扩大一些篇幅。为了滿足讀者的要求，茲已决定自1958年度起，改为双月刊，每逢双月15日出版。每期篇幅由56頁增加到60頁，售价不变，每册仍为四角。

"財經研究"編輯委員会謹啓

1957年12月15日

駁斥右派分子对我国农業合作化的污蔑

崔　　皎

当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向党和全国人民展开猖狂进攻的时候，我国的农業合作化也是他們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他們到处污蔑說："农業合作化冒进了"、"农業合作化搞糟了"。究竟我国的农業合作化是眞的冒进了嗎？眞的搞糟了嗎？我們說：农業合作化絲毫也沒有冒进、半点也沒有搞糟。事实俱在，决不容許右派分子恶意污蔑。

（一）我国的农業合作化沒有冒进

事实告訴我們：我国农業合作化的速度是适当的，發展是健康的，絲毫也沒有冒进。要判断农業合作化是否是冒进，必須根据一定的标准，沒有标准是难以明辯是非的，那么，判断我国农業合作化是否冒进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要看它的速度是否符合于客观發展規律。究竟是否符合呢？事实証明是完全符合的。

第一，我国农業合作化的速度是为我国順利实現社会主义工業化所必需的。

我們知道，社会主义工業化是我国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但社会主义工業化决不能离开农業合作化而孤立的去进行，也就是說决不能把一只脚踩在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基础上，而把另一只脚踩在小农經济的基础上。因为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經济限制着农業生产力的發展，它与社会主义工業化之間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如果这一矛盾不及时解决，粮食和工業原料跟不上去，我国社会主义工業化就会遭到極大的困难，这一严重的矛盾，在我国实現农業合作化以前，就已經充分的暴露了出来，在当时这是必須急于要解决的問題。就以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头三年来看，国营工業总产值增加了97.4%，而农業及其副業的总产值却只增加了14.8%，这种农業和工業相脫节的現象，在当时已明显的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工業化的發展。由于工業原料供应不足，致使工業設备不能充分發揮其利用率，如，1954年油脂工業的設备利用率約为40%，面粉約为54%，卷烟約为30%，設备利用率原来較高的紡織工業，也由1954年的90%以上，下降为1955年的76%，由于設备能力利用率的降低，使某些产品大量減产，从而也就影响了全国工業的增長速度，例如：1955年的棉紗产量比1954年減少了68万件，減少产值17亿元，影响到1955年全国工業增長速度約4%。农業生产力的落后，不仅影响某些工業設备能力利用率的降低和产品減产，而且也会影响社会主义建設資金的积累，以及造成粮食問題的緊張。在当时形成这种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小农經济在我国国民經济中仍占有較大的比重，它严重的阻碍着农業生产力的發展。在这样情况下，应該不应該在我国很快的实現农業合作化呢？应該不应該使粮食和工業原料迅速跟上去呢？是完全应該的。这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質这一經济規律和其它有关的社会主义經济規律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决不是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如果人們違反了这种客观要求的話，这一矛盾就会日益加深和尖銳，長此下去，我国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業化，我們就不能够設想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农業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業化同个体农業經济之間的大矛盾，从而为社会主义工業化的發展开辟了道路，既然如此，怎么能說我国的农業合作化是冒进了呢？

第二，我們說农業合作化沒有冒进，还可以从它的發展过程上看出来，这主要看它的發展过程是否貫澈了逐步前进的方針来确定，是否貫澈了这一方針呢？这也是肯定的，因为我国农業合作化运动历史的本身，就是最好的見証。

事实証明：我国农業合作化是由組到社、由低到高、由点到面、由少到多、由小到大逐步發展而来，不是誰憑空一下子制造出来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之后的地区，就开始組織了一批帶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業生产互助团体，如：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变工队、互助組等，而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农業生产合作社的組織，也已經个别的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領导农民更广泛地組織了农業生产互助組，并且在互助組的基础上，开始成批的組織农業生产合作社，特别是党的总路綫公布之后，党在农村全面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加上統購統銷政策的实行，农業生产合作社有了很大的發展，这些合作社作为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进行斗爭的堡壘，显示了它們的优越性，从而，逐步坚定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随着各种条件

的成熟，到1955年秋，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領导下，及时的克服了指导农業合作化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全国迅速的出現了农業合作化的高潮，到1956年农業合作化在我国就已基本上完成了。由此可見，我国从有互助組織說，已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从成批的組織农業生产合作社說，也有六、七年的历史，經过这許多年的發展，無論从組織方面和农民思想方面，都已为1955年农業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創造了良好的条件，虽然在高潮中，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沒有經过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这三个阶段，而是越級上升的，但实际上他們已經有了好多年的思想准备了。事物的發展，开始时总是零星的小規模的逐步前进，但到条件成熟的时候，就轉变为集中的大規模的飞躍式的前进，这种从量变到質变的發展过程，正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我国的农業合作化就正是按这样規律發展而来的，这怎么能說它是冒进了呢？

第三，我們說农業合作化沒有冒进，还可以从农民的覚悟水平和干部的領导水平上来加以証明。

首先，从农民的覚悟水平上来看，我国絕大多数农民对合作化的要求是积極的和坚定的。因为我国农民过去長期受到帝国主义、地主、买办、富农的各种殘酷掠夺和剝削，大多数农民淪为半無产者，他們的生活异常貧困。解放后，虽然广大农民在党的領导下，实行了土地改革，分得了土地，生活比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并时有灾荒和經营方法落后，致使占农村人口60—70%的貧农和下中农，仍然有困难，或者仍然不富裕，为了摆脫貧困，改善生活，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極性，因为他們根据自己的切身經驗和党的不断教育，認識到只有多数人联合起来，采取共同劳动、集体經营的方式，才能采用新的技术、战胜灾荒、增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后摆脫剝削和貧困，澈底解放自己，达到共同富裕，除此之外，别無出路。他們的这种积極性，在我国社会主义工業化建設成就的促进下，更是日益提高，在农業合作化高潮到来的前夕，广大农民要求組織农業社的心情已經十分迫切。例如：在当时許多地方农民集体签名要求办社，得不到滿足时，他們就自动起来組織农業社，仅安徽一省，到1955年在批准了38,000个社之后，还有"自發"社12,000个，广大农民这种积極要求办社的心情，正如湖南省湘潭县貧农張立权所說的："是像久飢求食，久旱求雨一样"。这些事实充分証明了我国农業合作化高潮正是在广大农民要求下实現的，这又怎么能說农業合作化太快了，冒进了呢？

其次，再从干部的領导水平上来看，我們干部的領导水平和农業合作化的速度也是基本上相适应的，因为在我国农業合作化的發展过程中，已經培养了大批的积極分子和干部，他們都是經过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鍛煉的，政治上工作上都比較积極，并且也积累了一定的办社經驗。例如，仅河南省一个新乡專区在四年多的半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中，就培养和鍛煉了会領导集体生产的干部57,000多人，其中有县、区干部2,000余人，乡村主要干部和合作社社長、队長等55,000人。每个老社平均有具有办社經驗的干部六、七人，全区平均12个新、老社合并成一个高級社，每一个高級社平均有具有办社經驗的干部40人左右，这說明了在农業合作化高潮之前，就已經为办高級社創造了領导条件。当然，作为办高級社的完整經驗来說还沒有完全具备，但如果要求在高潮前就取得办高級社的完整經驗，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完整的經驗，只有在办高級社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取得，如果認为当这种完整的經驗沒有取得之前，就不能实現合作化的話，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取得呢？什么时候才能实現合作化呢？难道在已有的領导条件下来实現合作化，并在合作化的实踐中来丰富办社經驗，提高干部領导水平，就是冒进了嗎？那么，一年多以来大部分社办得好的客观事实，又將作何解釋呢？难道这也是合作化冒进了的結果嗎？

要証明我国农業合作化是否是冒进，除以上这些事实外，还可以根据农業合作化之后的事实来判断。农業合作化之后的事实又是怎样呢？农業合作化之后的事实告訴我們，农業合作化并沒有冒进，因为它基本上是健全的，沒有搞糟。

（二）我国农業合作化沒有搞糟

要判断农業合作化是否搞糟了，也必須根据一定的标准，那么，标准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要看农業生产是否提高，农民生活是否改善。

农業生产是否提高呢？是提高了，誰都知道，1956年我国遭受到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灾荒，被灾田地約2亿3千万亩，受灾人口約7,000万人，在全国实行农業合作化的第一年，我国农業就經历了这样严重的考驗。虽然这一年灾害相当严重，但农業合作化已經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实現了增产的要求，例如：粮食总产量（不包括大豆）达到3,650亿斤，比丰收的1955年增加了4.4%，其它技术作物除棉花、油菜籽受灾最重而減产外，均比1955年有所增加。

为什么农業合作化能显示出这样大的优越性呢？第一，由于生产資料所有制的改变，这就給"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开辟了广闊的道路，就使农民特别是貧农、下中农的劳动积極性大大提高，社員的出勤率和劳动

效率都有显著的增長。一般的农村参加劳动生产的人平均增加到20%左右，劳动力的出勤率一般也提高到20%左右。例如：根据黑龙江省19个农業社的典型調查：参加生产的劳动力，男的比以前增加了10%，女的增加了30—50%。男劳动力平均工作日比以前提高了20—30%，女劳动力平均工作日提高了60%。同时，大型农具和耕畜的运用率也提高了20—30%。第二，由于是集中經营也就有了更大的劳动力量和經济力量，从而能为扩大耕地面积、兴修較大規模的农田水利与改革技术創造了条件。例如：去年全国垦荒面积达2,900多万亩，新建和整修了許多渠、塘、壩、水庫、井，扩大灌溉面积1亿多亩，改善灌溉面积6,000多万亩，初步控制水土流失面积7万平方公里，去年由旱地改作水稻田的面积达1,430万亩，复种指数比1955年增加了4.4%，即等于9,960多万亩的播种面积，为解放以来增長最多的一年。良种推广，仅粮食一項比1955年增加24,000万亩，等于全国現有良种面积的1/3，棉花的主要产区，已做到全部使用良种。此外，在积肥造肥方面也超过了过去任何一年。第三，由于合作化之后，能够更多地节約劳动的时間和更多的节約出劳动力，从而在保証搞好农業生产的前提下，大力开展多种經营。例如：上海市郊区幸福农業社，1956年發展了25头奶牛，增养了480头猪，2,500尾魚，23,000只家禽，70只綿羊，33部搖繩机，10架草包机等15样副業生产，1956年二个月中就收入了40,018元，占全社純收入的22%，虽然去年农業生产受灾严重，該社損失了84,000元，但由于开展了多种經营，仍然有70%的社員增加了收入。

农業合作化在生产上表現出来的这些优越性是小农經济根本無法比拟的。不仅如此，就是在抗灾能力上，小农經济也是根本無法与合作化相比拟。如广西省大部地区自去年8月初到今年1月初，一直苦旱，被灾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全省3,000万亩耕地），但去年粮食产量比1955年只減产了3亿斤，其他受灾严重的省份，除个别省外，情形也大致一样。如果不是实現了农業合作化，在去年这样严重的灾荒下，那將是完全不可設想的。試問，这究竟是农業合作化搞糟了呢？还是搞好了？

以上是从农業生产上来看，現在再从农民生活上来判断一下农業合作化是否搞糟了。

农業合作化之后，虽然适値大灾之年，但在沒有受灾和受灾較輕的許多地区，同1955年比較就有75%的农戶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約有10—15%的农戶不增不減或增減不多，減少收入的农戶只占10%左右。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購买力也有了提高，1956年全国农民的購买力是191亿元，比1950年增長了136%，国家供应給农民的消費資料1956年比1950年，棉布增加了2倍，膠鞋增加了1.9倍，食鹽將近1倍，糖增加了2.3倍，煤油增加了11倍，香烟增加了1.4倍。此外，农業合作化在灾情較重的地区，对集体救灾和生产互助等方面，也起了显著的作用，例如：根据对河南省灾情較重的新乡区的調查，平均有66.8%的社員增加了收入，其中非灾区有86.8%的社員增加了收入；輕灾区有73.6%的社員增加了收入，重灾区还有59.3%的社員增加了收入。又如：上海市北郊区白楊村，1949年也是受灾較重的一年，当时有80%的純农戶生活非常困难，只能靠吃稀飯度日，1955年是丰收年，还有6戶是依靠国家来救济，但是去年沒有一家是靠吃稀飯或靠国家救济度日。而西郊区虹星一分社在农業合作化之后，社員收入的增加更为显著，該社1956年有96%的农戶比1955年增加收入，平均每戶收入858元，比1953年平均增加68%，每人平均收入178元。在318戶純农戶中有88%的农戶已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这些事实說明了农業合作化的优越性是多么巨大。特别应該指出的是，由于实現了农業合作化，一些孤寡老弱和殘廢者，都得到了农業生产合作社"五保"政策的适当照顧，对于劳力少、子女多的困难戶也給以一定的补助。可以說是眞正做到了"幼有所長，壯有所用，老有所終，鰥、寡、孤、独、廢疾者皆有所养"，眞正实現了我們前人所幻想而达不到的"大同世界"。不仅如此，而且随着农業合作化的实現，农民的文化、娛乐、福利等事業也有了进一步的开展，例如：1956年全国参加業余学習的农民达7,500万人以上，1956年共有文化館2,600多个，文化站2,500多个，农村圖書室23万多个，农村俱乐部36万多个，农村电影放映队4,700个，农村广播站截至今年3月止已有1,390个，帶喇叭44万以上。在衞生工作方面，到1956年7月止，全国农村中共有县医院2,600多所，县区衞生所12,500多个，妇幼保健站（所）2,800多所，联合診所48,000所，門診所12,000所，另外，在农村还大量地發行了报紙、簡明課本以及举办了不少幼兒园、托兒所等。

以上这些成就在解放前簡直連听都不可能听到，这难道是由于农業合作化搞糟了而取得的嗎？試問，在实現农業合作化的第一年里，又遭受到这样严重的灾荒，能够取得这些成就，难道还算小嗎？如果解放前遭受到这样严重的灾荒，又將是怎么样呢？难道那种赤地千里，十室九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現象比現在还好嗎？恐怕只有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才这样想。

（三）澈底粉碎右派分子的陰謀

根据上述事实可以充分証明：我国的农業合作化絲

（下轉第12頁）

駁斥資产阶級右派
在粮食統購統銷問題上的謬論

彭 輝 芳

粮食統購統銷是我国大規模經济建設开始以后粮食工作上的一項根本政策，是我們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措施之一；这一政策不仅是与資本主义自由市場对立而确立的，与資本主义斗爭中發展与巩固起来的，而且已在粮食分配这个国民經济重要的方面，徹底战胜了資本主义，从而有效地調节粮食产需关系，保証社会主义建設的順利进行。这是每个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所一致贊許并积極拥护的。但是，不久前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竟与农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無耻地唱和着这样一些荒謬的讕言："統購統銷搞糟了"；"統購統銷搞坏了，农民过着飢餓的生活"；"統購比統銷多了"；"三定留粮标准太低了"等等。总而言之，用这群黑帮的話来說，統購統銷已經弄得"天怒人怨"，簡直一無是处。右派分子为什么要这样惡毒地污蔑和破坏这一政策呢？这是因为在当前粮食产需矛盾較为尖銳、供求較为緊張的情况下，在粮食分配上国家和农民之間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于是他們便錯誤地估計可以抓住这一机会来煽动农民起来反对这一政策，企圖制造粮食战綫上的混乱，从而达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設的解体和資本主义的复辟。由此可見，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之所以把一支支毒箭集中到統購統銷上，乃是"項庄舞劍志在沛公"的一种手法。其最終目的在于破坏社会主义建設，这便是問題的实質所在。因此，全体爱国人民应該严正而無情地对右派分子的这种陰謀給以反击，坚决保衛統購統銷政策，保衛社会主义。而右派分子已經遭到可耻的失敗，也是早已命定了的。

如所周知，粮食統購統銷是現阶段国家掌握商品粮食、进行合理分配的唯一的正确办法；这种办法，較諸資本主义自由市場的粮食买卖具有無比的优越性：首先，它体現着粮食經营上的高度計划性。这反映在粮食产、需、余、缺之有計划有組織的平衡与調节上，反映在整个粮食經营管理的集中与統一上。其次，粮食統購統銷是在农村实行購銷結合、划分余缺、統一安排、憑証管理的一种制度，它既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又反映粮食購銷的公平合理。再次，統購統銷中粮食定产、定購的数字，規定从1955年开始3年不变，增产不全購，以及用合理粮价进行收購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就具体貫澈着物質利益鼓励的原則。最后，不論粮食定产、定購、定銷，或产、購、銷的調整，都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程度上貫澈着党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級路綫：树立貧农（包括土改后由貧农上升的下中农）的領导优势，同时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一切，都說明了統購統銷是既符合国家利益又符合农民利益，既符合农民眼前利益又符合农民長远利益的。事实証明，几年来，粮食統購統銷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設的宏偉事業中，起着积極的推动作用，并取得了光輝的成就。

第一，由于粮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实施，就在这一个重要的經济战綫上取得了对資本主义的胜利而解决了"誰战胜誰"的問題，同时，并免除了对农民的中間剝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保証了粮食价格和整个市場物价的稳定。从增加农民的收入来看：城乡資产阶級的投机商人向来是操縱粮食买卖来剝削和奴役广大农民群众的，即使在全国解放以后，虽然經过了土地改革，国家对私人商業又实行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农民生活逐漸得到了改善，但是当时由于旧的粮食自由市場还沒有廢除，粮食投机商和富农还是千着投机倒把、扰乱市場的勾当，因此农民在粮食方面仍然沒有徹底摆脫城乡資本主义的剝削。只有到了全国实行粮食統購統銷以后，国家是唯一的粮食收購者，并以合理的固定的价格收購粮食，广大的农民群众才完全免除了中間剝削，增加了合理收入。以1953年粮食統購基价和1952年比較，就提高了8%，仅仅由于这一价格的調整，全国农民收入的增加，就达到3亿元左右。用这笔錢可以买到200万头牲口或200万部水車。

其次从稳定粮食价格及市場物价来看：在旧的自由市場存在的条件下，資产阶級的投机家們常常以粮食价格来掀起市場物价的風波，比如从1949年冬到1950年春，資产阶級投机家們就曾趁着社会主义經济在市場上立足未定的时候，便以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为中心，連續

制造了三次物价濒風，其中兩次是从粮食領先的。1953年的秋季城乡資产阶級也是以游資集中冲击粮食为中心，使好几个省份發生了一度的物价波动。但在粮食統購統銷以后，由于国家掌握了95%以上的社会商品粮食的購銷，取消了粮食季节差价，縮小了地区差价和購銷差价，于是粮食价格得以稳定，也帶来了整个物价的稳定。因此，即使在1955年春季全国發生粮食供应紧張的时候，市場物价还是稳定的。

第二，通过粮食的統購統銷，党和政府扩大并統一了全国粮食的調度，提高了粮食的利用率，这就有效地保証了城市居民和农村缺粮戶的口粮供应。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便十分重視全国粮食的統一調度。但是由于資本主义自由市場的存在，就有很大一部分粮食曾經被用作为投机和反投机的用途，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使当时全国粮食的調度还是感到困难的。只有到1953年实行粮食統購統銷以后，調度的地区范圍，調度的数量、以及动員調度的力量，才远远地超过了粮食統購統銷之前的情况。这样，連过去的所謂"难运粮"和"死角粮"，虽不能說已全部动員出来，但其数量已减低到最低限度，这就使粮食利用率大大提高了。統購統銷以前，全国省际只能調动几十亿斤粮食，而統購統銷以后，到1956年就增加到一百几十亿斤，其中从西南地区調給全国各地的粮食，就从統購統銷之前十几亿斤增加到1956年至1957年度的60多亿斤。还应該指出的是，从边远地区运出的粮食，政府是以补貼运費来供应需要的，如四川运出一斤粮食到河北就需要兩斤粮食的运費，但是仍然按一般价格在河北供应。这就是說，国家不惜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耗費来掌握更多的粮食，以平衡不同地区、不同年份和不同对象的需要，使社会主义建設得以順利进行。

第三，粮食統購統銷支援了灾区的农業生产，救济了受灾人民，使他們安全渡过了灾荒。自然灾害对我国人民来說，历来便是严重的問題之一。解放前，自然灾害使灾区人民顚沛流离，卖妻卖兒，餓殍載道。仅据1920年—1936年16个年头不完全的統計，死于灾荒的人口就約有1,835万人，仅1931年一年內因水灾而死亡的便有300万人之多，同时，因灾区劳动力减少，生产資料缺乏，反动政府又强征暴歛，不顧人民死活，于是造成了"弥亘数千里無人作耕"、"良田漸廢見谷日稀"的慘狀。如国民党統治时期，1930年陝西大旱，即使在灌溉便利、农产富饒的渭河兩岸，过了3年也还有16万多亩熟地無人耕种；1934年大旱之后，全国农業总产量較平常十足年就减少了40%。

全国解放后，虽然旧社会遺留下了許多恶果，自然灾害又多，如1954年受灾面积达到18,151万亩，受灾人口达到6,200多万人，1956年受灾面积达到22,993万亩；受灾人口达到7,400多万人，为近百年来所罕見的严重灾荒，即使在丰收的1955年也有一亿多亩受灾面积和3,000多万受灾人口；但是由于粮食統購統銷使国家掌握了大量粮食，政府不仅救济了灾民，而且还支持了灾区生产。1956年—1957年度在安徽、河北、江苏、吉林、湖南、广西、河南七个重灾省份，国家比上年度多銷了貿易粮72亿2,900万斤，并且是以合理价格供应的，这样就使灾区人民生活安定，市場平稳，因而灾区基本上就沒有發生餓死人的現象。不仅如此，政府在1956年还供应灾区种籽7亿多斤，保証了及时播种，如河北省受灾后很快就种上了冬麦3,800万亩，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还贏得了今年农業的丰收。就全国来說，1956年灾荒虽然这样严重，但粮食生产还是比丰收的1955年增加一百几十亿斤。这都是解放前未曾見到过的奇迹。

第四，粮食的統購統銷还促进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發展与巩固。全国解放后，农民的生产积極性空前高漲，农業生产因而就迅速地恢复和發展起来了，但是由于旧的粮食自由市場的存在，在很大一部分农民中滋長了严重的自發的資本主义傾向，产生"买田不如放債，放債不如囤粮"的資本主义思想；对互助合作組織發生了动搖，在不少地区出現了阶級分化。通过了粮食統購統銷，便割断了城乡資本主义与农民的联系，使农民摆脫了資本主义影响。与貫澈粮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同时，在农村中更大力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綫总任务的宣傳教育，提高了农民社会主义覚悟，激發了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極性，把农業合作化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例如，山西壺关县在1953年未实行粮食統購統銷的时候，只有61个农業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戶1,567戶，仅占农戶总数3.4%；但在粮食統購統銷实行以后，农業生产合作社即由61个增加到214个，入社农戶从1,567戶增加到6,998戶。1954年統購时，农業社又由214个增到474个，入社农戶由6,998戶增加到27,106戶，占农戶总数64%。

从全国范圍来看，粮食統購統銷以后，1953年11月到1954年春天，在短短3个月的时間內，全国农業生产合作社就由15,000个發展到了90,000多个，互助組也增加到了几十万个；同时，供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也得到了巨大的發展，仅四川一省就有360万农民加入了供銷合作社。

全国农村基本上合作化以后，又通过粮食統購統銷，得以合理的价格收購粮食，并在春耕前預付大量价款，支持了农業增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还由于对缺粮戶的供应，保証了貧农（包括新下中农）入社的可能。此外，由于定产定实及其他一系列的業务工作，又为整社准备了条

件。这一切，又在經济上、組織上和思想上巩固了农業合作社。

第五，粮食統購統銷的实行也促进了私人資本主义工商業特别是資本主义粮食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解放以后，資产阶級投机商人便以棉粮等主要商品作为投机对象，企圖造成市場混乱，牟取暴利。統購統銷实行以后，一切粮食商不能私自經营粮食，而只能在服从国家监督和管理下为国家代銷經銷，私营粮食加工厂也只能由国家供給原料代为加工。这就把在資本主义工商業中占相当比重的、与国計民生又有極其重大关系的私人資本主义粮食工商業納入国家資本主义軌道，并在粮食这一重要的商品流通領域中排除私人資本主义，建立和扩大社会主义陣地，从而也就促进了对所有資本主义工商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以上这些偉大的成就，鮮明地显示了粮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右派分子在这些鉄般的事实面前，尚有何言可說?!

現在讓我們再来分析目前执行这一政策的具体情况，也就是农村粮食購銷情况和留粮标准。右派分子硬說"統購比統銷多了"，"三定留粮标准太低"，"农民沒飯吃"。实际情况是不是像右派分子所叫囂的那样呢？否！否!! 事实告訴我們，粮食統購統銷实行以后，到今年6月已經有4个粮食年度；在这4个年度里，国家共計征購貿易粮3,426.9亿斤，占4个年度粮食产量的28%，假如扣去回銷到农村的粮食，則国家仅統購1,698.1亿斤，只占产量的14.7%，而其余占产量85.3%的粮食，則为农民占有。为了明确情况，現在把这4个年度內的粮食产量、征購量及供应农村量列表比較如后：

單位：亿斤(貿易粮)

	四年合計	1953—54年度	1954—55年度	1955—56年度	1956—57年度
生产量	12,244.0	2,850.6	2,908.4	3,167.2	3,317.8
国家征購量	3,426.9	830.0	902.7	859.9	834.3
征購量占产量%	28.0	29.1	31.0	27.1	25.1
供应农村量	1,629.4	342.3	463.6	363.5	460.0
供应农村占征購量%	47.6	41.2	51.4	42.3	55.1
征購量扣去回銷农村部分占产量%	14.7	17.1	15.7	15.8	11.3
农民占有粮食量	10,446.5	2,362.9	2,469.3	2,670.8	2,943.5

注：1. 售还农村数字中包括国家售与城市食品業加工用粮后流轉至农村的食品折粮。 2. 征購数包括征收和收購。
3. 資料来源是1957年統計工作19期。

上表所列举的数字，有力地回击了右派分子的叫嚷。粮食产量虽逐年增加，而国家征購量，除1954—55年度比上一年度增長8.8%外，1955—56和1956—57兩个年度都是減少的，就征購量占产量的百分比来看，最后兩个年度也是下降的，如果扣去回銷农村的部分，則仅占产量的11.3%至17.1%的幅度。征購量中有50%左右是供应农村的。产量逐年增加而征購量反而減少的事实，說明了农民占有的粮食是逐年上升的，这也就說明了粮食統購統銷是既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設，也有利于农民生活的提高的。

粮食統購統銷后給农民留粮标准是不是低了呢？农民生活是否改善了呢？全国农村平均每人每年留用量如下：1949年是400斤(原粮)，1952—53年度是524斤，1953—54年度是520斤，1954—55年度是533斤，1955—56年度是558斤，1956—57年度是593斤。①这样上升的速度是很快的，在目前农民消費水平的情况下，不但够吃够用，而且还有积余。这样的留粮标准比解放前和抗日战爭前农民留用量要高得多。

如果我們再从各个地区各个农業生产社的农民留粮情况加以分析，也是不低的。例如：湖南省1953年平均每人留粮为558斤，比战前丰收的1936年最高留粮556斤还多兩斤；1954年虽遭受水灾，但留粮平均水平还是有537斤；1955年平均572斤；1956年受灾，平均亦达到565斤。四川遂宁專区在1956年平均留粮水平为504斤，比1953年多7.23%。

山西翼城县先鋒社在統購前每人平均为320斤，全社有40多戶借債，債款共計6,700余元；1953年，粮食統購統銷以后，到1955年平均每人留粮达到530斤，1956年达到560斤，今年小麦每人234斤，因出現了旱象，預計最低每个社員也不下500斤。三年来平均每人留粮548斤，除了食用以外，全社平均每人还能余粮約30来斤。

留粮标准的提高，对各个阶層是不同的。例如，湖南湘乡先鋒农業生产社共有34戶，其中貧农16戶，新下中

① 見中国农报1957年20期第10頁。

农3戶，新上中农2戶，老下中农9戶，老上中农2戶，地主2戶。全社平均每人留用粮在1953年为537斤，1954年为534斤，1955年为582斤，1956年为574斤。各个阶層每人平均留用粮如下表：（單位斤）①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貧　农	504	501	551	582
新下中农	529	529	552	545
新上中农	573	562	607	544
老下中农	567	555	607	608
老上中农	692	680	679	594
地　主	443	477	558	539

从这个例子中，不仅可以看到平均留用粮的提高，而且也可以看到貧农（包括新下中农）留用粮的显著增加。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这里我們还得指出，农村留用量虽是逐年增加，但还不能算寬裕，而且从整个粮食局势来看，目前供求还是紧張的，但决不象右派分子所夸大的那样，而且右派分子还歪曲事实、恶毒地把供求紧張归咎于粮食統購統銷，这更是荒謬之至了。事实上，在統購統銷之前，粮食在資本主义投机商的操縱下，曾几度發生粮食供求的紧張，而在实行粮食統購統銷以后，由粮食投机商造成粮食供求紧張的那些因素，已被統購統銷消除了。但为什么由粮食产需矛盾引起的供求紧張，特别是在农村基本上合作化了之后的今天，还会繼續存在呢？这是因为除了城市需要迅速增長之外，在农村中，由于劳动强度提高，出勤率增加，参加农業劳动的人数增多，牲畜使用时間延長和使用次数增多，复种面积扩大，再加上以粮食为原料的副業，以粮食为飼料的养畜業的發展等等，促成了粮食需要量的迅速增加。然而这种情况是在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和城乡人民消費不断增長的条件下出现的。这虽然也是我們面临着的在粮食方面的一个問題，但它却有力地在推动生产，所以我們的粮食問題是可以根本上得到解决的。当生产还沒有發展到足以根本解决我国的粮食問題的时候，粮食的統購統銷和合理調节产需关系是可以克服当前粮食困难的，即使目前在粮食供求上还存在着一些紧張情况，但决不会引起恐慌与混乱，这对国家对人民是莫大的福利，这正是粮食統購統銷帶給我們的大好事。

綜上所述，我国粮食統購統銷不是"搞糟了"而是好得很！既符合国家利益，也符合农民利益，更有利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迅速發展。我們要坚决保衛这一政策，不讓右派分子沾污它，也决不讓他們把广大人民拉回到資本主义的灾难中去。

① 見1957年8月25日人民日报。

（上接第8頁）

毫也沒有冒进，半点也沒有搞糟。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右派分子要这样肆意污蔑說我国农業合作化冒进了，农業合作化搞糟了呢？这是因为他們想借此来根本否定我国实现农業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它的优越性。我們知道：农業合作化帶給我們的是提高生产、改善生活，但帶給右派分子的却是憤恨懊惱，悲观失望。因为农業合作化堵死了在农村中發展資本主义的途徑，而保証了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全面胜利，这对右派分子們来說，当然是一个异常沉重的打击。但是这些右派分子对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他們拔箭張弓、伺机待發，妄圖把历史車輪倒轉回去。当今年春天党整風开始的时候，他們認为时机已到，竟假借大鳴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風的名义，向党和全国人民展开了猖狂的进攻。这些自不量力的右派小丑們，妄想通过挑撥离間、顛倒黑白、造謠污蔑、歪曲事实等卑鄙手段，煽动群众起来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使資本主义在中国重新复辟。在他們所进行的一些陰謀活动里，把农業合作化也选擇为他們攻击的重要目标之一，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因为农業合作化，我們知道，农業不仅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給工業提供了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也給工業提供了最大的国内市場，农業的發展，对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对于工农联盟和人民团結，以及我国工業化的發展速度都發生直接的影响。因此，他們妄想从这个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方面来打开一个缺口，妄想挑撥和破坏党与农民的亲密联系，把党从农村这样一条广闊的战綫上一脚踢开，进而推翻我国無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使資本主义复辟。但是，利令智昏的右派分子們又作了錯誤的估計，他們忘記了社会主义已經稳如泰山，共产党已經深入民心，五亿农民和全国劳动人民一样，憑自己的切身經驗，十分清楚的知道：是誰会帶給他們灾难，是誰使他們澈底翻了身。因此，他們是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事实証明，右派分子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只能是严厉的批駁和無情的回击，历史不会重演，时代車輪也不会倒轉回去，如果右派分子們还是执迷不悟，他們將永远被抛出时代的列車以外，將被时代的車輪輾得粉碎。

試談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兩面性及分化

裘逸娟　曹麟章

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兩面性問題，是我們偉大的領袖毛澤东同志首次明确提出的，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級的分析"(1926年3月)一文中，精辟的指出："中产阶級。这个阶級代表中国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們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們在受外資打击、軍閥压迫感覚痛苦时，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国主义反軍閥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內有本国無产阶級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無产阶級的积極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資产阶級地位的阶級的發展感覚到威胁时，他們又怀疑革命。中产阶級卽所謂民族資产阶級。"(毛选一卷第四頁)以上毛主席所指他們对中国革命的矛盾态度，就是我国民族資产阶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兩面性。这种兩面性是由旧中国的社会、經济条件决定的。旧中国是一个外受帝国主义奴役、內为官僚、封建势力統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民族資产阶級不是統治阶級，在政治上、經济上也受帝国主义、官僚資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与束縛，因而有反压迫反束縛、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但是，剝削無产者、發展資本主义还是民族資产阶級本質的一面，在这点上它与無产阶級有不可調和的对抗性矛盾。所以，它惧怕無产阶級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民族資本主义在經济上与帝国主义、官僚資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还有千絲万縷的联系与一定的依賴性，所以，又有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动摇性与妥协性。由此可見，中国民族資产阶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兩面性問題，乃是从旧中国的历史条件出發，具体分析民族資产阶級的社会地位和阶級特性所得出的結論，这是科学的、客观的結論，已为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偉大胜利的历史事实所証明。毛主席关于民族資产阶級兩面性問題的分析以及与資产阶級建立統一战綫的策略，是創造性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对無产阶級革命理論宝庫的宝貴貢献，也为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指明了道路。

同时，中国民族資产阶級兩面性的提出，乃是为了將它与官僚資产阶級以及一般資本主义国家的資产阶級区别开来，这种区别正是为了指出民族資产阶級在民主革命中尚有革命性的一面，可以成为無产阶級的朋友，在無产阶級的領导下参加民主革命。所以，民族資产阶級兩面性是客观的存在，这一問題的提出，对于作为剝削者的民族資产阶級說来，不是耻辱，而是好事。因此，認为民族資产阶級的兩面性是个臭包袱的想法，从历史上来看也是沒有根据的。

正确估計民族資产阶級的兩面性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估計錯誤就会导致路綫錯誤，就会犯"左"傾或右傾机会主义，其結果都是革命的巨大損失。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看，就有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断送革命和三次右傾机会主义使革命遭到惨痛損失的教訓，只是在1935年遵义会議党中央建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領导核心以后，才使对民族資产阶級的統一战綫政策遵循着既团結又斗爭的正确道路發展，才保証了民主革命运动的順利發展与徹底胜利。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了，同时，并繼續深入貫徹民主革命任务。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內容乃是消灭資本主义、消灭剝削，因而，無产阶級与民族資产阶級的矛盾就逐漸上升为国內的主要矛盾，資产阶級实际上已是革命的对象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任务，是与民族資产阶級狹隘的阶級利益完全不相容的，在这种形势下，民族資产阶級的兩面性是否仍然存在呢？首先，我們来明确一下，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所謂資产阶級的兩面性是指什么呢？这就是指既有接受社会主义的一面，又有發展資本主义的一面，而所謂接受社会主义与發展資本主义，都是包括政治上、經济上以及思想上各方面的。換句話說，这种兩面性，实質上就是民族資产阶級对經济战綫、政治战綫以及思想战綫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矛盾态度。那末，这种矛盾态度对于民族資产阶級說来，是否可能存在呢？根据教条主义者机械的分析，民族資产阶級对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有矛盾态度的，它只有反动的、坚决反抗革命的一面。但是，馬列主义都教导我們，一切問題都应該从具体情况出發，作具体分析。根据馬列主义的科学的阶級分析，从民主革命阶段和平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后，由当时客观的政治、經济等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民族資产阶級对社会主义革命

仍具有矛盾态度，即既有抗拒的一面又有願意接受的一面，也就是說，民族資产阶級的兩面性仍然存在，只不过兩面性的基本內容已經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了，含意与前大不相同了。

同时，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由于社会、經济条件是不断發展与变化的，因而民族資产阶級的兩面性亦随之而不断变化。所以，要具体研究民族資产阶級的兩面性，就必須深入分析决定兩面性变化的历史条件，从历史条件的变化中研究兩面性的变化，当然，也适当估計到民族資产阶級本身的进步。因此，我們应該首先来看一下，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决定民族資产阶級兩面性及其变化的經常起作用的因素主要有那些呢？我們認为，总括起来，有以下主要因素：

1．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这种力量对比的基本狀况及其消長是决定民族資产阶級兩面性及其变化的重要因素。只有在無产阶級政治力量不断巩固与强大，資产阶級政治势力日益孤立与削弱的条件下，民族資产阶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極性才会不断增長，其抗拒社会主义革命的消極性才能日趋削弱。

2．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經济力量的对比关系。这种力量对比的消長可說是影响民族資产阶級兩面性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因为，經济力量乃是阶級力量的基础，特别对于我国民族資产阶級說来更为突出。

3．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思想力量的对比关系。这就是全国范圍內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即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在思想領域中的較量。当然，民族資产阶級本身思想狀况的变化及其內部分化則更是决定兩面性消長的內在因素。

4．国际形势。社会主义陣营与帝国主义陣营的狀况及其消長，战爭与和平局势的变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兄弟友邦对我国的偉大支援等，也都是直接、間接影响民族資产阶級兩面性的因素。

5．無产阶級对資产阶級的态度，也就是党和国家对資产阶級采取的政策。我們認为，所謂民族資产阶級的积極性，还只是一种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客观可能性。也就是說，民族資产阶級只是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至于这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現实，那就必須取决于我們的政策，同时，上述阶級力量对比的消長也必須通过正确的政策来实現，所以，对民族資产阶級的政策乃是决定其积極性增長与实現的关鍵。这里，也体現了党和国家的偉大作用。

根据我国历史發展的事实来分析以上因素，就可以看出，决定民族資产阶級积極性增長的因素不断的、迅速的發展与强化，而影响其消極性的因素則不断地衰退与消亡，可見，民族資产阶級兩面性不断消長的趋势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客观基础与运动过程的。

以下我們試圖分三个历史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五反前；五反运动后至全行業公私合营高潮前；高潮以后的現阶段来分析民族資产阶級兩面性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变化与表現。

（二）

第一阶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五反运动前。在这一时期中，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力量对比的基本形势是怎样的呢？在政治上，無产阶級开始建立了以自身为領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拥有强大的武装，大張旗鼓的开展了鎮压反革命运动，并繼續領导全国人民深入貫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取得了徹底的胜利；民族資产阶級也作为被領导、被联合者参加了政权，有一定的地位，但力量是軟弱的，特别是沒有掌握武装。在經济上，無产阶級通过沒收官僚資本开始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經济，初步掌握了国民經济命脉，居于領导地位，并逐步显示其威力与优越性，但是，在当时，它还不能在国民經济中占居統治的地位，还不能有力地控制与駕馭資本主义經济；資本主义經济則作为被領导、被利用者，在国民經济中有相当的地位，还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加以当时个体經济有如汪洋大海，与資本主义有很大的联系，所以，資产阶級在經济上的力量比較大，能够兴風作浪与無产阶級較量。在思想上，广大劳动人民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資本主义，資产阶級發展資本主义的願望基本上处于孤立的地位，走資本主义道路沒有足够的社会思想基础。在国际上，無产阶級有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的支援，而資产阶級与帝国主义却又割断了联系。在这种基本力量的对比形势下，民族資产阶級既不甘願再回到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痛苦的老路上去，又不可能夺取共产党的領导地位引导中国走資本主义道路，更何况在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以后，無产阶級实行了和平改造的政策，仍保持了对民族資产阶級的联盟，給予一定的政治和經济地位，这就大大改变了民族資产阶級在旧中国被压迫、被歧視的狀况，提高了其社会地位；加以当时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还較緩慢（当时主要任务还是繼續貫徹反帝反封建和恢复經济），还沒有从根本上触及民族資产阶級的利益。因此，民族資产阶級就接受了無产阶級的領导与联盟，开始表現出有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極性一面。但是，資产阶級的本質一面还是資本主义、还是剝削。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民族資产阶級發展資本主义、加强剝削、抗拒社会主义的消極性一面乃是与

生俱来的，内在的本質。可見，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民族資产阶級兩面性的存在，主要乃是由客观的阶級力量的对比决定的。

那末，此阶段中，民族資产阶級兩面性的具体表現如何呢？它积極性一面就表現为願意接受無产阶級的領导，拥护人民民主專政，拥护共同綱領；繼續反帝，贊成土改、抗美援朝和鎮压反革命等运动；在經济上發展資本主义有利于国計民生的一面，接受国营經济的領导。其消極性一面則表現为在政治上要与無产阶級"分庭抗礼"、"長期共存"，企圖"新民主主义万岁"，特别严重的是表現在經济上貪得無厭的加强剝削、謀取暴利、濫施"五毒"、腐蝕国家干部，抗拒与破坏国营經济的領导，兴風作浪，有發展資本主义的强烈願望。所以，在此阶段，民族資产阶級憑借其經济力量对比中的局部优势，从經济上向無产阶級展开的大举进攻，正是它消極性一面突出的、集中的表現。

(三)

第二阶段，即五反运动后至全行業公私合营高潮前。在这一阶段中，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的力量对比起了那些基本的变化呢？前面已經說过，在第一阶段中，資产阶級的經济力量还比較大，保持着很大的威風，濫施五毒，严重的破坏国民經济，而無产阶級一般又还沒有对資产阶級进行激烈的斗爭。但是，随着国民經济的恢复，各項政治运动的胜利，人民政权更巩固了；社会主义經济也發展了，加强了領导力量，从而开始了計划建設的时期，这样，击退資产阶級的猖狂进攻，对資本主义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被提到更为迫切和重要的地位，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在經济战綫上的斗爭就剧烈地展开了。这場斗爭，是由党領导的五反运动基本决定胜負的。

1952 年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領导下所开展的轟轟烈烈的五反运动，打退了資产阶級在經济战綫上的猖狂进攻，使資产阶級原有的威風基本上扫地以尽，这就使得工人的监督从此在很多企業中逐步建立起来，特别是国家逐步控制了原料和市場，掌握了商業的批發环节，从而使很多資本家实际上丧失了或者基本丧失了控制企業的权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說明，作为一个阶級来說，資产阶級已被無产阶級所領导的国家的威力压倒了，經过这場斗爭，大大改变了国内阶級力量的对比。这时候，民族資产阶級所处的境遇非常困难，可說完全处于劣势。它当时的处境是这样的了：强大的人民民主專政；工人群众的覺悟和高度的組織力量；巩固的工农联盟；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經济及其在整个国民經济中巩固的領导地位和領导作用；資产阶級在經济上丧失了独立存在的条件，本身矛盾重重，整个阶級开始分崩离析；苏联的巨大援助，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存在等等。在这种形势下，党又进一步明确、具体的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和总任务，鼓舞了全国人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要求，并指出了改造資本主义和資产阶級的具体道路和方針步驟，这样，經过一場严重的斗爭，資产阶級既屈服于工人阶級，又更明确了服从改造的出路，所以，兩面性消長了。这种消長就是其經济上的消極性大大地被削弱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極性增長了。积極性的增長主要表現如何呢？这就是在政治及經济上願意进一步接受無产阶級的領导，接受人民民主專政，拥护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和总任务，接受国家資本主义（主要是低級形式）的社会主义改造等。而其消極性則主要表現为反改造和反限制，留恋資本主义和無限制的剝削。

同时，民族資产阶級的这种消極性，在經过無产阶級所不断进行的限制和改造的斗爭后，也逐步地被克服着，因而，至 1954 年，初級形式的国家資本主义就大量地發展了起来，特别当 1955 年秋冬之間，农業合作化的高潮后，最后地断絕了資本主义在农村發展的道路，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内阶級力量的对比，因而，給了資产阶級这种消極性予致命的打击，而把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向最高級形式的条件也就完全成熟了。因此，在 1956 年这种全国范圍内"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形势下，民族資产阶級权衡利弊、考慮前途，最后敲鑼打鼓的迎接了改造高潮，交出了生产資料，从而使全国資本主义工商業基本上完成了在生产資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資产阶級的这种表現，就正是其消極性被击潰而积極性占上風的集中反映，也是無产阶級在經济战綫上战胜資产阶級的必然結果。

(四)

第三阶段，即全行業公私合营高潮后的現阶段。从前段所述可知，1956 年全行業公私合营高潮是国内阶級力量对比根本变化的結果，标志着無产阶級的胜利，体現着經济战綫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实現。因此，在經济上，"誰战胜誰"的問題已經基本解决了，社会主义經济在国民經济中占了絕对的統治地位，資产阶級在經济上完全繳了械，丧失了資本主义剝削的基地，正处在走向消灭的前夕，而資产阶級分子的社会經济地位也处在开始由剝削者向劳动者轉化的过程中，因而具有剝削者与劳动者的兩重身份，人的改造被提到重要的地位，資产阶級分子的前途与命运更明朗了，阶級的分化更急剧了。但是，随着經济战綫的胜利之后，不可避免地到来了政治与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在这样的阶級力量对比

及革命形势面前，資产阶級的兩面性也就發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表現为資产阶級在經济上兩面性的巨大变化。即一方面，資产阶級在經济上的积極性大大增長、其表現也大大地变化。在現阶段，民族資产阶級經济上积極性的表現已演变为：决心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积極投入社会主义劳动竞賽，一心一意搞好企業、为社会主义建設貢献技能等。另方面，民族資产阶級經济上消極性的表現也根本改变了，这种改变就在于民族資产阶級在經济上反限制、反改造，加强剝削和發展資本主义等消極性表現的基本消失。这乃是因为这种消極性所賴以作用的客观条件基本上消失了，这种客观条件就是資本主义經济。但是，現阶段民族資产阶級在經济上的消極性依然存在，这是因为决定其消極性存在的經济基础并沒有最后完全消灭，換句話說，就是資产阶級对生产資料的所有权并沒有完全丧失，它还憑借这种所有权領取定息，剝削工人阶級創造的部分价值，（甚至妄圖延長定息年限）所以，資产阶級的本質并沒有消灭，資产阶級的剝削根子还沒有脫离，而資产阶級的消極性就正是由这种阶級本質、剝削根子所决定的，它們都不可能先于阶級的消灭而消灭，同时，剝削存在，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的对抗性矛盾也就存在，只是退居次要的地位而已。可見，在經济上消極性的依然存在是客观的，只是基本表現不同，程度被大大削弱罢了。

現阶段，民族資产阶級在經济上消極性的主要表現除上述剝削依然存在并留恋定息这一点外，还表現为在企業中对抗公方領导、消極推諉、挑撥中伤、爭权夺利、陽奉陰違以及严重的資本主义經营管理作風，甚至还貪污中飽、違法乱紀，特别有的白天社会主义晚上資本主义搞地下工厂，有的企圖走回头路，退出合营搞單干以牟暴利等等，这一切都是資产阶級抗拒社会主义、唯利是圖的本質反映。这些方面，实例是很多的：如天津市机电工業系統有些資本家在合营后由"五怕"轉为"五不怕"，即一不怕稅务局、二不怕企業亏錢、三不怕工資發不出、四不怕工人鬧、五不怕銀行貸款卡得緊，所謂生产有工人、領导有公方，能推就推；再如天津市木材公司資本家前一时期的貪污竟达2万元，上海市紡織業70%的合营戶都宕用公款，而根据上海市第一輕工業局11个專業公司的調查，除火柴、制笔兩業外，其余九業都有違法行为；河北省政协委員晁同德、郑东园在河北省政协会上列举的很多材料也說明，一年多来，虽然唐山市有97%以上的私方人員参加了劳动竞賽，被評为先进工作者和受到物質奬励的就有一千二百七十九人次。但是，根据今年1月份在四百八十八合营商業門市部的檢查，因对企業經营不負責任、管理不善，長短款达二千五百四十九次，商品發生損失的有八千九百二十九种；違法乱紀貪污盜窃事件也达二十起；占公家便宜的达五百四十一种，挪用公款的一百九十六件等等使国家損失巨大。我們还可以看看武汉市联一电机厂私方員熙貞的自白："看到許多朋友單干，一个月可拿二三百元，自己在厂里拿不到一百元，我想退厂單干"；苏州市工商联二届会員代表大会上，也曾有人准备提出"要求退出合营"的提案，不少私方見地下工厂賺錢都想走回头路，有所謂"回潮"思想。特别严重的是最近被职工揭發的公私合营南京玻璃厂事件。該厂私方人員后撫南（玻璃厂生产科長）、丁正固（总务科長）、舒志剛（供銷科科員）等一伙不法分子，竟敢以社会主义企業为基地，盜用国家的設备，引誘腐蝕少数重要干部（被拉下水的干部中，有十多年党齡的公方厂長張玉棟，有身为人事科長的党員刘广成；还有二分厂的党員厂長、二分厂的工会主席、工人出身的供銷科科長和劳动工資科科員程东明等）和工人，开办地下工厂，进行資本主义的严重的投机牟利勾当。南京新华日报为此特發表了"誰改造誰？"的社論，严正指出：这个事实本身說明了在南京玻璃厂，資本主义已經实行了局部的复辟。这个事件的中心問題是誰改造誰的問題，是資产阶級篡夺工人阶級領导权的問題。同时，这个事件也說明了絕大部分公私合营企業在經营管理、規章制度以及生产方針等方面，殘存的資本主义的影响还是不少的，在这些企業里，如果不能保証党的領导和工人群众的監督，坚决地改革和消除資本主义經营管理的殘余和影响的話，这些資本主义的殘余和影响，便会成为不法資本家复辟的資本；甚至到最后"合"公"营"私，把企業还原成为資本主义的企業。上述一切，特别是南京玻璃厂事件都突出地說明了資产阶級在經济上的消極性仍然严重的存在着，而前述其反限制、反改造，加强剝削和發展資本主义等表現也只是基本上消失，况且所以基本消失也是無产阶級斗爭胜利的結果，是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在公私合营企業中只要党的領导和工人群众監督有些微松弛和削弱，剝削成性的資产阶級分子就都会千方百計的实行反扑，表現出瘋狂的反改造，甚至复辟資本主义。我們必須高度的警惕！

其次，兩面性的变化还表現为資产阶級在政治及思想上兩面性的突出化。在前兩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在經济战綫进行，而資产阶級兩面性的基本表現也就在于对待社会主义經济战綫革命的态度上。而現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及思想战綫上开始了，資产阶級的兩面性也就突出地表現为对待政治及思想战綫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矛盾态度。而且，消極性表現得相当严重，这乃是因为对大多数資产阶級分子說来，在政治与思想方面，

基本上还沒有放弃資本主义立場，其阶級感情、政治思想以及生活習慣等也都还远远落后于經济基础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与無产阶級、社会主义还有一个頗大的距离。因而，当少数右派分子妄圖在政治与思想战綫上与無产阶級作最后一次較量，以挽救与复辟資本主义的时候，絕大部分資产阶級分子都認識模糊、犹疑动摇以至發生共鳴，而在反右斗爭面前，又軟弱同情、斗爭乏力，这不都是其消極性的严重表現嗎!?而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本身，則更是資产阶級在政治及思想上消極性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現。至于其一般思想作風、生活習慣等方面的資产阶級烙印則更是非常明显的，如損人利己、輕視劳动、追求享受、奢侈浪費甚至墮落腐化等。

由此可見，民族資产阶級兩面性、特别是消極性的存在，乃是由資产阶級的阶級本質及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决非如某些人所想是什么外来影响所造成，它既不能随人們主观意願所强加，也决不可能任意被否認。抱这种說法不仅是完全錯誤的，而且用意險恶，这乃是企圖將資产阶級消極性的存在归罪于党和無产阶級，并以此抗拒自我改造，因而是决不能容忍的。

可見，只有具体分析我国历史条件、民族資产阶級的狀况及其变化，才能深刻認識現阶段民族資产阶級的兩面性，也才能正确体会与掌握現阶段对民族資产阶級的政策方針，而不致在理論宣傳与实际斗爭中犯"左"傾或右傾的錯誤。

(五)

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在無产阶級(通过共产党)所領导的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中，由于它的成員对革命采取不同的态度，总可区别为左、中、右三派。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大多数資产阶級分子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革命或者采取中立态度，而如章乃器这样的右派分子，在历史上从来就是一个老右派。但是由于革命的性質还是資产阶級民主革命，(虽然由無产阶級所領导的新民主革命与資产阶級所領导的旧民主革命有着本質的不同。)与資产阶級的狹隘的阶級利益在客观上还是相一致的；因此，在民主革命阶段中，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分化还不是頂明显的。

随着革命形势的發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由于資产阶級的本質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特别是在去年全行業公私合营以后，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發生了根本的变化，資本家已丧失了自己借以进行剝削的經济基础，其中的大多数人正处在向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轉化过程中；从而，这种政治上的分化趋势就愈益明显了。

在資产阶級分子中，当前有一小部分人基本上已經放弃了資本主义立場而轉到社会主义即工人阶級的立場上来了。这一部分人是工商業者中的核心分子。他們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的領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骨干和帶头作用。这就是資产阶級左派，他們暫时还是少数。我們認为：所謂資产阶級左派仅仅是指他們的政治立場而言。如我們在上文所指出：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兩面性，随着革命形势的發展和变化，其内容及表現形式也是不断在变化的；但集中地反映在对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采取的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态度上。虽然，民族資产阶級兩面性集中表現在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場上，但这不是唯一的表現；在現阶段来說，它还同样的表現在經济上，即对生产資料的关系上和思想意識生活作風上，因此，我們不能同意所謂："資产阶級左派按其政治立場来說，是已經經过了脫胎換骨的改造，成为工人阶級的一部分的說法。"政治是經济的表現，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場是取决于对生产資料的关系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們在生产中的地位，因此，划分阶級的主要标准应該是对生产資料的关系。毛主席說得很清楚："一方面，資产阶級分子已經成为公私合营企業中的管理人員，正处在由剝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轉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們还在公私合营企業中拿定息，这就是說，他們的剝削根子还沒有脫离。他們同工人阶級的思想感情、生活習慣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問題"第20頁)不能設想既是工人阶級的一部分而又有不劳而获的剝削收入，因此，就不能說，資产阶級左派按其政治立場来說已經成为工人阶級的一部分，把政治立場和政治态度与对生产資料的关系生硬的割裂开来，这样的提法至少是不全面的，而且也容易模糊了現阶段資产阶級与工人阶級的本質区别。我們的意見認为：資产阶級作为一个阶級来說，它的阶級特性即其兩面性是存在的；而資产阶級左派按其政治立場来說已基本上站在工人阶級立場上，但在經济上和思想意識生活作風上仍有其消極性的一面。即使是在政治上，也只能說是基本上站稳了工人阶級立場，比如在这次大鳴大放的过程中，資产阶級左派一时被右派謬論所迷惑的也不乏其人。因此，資产阶級左派要眞正的成为工人阶級的一部分，还必須进一步下定决心，最后割断与資本主义生产資料所有制的残余关系，以企業为基地，在劳动实踐的过程中，特别是通过这一次工商界的全面整風中，进一步鍛煉自己，提高政治覺悟，改造自己的資产阶級思想意識和生活作風，最后成为名符其实的劳动者。

在資产阶級分子当中还有一小部分人，他們至今坚

持資本主义立場，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企圖使資本主义复辟。这一小部分人就是資产阶級右派，他們是資产阶級反动派。右派分子中还有少数的極右派，他們在政治上的野心很大，不仅有反动言論而且有反动的活动；他們利用共产党的整風运动，有綱領、有計划、有組織的向工人阶級和共产党發动了猖狂进攻；企圖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的道路，反对人民民主專政和共产党的領导，使資本主义复辟。由此可見，反右派斗爭是一場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斗爭，实質上是一九五六年在經济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繼續和补充，是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人民与右派分子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此，对待右派分子不是什么整風問題，团結——批評——团結的公式对他們是不适用的；而是通过反右派斗爭如何孤立和打击右派分子以削弱和消灭他們的反动言行的影响問題。这是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斗爭，不如此，社会主义經济基础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最后完成。在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当中，除了極少数的人会至死不悟、坚持資本主义立場以外，大部分的人通过反右派斗爭，通过摆事实，講道理的大辯論，把他們的謬論駁得体無完膚，从而促进其內心的斗爭，有可能逐漸改变其反动的右派立場。

动摇于左派和右派之間，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革命和反动之間的資产阶級分子，就是資产阶級中間派。他們的特点是在政治立場上具有不同程度的兩面性。在資产阶級分子当中，他們人数占了大多数。他們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傾向于接受共产党領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这一点上来說，中間派从資本主义立場到社会主义立場已經大大的前进了一步，有可能在共产党領导下繼續接受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基本上沒有放弃資本主义立場，对共产党和工人阶級的領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沒有口服心服。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由于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虽然交出了自己的生产資料，但对資本主义还有不同程度的留恋。在資产阶級中間派中間，由于他們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接受共产党的領导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摇摆态度，因而又可以区别为几种不同的情况，一部分人比較接近左派，一部分人比較接近右派，另一部分人則动摇于二者之間。

左派和右派都是坚决的，而中間派却是不坚决的。由于他們不同程度的傾向于接受共产党領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因而，从这一方面說，他們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是有可能通过客观环境的影响和自覺的努力而逐漸变成左派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們基本上未改变資本主义立場，又在不同程度上留恋資本主义，从这一方面說，他們又是通向資本主义的。因此，如果放松了自我改造，在資产阶級右派的影响下，他們也不是沒有可能变成資产阶級右派的。資产阶級右派所以敢于向工人阶級發动猖狂进攻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他們的言論在这一部分人中間还有市場，他們和右派在思想上还有相通之处。由于这一部分人占資产阶級分子的大多数，因此，在思想战綫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部分人政治立場的轉变；不解决这一部分人的政治立場問題，反右派斗爭也就不能获得徹底的胜利。在工商界的全面整風（包括反右派斗爭）中，对資产阶級中間派来說，就是要他們在思想上和資产阶級右派划清界限，克服他們在資本主义立場和社会主义立場之間摇摆不定的动摇性，在思想上进行自我改造，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达到破資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目的；使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能够向左轉，变成左派，以扩大左派的队伍。

根据以上分析，当前从資产阶級在政治上分化总的趋势来看，随着工商界全面整風的胜利开展，左派將更加坚决地站稳社会主义立場；中間派也將日益摆脫右派的政治影响，向左看齐，从而，使左派的队伍不断的扩大与加强；而在右派分子中，除了極少数人仍將坚持資产阶級立場外，大部分人通过摆事实、講道理的大辯論，他們的謬論將会被駁得体無完膚，在群众中日益孤立，从而，不得不在眞理面前被迫低头認罪，而有可能开始改变其反动的右派立場，逐漸向中間派轉化。

（六）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們有下列几点体会：

第一，兩面性是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阶級特性，它取决于中国民族資产阶級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經济地位，它是客观的存在。而且，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兩面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發展而不断發展与变化的。这本来是人所共知的客观事实，而不是什么"教条主义者"因为"工商業者容易驕傲自滿"而人为的給他們硬加上去的"这頂兩面性的帽子"；但是，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章乃器却别有用心的搬出了他所謂的"工商業家所熟知的兩面性"即所謂："政治上革命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兩面性，和經济上有利于国計民生的积極一面与不利于国計民生的消極五毒的一面的兩面性。"章乃器硬是把这一个罪名套在他所謂的"教条主义者"的头上，但是，是那一个"教条主义者"这样来認識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的民族資产阶級的兩面性呢？不从客观的历史条件的变化出發和不用發展的观点来看問題，教条主义者不是别人而正是章乃器自己。难道章乃器連这一点起碼的哲学常識都沒有嗎？决不是。章乃器的險恶的

（下轉第 60 頁）

資产阶級国家干預經济与資本主义經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

張淑智

經济学界右派借反对教条主义来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企圖否定馬克思列宁主义經济科学，为恢复資产阶級經济科学开辟道路。陈振汉等的“我們对当前經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見”一文，就是右派經济学者攻击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經济学和恢复資产阶級經济学的綱領。上海右派分子沈志远、吳承禧等是这个綱領的忠实的执行者。右派分子吳承禧及其同路人王士章、楊思正等，狂妄地企圖以修正主义手法否定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經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并詆毀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經济学，为恢复資产阶級經济学开拓道路。因此，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資本主义經济危机的理論，就成为他們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吳承禧等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資本主义国家出現了新的情况，美国經济的發展很“順利”，資本主义經济危机的理論“破产”了，如再坚持这个理論就是教条主义。本文單就他們对于这个問題有关的三个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一些批判。

資产阶級国家干預經济的本質

右派分子完全陷入了資产阶級政治經济学的泥坑，而成为資产阶級学者的“国家决定性作用論”的宣傳者。他們認为：“馬克思关于經济危机的理論是从經济因素来分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要考虑到政治因素”，因为“战后資本主义国家的作用扩大了，国家控制了經济，它可以通过干預經济和經济軍事化来避免危机”。吳承禧就把“国家壟断資本的一些措施”，作为决定美国經济“順利”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右派分子企圖打着“上層建筑对經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幌子，来修正馬克思关于經济危机的理論，为資本主义經济制度作辯护。

誰都知道，馬克思主义認为經济基础对其上層建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上層建筑对經济基础也有反作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經济学的任务，首先是揭露資本主义經济發展的規律，并由此作出結論：資本主义經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資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同时，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經济学也特别注意上層建筑对經济基础的反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能防止危机的爆發，挽救資本主义死亡的命运。很明显，馬克思主义和“經济唯物主义”根本不同，說馬克思忽視了“政治因素”，即資产阶級学者所說的“經济外的因素”的謊言，是沒有任何根据的，这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經济学的污蔑。这除說明右派分子是别有用心以外，别無其他解釋。

在帝国主义时期，随着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尖銳化，壟断資本主义逐漸轉变为国家壟断資本主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傾向日益加强。列宁指出：“世界資本主义在上世紀的六十至七十年代曾是自由竞爭的、进步的力量，但在二十世紀初已轉变为壟断資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它在战爭期間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不仅財政資本更趋集中，而且开始轉变为国家資本主义。”①“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在于国家机構从屬于資本主义的壟断組織并被用来干預国内經济（特别是由于經济的軍事化），以保証壟断組織的最大限度利潤和巩固財政資本的独裁。”②国家干預国内經济不是因为国家控制了經济，而是因为国家机構从屬于壟断組織的結果。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国家机关和壟断組織的“私人联合”。通过所謂“私人联合”，壟断資本家进一步控制了国家机关，并使政府各領导机关变成資本巨头的附屬机構，按照壟断資本家的意志办事，奉行保証壟断組織获取最大限度利潤的政策。

資产阶級国家通过对壟断組織的貸款和津貼、收購資本主义企業的剩余产品、調整价格、扩大政府对軍事生产的撥款以及其他措施，来干預社会的經济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經济軍事化的条件下，資产阶級国家“調整”或“管理”經济的作用确有所扩大，但并沒有改变国家机構从屬于壟断組織的地位。資产阶級国家对經济的干預，可能收到某些效果，暫时刺激生产的發展或延緩

①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四版第 23 卷，第 26 頁。轉引自阿里杰尔著：“計划資本主义理論的破灭”第 29 頁。

② 苏联科学院經济研究所編：“政治經济学教科書”（上册）第二版第 280—281 頁。

矛盾的爆發。但是，这种"干預"和社会主义国家有計划地管理經济有着本質的区别，它不仅不能消灭資本主义的各种矛盾、防止危机，而且它会促使資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尖銳起来，使爆發經济危机的前提日益成熟。这首先是因为，国家干預社会的經济生活并不能消灭生产資料的資本主义所有制，因为資产阶級国家的政策是为資本主义經济制度而服务的。国家的干預既然不能改变生产的資本主义性質，也就無法改变在这个基础上發生作用的資本主义經济規律。国家壟断資本的措施与經济危机的客观必然性無关，因为經济危机的原因潜在于資本主义經济制度内，而不是潜在于国家的經济政策的性質内。

其次，国家干預經济的目的在于：保証壟断組織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潤。因此，国家对經济的干預首先有利于資产阶級，而不利于無产阶級；有利于大壟断資本企業，而不利于中小企業。大壟断企業有更多的机会吸取国家的資金，来扩大自己的生产，从而使資本和生产愈来愈积聚于少数壟断資本巨头手里。战后，在美国，一方面是大壟断組織在繼續增長，現有五百家最大的工業公司大約占全部生产和就業人数的一半；而另一方面中小企業确走下坡路，利潤的上升一直集中在最大的公司，自从1939年以来，小企業的破产已經达到了最高的数字。同时，由于美国政府对大企業的贈予和执行有利于大企業的政策，合并的速度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快。尽管生产社会化进一步加强了，但是生产資料的資本主义占有形式仍然存在。在国家奉行有利于壟断組織的政策的情况下，工人阶級所遭受的剝削是愈来愈严重，他們的处境也將更加困难。由于物价上漲和工人阶級实际收入的降低，大量經常失業人口的存在，特别由于国家对經济的干預所支出的費用用增加捐税办法最終轉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从而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压縮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此，資产阶級国家干預經济必然会引起資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和消費之間、工人阶級和資产阶級之間，矛盾的进一步增長。这就意味着經济危机的前提的增長和成熟。

再其次，在資本主义社会里，資产阶級国家不可能对整个国民經济实行計划管理，因为国家不掌握經济，唯利是圖的資本家是不会服从管理的。尽管資产阶級国家也采取过不少經济措施，但無法改变竞爭和生产無政府狀态的經济規律，因而它就不可能消除資本主义經济中的混乱或不合比例的現象。

固然，在資本主义国家里也存在着所謂国营企業，但它不可能使資产阶級国家調整国民經济的發展，因为它是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一种表現形式。修正主义者力圖把帝国主义条件下的"国营企業"說成是社会主义性質的企業，或描繪成資本主义和平長入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类讕言，老早就遭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們的严厉駁斥。在資本主义条件下，企業之轉为国有財产，并沒有消灭生产的資本主义的性質。恩格斯指出："現代国家，無論采取何种形式，在本質上总是資本家的机器、資本家的国家、理想的集体的資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掌握于自己的手中，它愈是成为实际的集体的資本家。資本主义关系，非但沒有被消灭，而且更达到了極点，达到了頂点。"① 列宁把这种"国营企業"称为"按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底式样組織起来的經济"，②壟断組織是"国营企業"的实际主人。"国营企業"这一事实，决不意味着資产阶級国家对經济的控制，而是表明国家更进一步地从屬于壟断組織，資本主义国家里所謂"国营企業"是資本巨头發財致富的手段。因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力之国有，沒有解决資本主义的矛盾，可是它却包含着这种解决的外表上的手段，这种解决的鑰匙。"③

因此，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增長，决不是資本主义經济規律的作用及其所引起的矛盾的消失；資产阶級国家对社会經济生活的干預，也决不能消灭資本主义制度先天病症——經济危机。事实也完全証明了这一点。1929—1933年的世界經济危机和1937—1938的危机，証明了国家壟断資本主义不仅不能避免危机，反而使危机具有更尖銳、破坏和持久的性質。胡佛"計划試驗"和罗斯福"新政"的破产，都証明企圖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消灭危机是一种幻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資产阶級国家对經济的作用虽然扩大了，但也未达到壟断組織所期待的效果，因为危机乃是資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

同样地，我国的右派經济学者，企圖以唯心主义的观点来否定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資本主义經济危机不可避免的理論，为恢复凱因斯主义鋪設道路，这也是一个永远不能实現的妄想。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資本主义經济危机的理論，不仅适用于自由竞爭时期的資本主义，而且也适用于帝国主义时期的資本主义。

經济的軍事化与資本主义矛盾的尖銳化

在現代資本主义条件下，經济軍事化政策是資产阶級国家借以調整經济的主要手段之一。經济的軍事化是刺激資本主义經济發展的一个暫时因素，同时也是資本主义国民經济中的有害因素。然而，右派經济学者并不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三联1951年版，第359頁。

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載"列宁文选"兩卷集，第12卷，苏联外文書籍出版局版，第203頁。

③ 恩格斯："反杜林論"，三联1951年版，第330頁。

是这样看問題的。在他們看来，經济軍事化和軍备扩張乃是資本主义經济發展的可靠基础，似乎它是使資本主义避免一切灾禍的万应灵丹。右派分子吳承禧、楊思正等認为：国民經济軍事化会引起社会生产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全面的活躍"，"通过国民經济軍事化和扩軍备战可以避免危机"。这就可以看出，吳承禧之流簡直同資本主义国家的凱因斯的信徒一样，只是妄想替帝国主义者的軍事化和軍备竞賽的政策作辯护罢了。

誰也沒有否認經济軍事化对国民經济有着重大影响，然而这种影响的后果却和右派所断言的恰好相反。

国民經济的軍事化是依靠資产阶級国家軍事預算的支出来实現的。战后，美国的軍事費用不是縮減而是增加，就可以証明这一点。

美国直接軍事費用支出总額及其在預算中的比重①

預　算　年　度	1947/48 年	1949/50 年	1951/52 年	1953/54 年	1954/55 年	1955/56 年（草案）
預算总額（單位百万元）	33,791	40,156	66,145	67,797	63,968	62,408
其中直接軍費（單位百万元）	10,963	13,010	43,847	46,509	41,900	40,458
直接軍費占預算的%	32.4%	32.3%	66.2%	68.6%	65.5%	64.8%

大量軍事費用之被用于扩大軍事生产和購置軍用品，会在一定时期內扩大国內市場，引起社会总需求的增長。因为：建立軍事工業企業或扩大原有軍事生产，需要大量的鋼、鉄、鋁等生产資料；扩大軍事生产的初期可以增加就業工人，这些新就業的人口因有固定收入而增加了新的購买力；国家軍事定貨的增長及其对軍用品的直接收購，也造成社会購买力的暫时提高。所以，經济軍事化可能通过增加国家需求来扩大軍备市場的办法，暫时刺激生产的發展，延緩危机的爆發，造成經济的表面"繁荣"。

然而，在經济軍事化的条件下，社会生产的發展并不具有普遍性，生产获得迅速增長的是第一部类而不是第二部类，是軍事生产而不是民用生产。美国，从 1940 年第一季度到 1943 年最后一季度工業总产量增長了 111%。同时，耐用品的产量增加了 198%，而非耐用品的产量只增加了 59%。在上述时期內，机器制造業的产量增加了 269%，而紡織業的产量只增加了 33%，皮革和皮革制品才增加了 3%。② 即使在和平时期，由于軍备扩張而民用生产仍然受到軍事工業的排挤。美国工業生产总指数在 1955 年为 139。同时，化学工業、电器和运輸机器制造業的指数在 1950—1955年期間增長了 45—80点，而食品、皮革和縫級工業的生产指数只增長了 3—6 点。而紡織品的生产指数在这个时期甚至还降低了 4 点。③經济軍事化对生产的刺激作用是局部性的，国民經济的片面的、畸形的發展以及經济的不稳定性的加强，乃是經济軍事化对社会生产的不可避免的恶劣影响。

如所周知，軍事工業产品是不能用于再生产的，它自己不能补償其所消耗的生产資料。扩大軍备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資料，是从現有生产資料总量中获得的。用于軍备生产的生产資料的增長，不仅会引起用于民用生产的生产資料的相对減少，而且在第一部类生产增長落后于軍备生产扩大的情况下又会發生絕对的減少。因此，軍备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資料，是靠減少用于民用生产的生产資料来滿足的。在 1943—1944 年期間，美国撥給不同軍事組織的鋼占 79%，而撥給民用組織的鋼只占 21%。生产生产資料和生产消費品的生产資料的減少，必然会导致民用生产或消費品生产的下降。由于軍事定貨的增長和高額的軍事利潤，吸引一部分民用工業資本向軍事工業轉移，也促使民用生产的縮減。因此，由于国民經济納入軍事化軌道，而社会生产的結構發生了重大变化：軍事产品的生产迅速增長，非軍事的生产消費和个人消費的产品生产急剧縮減，从而使国民經济的發展畸形化。尽管在軍事化条件下，民用生产的縮減，在一定时期內被軍需品的增長所掩盖，但是社会生产兩大部类間發展的不平衡性最終还是要暴露出来的。很明显，右派分子以資本主义經济的表面現象而不加分析地提出經济軍事化使社会生产全面活躍的荒誕的理論，是完全錯誤的。

經济的軍事化决不能使資本主义經济持久繁荣，因为它在刺激生产的同时，也加深了資本主义的一切矛盾。这就是說，經济軍事化沒有削弱产生危机的基本因素，相反地，它使这些因素更加增長和成熟。

国家軍事定貨大部为最大壟断組織所接受，因而它們享有优先获得各种資源的权利。例如，从 1940 年 6 月至 1944 年 9 月美国政府同 18,539 家公司签訂的軍事合

① 引自"財經研究"創刊号，第 44 頁。

② 特拉赫坦貝尔格："資本主义再生产与經济危机"，人民出版社版，第 163 頁。

③ "国际譯叢"，1957 年第 5 期，第 62 頁。

同中，100家最大的公司取得了定貨总額的67%，其余的18,439家中小公司只取得定貨总額的33%。①夺取了軍事定貨2/3以上最大的公司同时还得到原料和物資的大部分。这就意味着經济軍事化加速了資本和生产的积聚过程，造成中小企業的加速破产和更多的劳动力同生产資料集中到最大的資本家手里。生产社会化的加强并沒有改变生产成果的私人資本主义占有形式，壟断資本依靠其对生产資料的占有而占有了社会化生产的全部果实。这样一来，經济軍事化不是克服或削弱、而是加强了資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資料的私人資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而这一基本矛盾正是生产过剩的經济危机的基础。

在現代資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資产阶級政府扩充軍备的政策，以及攫取最大限度利潤的欲望，壟断資本家迅速地扩大生产。生产和对劳动者剝削的扩大，导致壟断組織的利潤迅速增長。美国壟断組織的利潤1938年为33亿美元，1941年为170亿美元，1942年为209亿美元，1943年为246亿美元，1944年为233亿美元，②1955年大約为432亿美元。同美国一样，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壟断組織的利潤也是迅速增加。但是另一方面，經济軍事化使劳动人民的生活下降，使基本消費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縮減。有些国家工人实际工資虽有提高，但它却远远落后于捐税的增加。軍备竞賽使捐税不断增長，因为捐税是資产阶級国家預算收入的基础。美国加在每个居民身上的負担在1929—1930年度为7美元，在1954—1955年度就增加到250美元。在同一时期，英国每年加在每个居民身上的軍事負担从2.5英鎊增加到29.3英鎊。③美国居民納税总額占1954—1955年度的預算的全部收入的68%，英国占86%，法国占83%，西德占77%。④在美国，一个劳动者家庭大約占收入总額的30%是用来支付税款的。劳动群众支付的捐税是其收入的扣除，因而这种得不到补偿的支出的增加会直接降低劳动者的消費。在这一方面，通貨膨脹、商品价格和生活費用的提高，也起着重要作用。根据1957年2月2日出版的英国"經济学家"周刊的統計：美国批發价格指数(以1947—1949年为100)：物价总指数1939年是50.1，1955年是110.7，1956年是114.3；就是說，美国去年的物价比1955年上升了3.6。⑤对工人阶級剝削的加强和失業工人的存在，以及生活費用的提高、职工实际工資的下降，都是經济軍事化的普遍性的特征。以上所有的因素以及农民基本群众的破产和收入的減少，終归要引起劳动者的貧困化，以及引起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下降。尽管右派分子主观上力圖否認这一点，但事实終究是事实。因此，在經济軍事化条件下，工人阶級和資产阶級的对抗性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更由于居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局限性而使生产和消費的矛盾日益尖銳化。

資产阶級国家为緩和生产和消費的矛盾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扩大消費者信用，是具有其重要的意义。但是，消費信用的扩大，会引起居民信用債务的增加。在美国，單是分期付款的債务1954年为235.7亿美元，1955年为290.2亿美元，1956年11月为310.2亿美元，增至1957年1月为315.52亿美元；消費信用总額1957年1月为418.62亿美元，比1946年1月增加了32.15亿美元。⑥消費債务增長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生产和消費的矛盾的增長，只不过是它用摧残未来購买力的办法暫时掩盖了矛盾而已。因此，扩大消費信用只是人为地暫时刺激消費的手段，它不仅不能克服矛盾，而且最終会导致生产和消費之間矛盾的加深。

在帝国主义时期，資本主义竞爭和生产無政府狀态的規律的作用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它使經济的發展更加不稳定，并使社会生产比例失調，而經济軍事化又加强了資本主义經济所固有的竞爭和生产的無政府狀态。

由此可見，經济軍事化加深了資本主义再生产的一切矛盾，特别是其基本矛盾以及生产和消費之間的矛盾。因此，經济軍事化只能暫时地刺激生产，延緩危机的爆發，但絕不能最終防止危机的爆發；只要資本主义制度存在，經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右派分子企圖以"避免危机論"来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危机不可避免論，这是枉費心机、徒劳無益的。我們下面將用战后美国經济發展的实踐，进一步証明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經济危机的理論不是教条，而是具有革命实际意义的普遍眞理，它仍然是無产阶級进行推翻資本主义制度斗爭中的理論武器。

区别兩种不同的"轉变"，評談战后美国經济危机

对战后美国經济情况的估計，我們和右派之間有着根本的分歧。在右派分子看来，美国战后經济發展得很"順利"，并以苏联在战爭結束时生产暫时下降和美国發

① 参看庫茲敏諾夫："国家壟断資本主义"，人民出版社版，第165頁。

② 以上資料引自苏联科学院經济研究所編"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第2版，人民出版社，上册第305頁。

③ 赫魯曉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結报告"第11頁。

④ "国际譯叢"，1957年第5期，第62頁。

⑤ 参看1957年2月20日"文匯报"。

⑥ 1957年2月28日"文匯报"。

生的是局部危机为理由，否認美国战后發生过經济危机的事实。吳承禧、楊思正和王士章都是这样一鼻孔出气的。王士章在“資本主义国家發展不平衡性的加剧和市場矛盾的尖銳化”一文①中，談到美国 1954 年的經济情况时只是輕描淡写地說“生产縮減”、“不稳定性”，而尽量迴避經济危机这个概念。

战后，美国經济有了發展，自 1947 年以来工業生产提高了 42%，这是誰都承認的事实。尽管如此，絕不像右派分子所說的那样順利。战后美国工業生产指数变动的情况是（1947—1949 年为 100）：1946 年为 90，1947 年为 100，1948 年为 104，1949 年为 97，1950 年为 112，1951 年为 120，1952 年为 124，1953 年为 134，1954 年为 125，1955 年为 139，1956 年为 144（預計）②。从这里可以看到，美国工業生产的發展，像海洋中的輪船一样，忽高忽低，起伏不定。

1955 年是美国經济“空前繁荣”的一年，工業生产的指数是 139，超过 1954 年水平的 11.2%。但事实証明，即使在工業生产迅速提高的情况下，美国各工業部門的發展也是極不平衡的，一般消費品生产部門的生产依然处于停滯的狀态。如果同苏联加以对比，就更显示出美国經济的不稳定和停滯（不是停止）的狀态。我們可以預言，随着有利于生产的暫时因素的逐漸消失和不利于生产的因素的逐漸增長，美国經济的处境將更加恶化。

1946 年苏联和美国的工業生产都有显著的下降，美国下降了大約 37%，苏联下降了大約 20%。从形式上看来，兩个国家的工業生产都是下降了，并且这种下降又是战时經济轉变为和平經济所不可避免的。但是，仅限于这种看法还很膚淺，是不够的。

我們知道，苏联在衛国战爭期間，工業地区頗大部分暫时淪陷，并遭受德国匪徒的野蛮破坏；为保証战爭获得胜利，苏联政府采取了工業向东部迁移的措施。战爭給苏联工業帶来了無法弥补的損失。美国却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情况。战爭的火焰沒有燒到美国的領土，工業生产不仅沒有遭到战爭的破坏，反而在战爭头三年里工業生产增加了一倍。因此，不加分析地同等看待苏联和美国生产下降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而且它們还有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差别，更不应該混为一談。

1946 年，苏联工業生产的暫时減退是战时經济轉入和平經济的結果，它与社会主义經济制度無关。战后，对軍用品的需要大大減少；工業企業的恢复、改建和重建都需要时間，而在短时期內，这些企業的劳动生产率又不可能迅速提高。所以，軍事經济轉变为和平經济的初期，必定会造成生产力的降低，尤其是在国民經济受到严重創伤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經济制度的优越性，使苏联改組国民經济的过程具有新的特点。首先，苏联計划經济制度，保証經济改組过程所引起的耗費縮減到最低限度，可能把改組的时間尽量縮短，并保証进行高速度的再生产。③其次，在国民經济改組的过程中，随着軍事生产的縮減，而民用品或消費品的生产日益增長。最后，战时經济向和平經济的过渡，并沒有伴随着工業生产的減退而造成工人失業和工資下降，相反地，在生产逐日增長的基础上，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福利是不断提高的。

在美国，軍事經济向和平經济的过渡，乃是按照資本主义的規律进行的。1946 年，美国的生产普遍下降，主要是由于軍事生产縮小和战时經济部分轉入和平軌道的結果。軍事定貨的縮減是造成工業生产減退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壟断組織为追求利潤而使一部分軍事生产自發地向民用生产轉移的时間拖長，竞爭也給生产帶来了不必要的損失。我們也不能忽略了由資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制約的生产和消費的矛盾，在 1943—1946 年美国生产減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資本主义經济制度有关，在美国不仅是軍事生产或生产資料生产下降，而且消費品生产也有显著的降低。例如，1943—1946 年，美国的耐用品（主要是軍用品）生产下降了 56.3%，而非耐用品（主要是消費品）生产只下降了 12.4%；当然我們并不否認个别生产部門的生产还有所增長的事实。生产的減縮必然伴随着失業的增加和工資的下降。从 1943 年 11 月到 1946 年 2 月，美国在業工人从 5,577 万人減到 5,102 万人，單是从軍用工厂中被开除的就有 200 多万人；完全失業的人数，从 44 万增加到 270 万人。在同一时期，加工制造業的工資总額下降了 40.4%。④而在这几年內，物价却在不断上漲。应当說，1943—1946 年美国的生产減退不是生产过剩的經济危机，但是在总危机进一步加深和資本主义經济規律發生作用的条件下，它的确也具有危机的某些迹象，因为这种“轉变”，是与資本主义制度內在矛盾的尖銳化有关的。

很明显，在兩种制度和兩种情况下，由国民經济改組而产生的生产縮減是不能相提并論的。企圖以苏联战后初期生产下降的事实，“論証”战后美国是無危机的發展，

① 見“財經研究”1956 年創刊号。

② 參看 1957 年第 5 期“經济譯叢”，第 9 頁。1946 年的指数是另外加的。

③ 參看沃茲涅先斯基：“衛国战爭期內苏联战时經济”，新华書店 1949 年版，第 151 頁。

④ 參看“世界經济文匯”，1957 年第 5 期，第 21 頁。从軍用工厂开除的工人数，系引自科志敏諾夫：“苏联計划經济”，天下圖書公司 1950 年版，第 94 頁。

或借此制造"社会主义危机論"，用偷天換日的办法来取消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經济危机的理論，这都是徒劳無益的。

苏联經济恢复以后，工業生产一直是高速度的直綫上升。而美国工業是在腐朽的、动蕩不稳的基础上曲綫的發展，繼1943—1946年以后又發生过兩次生产減退：第一次是在1948年10月至1949年11月，第二次是在1953年7月至1954年8月。这二次生产減退不仅与1943—1946年苏联生产下降的性質不同，而且也不同于同一时期美国生产下降的性質，它是美国战后發生的生产过剩的經济危机。

修正主义者認为，这兩次生产減退也是經济改組的結果，而且也沒有影响到美国国民經济一切部門。其实，即使單就1948—1949年的生产減縮来說，也与战时生产轉向和平生产無关，因为它是在工業生产指数1946年的90上升到1948年的104的基础上發生的。換句話說，美国軍事生产早在1946年就已經停止了下降，1948年的工業生产超过了1946年水平的15.5%。因此，美国生产下降是战后生产改組"必然現象"的說法是毫無根据的，是对客观事实的歪曲。更不能因为二次生产下降的幅度不大和涉及的范圍較狹，就否認它具有危机的性質。馬克思主义認为，"普遍危机"和"局部的危机"在形式上有区别，但这并沒有改变危机的本質。馬克思說："資产阶級生产的一切矛盾，表現在世界普遍危机中是集中的形式，而表現在局部的危机中（就內容和普及方面而言是局部的）只是零散的、孤立的、片面的形式。"①

生产減退是否具有危机的性質，首先应看这种減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凡是由資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决定的生产和消費的矛盾的增長所引起的，都具有危机的性質。其次，要看在生产下降期間是否存在过經济危机的特征性的現象，如失業增加、工資下降、企業倒閉数增加等等。基于上述，正如許多經济学家所認为的那样：1948—1949年和1953—1954年的生产縮減是美国战后發生的兩次經济危机，尽管它沒有普及到国民經济一切部門。因为，它是資本主义內在矛盾增長的結果。

战后，美国的个人消費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有減低的趋势。1929年美国用于个人消費的支出占国民收入的76%，1948年占69%，1950年占68%，1953年占63%。② 1948—1949年期間的消費和国民总产毛值的比率，由1946年的70:100下降到1948年的68:100。工人阶級相对經济地位的指标，由1951年的76.7下降到1953年的72.9。③ 而且，在危机爆發前后商品儲备总額增加，新定貨总額減少，而賒銷商品或消費信用激增。这些現象乃是反映出生产增長和人民群众購买力相应下降之間矛盾的尖銳化。而美国1948—1949年和1953—1954年的生产減退，就是在資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增長的基础上發生的。

1948年10月至1949年11月，美国工業生产下降了10%；1949年的生产水平，平均比1948年降低6.7%。在危机期間，国民收入減少了9%（1929年为基期的国民收入指数，按可比价格），相应地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46年的16.6%下降为12.2%。美国全失業者在1949年为210万人，到1949年增加到340万人。工商企業的倒閉迅速增加：1948年有3,300个企業倒閉，1949年有9,200个企業倒閉。侵朝战爭一时使危机中断，工業生产由1949年的97增長到1953年的134，接着1954年又發生了新的危机。1953年7月至1954年8月，工業生产下降了10%；1954年国民收入減少了9%（按实物形式計算），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0年的18.5%下降为1954年的12.6%。在危机时期，加工制造業部門中的在業人数和工資基金大約減少了9%；美国全失業者增加了一倍，即由1953年的160万人增加到1954年的320万人。1953年倒閉的工商業企業为8,900个，而在1954年为1,110个。④应当指出，兩次都是局部的經济危机，但第二次危机普及的范圍比第一次广闊得多。

如上所述，美国战后發生过兩次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經济危机，这是毫無疑問的。美国历次危机之所以沒有进一步地扩展或遍及到世界性的經济危机，除1950年侵朝战爭以外，主要因为軍备竞賽的加强、壟断資本对外扩張和消費信用的增長、縮減对固定資本的投資，同时危机的前提在其他資本主义国家也尚未成熟。但是，借以緩和危机的因素，同时也是加速爆發新危机的因素。随着資本主义內在矛盾的增長，美国在不久的將来必定会有新危机的来临。

1955年和1956年的美国經济狀况，是資产阶級学者称为"空前繁荣"的时期，也是我国右派借此"論証"資本主义經济危机的理論已經"破产"了的根据。但是应当知道，美国这兩年的經济發展主要是依靠扩大軍事定貨（尽管軍費支出有所減少）和扩大消費信用以及其他暫时因

（下轉第37頁）

① 馬克思："剩余价值論"，莫斯科国家政治出版局1955年版，第2卷第二部分，第209頁。

② 1954年4月19日美国"商業日报"，第6頁。轉引自"国际譯叢"1957年第4期，第9頁。

③ 1956年12月18日"光明日报"。

④ 以上資料引自："經济譯叢"，1956年第9期第41頁，1957年第4期第22頁和35頁；"国际譯叢"1957年第4期，第7頁和第10頁。

斬断右派分子伸向人口問題的魔爪

上海財經学院会計系一年級学生　張文賢

(一)应該适当节制生育

新中国誕生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領导下，經过了天翻地复的国民經济恢复时期，医治了战爭的創伤，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大規模經济建設，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正以空前的速度在一日千里地增長着。与此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亦普遍有所提高，医疗衞生条件亦在不断的改善。因而，我国人口的出生率有所增加，人口死亡率則在日趋縮小。由此，我国人口的增長速度就大为提高了。目前每年人口增長率平均为 2.2%，超过了世界上别的一切国家，人口的不断增長意味着民族的繁荣和兴旺，应該說是好事。

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我国脫胎于一个貧穷不堪的旧中国，生产力水平异常低下，我国不能在一朝一夕改变落后的經济面貌。目前的生产力水平既然还很低下，科学技术亦較落后，縱然有很多处女地等待着去开垦，然而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現代化农業机器和化学肥料供应的不足，要大規模开荒还有困难，要大大提高农作物的單位面积产量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农業發展的受到限制又不能不反过来影响到工業發展的速度。所有这些都說明要根本改变我們的落后經济狀态，是需要有一定时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証了生产的不断增長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这是肯定的，但在我国現时生产力水平还比較低下的条件下，若人口增長太快，必然要影响到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若人口增長稍慢一些，生活改善也就可以更快一些，这就是在我国現时的条件下，为什么应該适当节制生育的最根本的道理。

我們要为我們的事業和广大人民着想。誠如我們的領袖毛主席所指出的："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从来沒有做过的極其光荣偉大的事業。"是的，我們的事業是極其光荣和偉大的，这里需要熔鑄我們無穷的天才和智慧。但是，如果过多的生育，不仅会影响母亲的健康，而且因为家庭人口过多，也会影响父母的工作、学習和生活，从而把他們弄得疲乏不堪，影响他們事業的發展和进取心。我們也必須为我們的后一代着想，过早的結婚或过多的生育对后代的教育和健康也是不利的。

我們已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我們实行的是計划經济，一切事業都应按步就班地进行，人口的增加，当然也不能盲目。还远在 1881 年，恩格斯就曾說过："如果共产主义社会將来有个时候不能不調节人口的生产，就像它在这以前調节物質生产一样，那么，只有这个社会才能無困难地实現这一点……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們自己会决定：为此应該不应該，什么时候采取，怎样采取，究竟采取什么措施。"①由此可見，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在批判馬尔薩斯主义的时候，也沒有完全排除社会往后發展中有計划地調节人口增長的任何可能性和必要性。

然而，必須指出，我們主張适当地节制生育与馬尔薩斯的反动人口理論是毫無共通之处的。

(二)馬尔薩斯人口論在我国無立足之地

英国老朽而反动透頂的經济学家馬尔薩斯在 1798 年出版的"人口論"中，有这样一个荒謬絕倫的論点：人口的增長成等比級数（即几何級数，如：1，2，4，8……）而消費資料的增長至多是成等差級数（即算术級数，如：1，2，3，4……）据此就断言，人口絕对过剩是不以人們意志为轉够的。因此，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人的貧穷的命运是由于人口的增長过猛而注定的；而不能归咎于資本主义制度的罪孽——生产資料的私人資本主义所有制。由此，就得出結論，資本主义是永恒的社会。显而易見，这乃是資产阶級向劳动人民射出的烟幕彈，妄圖緩和甚至阻止阶級斗爭。就是說，資本主义長期存在，工人阶級的革命斗爭是枉費心机。这与馬克思主义是背道而馳的。

馬尔薩斯的反动人口理論，是不攻自破的。現在我們就他的論点来进行剖析和批判。

第一，是不是人口的增長成等比級数呢？我們試看以下五个国家大約包括兩个世紀期間的人口統計材料，便昭然若揭了。

国別	人口数(百万)			增加数(1850—1880)		增加数(1880—1910)	
	1850年	1880年	1910年	絕对数	对1850年的%	絕对数	对1880年的%
德国	31.7	40.2	58.5	8.5	27	18.3	45
法国	35.8	37.7	39.6	1.9	5	1.9	4
英国	17.9	26.0	36.1	8.1	45	10.1	39
意大利	21.8	28.5	34.7	6.7	21	6.2	22
美国	23.2	50.2	92.0	27.0	116	41.8	83

（据統計出版社出版："人口統計学" P.158）

① 恩格斯：給考茨基的信，見学習譯叢 1957 年第 3 期。

馬尔薩斯为了証明他的論点，便極尽歪曲捏造之能事，他閉着眼睛不看欧洲人口的增長情况，只引証美国人口自然增加的唯一資料，实質上美国人口增長較快，与自然增加毫無关系，而是由于迁徙（1850 年—1880 年，美国拥进了大批的入境移民）所决定的。这便是馬尔薩斯的"根据"！

第二，至于生活資料的增長是否成等差級数呢！我們也請事实出来給它作响亮的回答。

生产力的發展受着生产关系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下，生产力的發展得到了無限广闊的前途。

社会主义的苏联，仅在 1954—56 年就开垦了新土地 3550 万公頃，合 53250 万市亩，1956 年苏联粮食总产量增为 1953 年的 2.7 倍。

就以我国而論，我国的工業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長 10%，农業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長 5%，而人口增長率則平均每年为 2.2%，可見物質資料的增長速度大大地超过了人口增長速度，那么，馬尔薩斯的"理論"豈不是成了"狗皮膏藥"了么？

不难看出，馬尔薩斯人口論与我国当前的人口問題是水火不相容的。我們在研究任何事物的規律时，都是从考察其發生、發展及結果諸方面入手的。那么，我們就来看看，馬尔薩斯人口論与我国当前人口問題倒底有些什么本質区别呢？

試看，馬尔薩斯人口論是在什么場合下提出的呢？

我們知道，随着資本主义的發展，少数資本家手里的財富与日俱增，自由竞爭的結果，使生产技术愈益提高，从而資本有机構成亦趋提高，于是劳动者生产出来的財富中，他們自己所得的份額（以工資形式出現的可变資本）就愈發减少。机器排挤了工人以后，失業者增多，同时，資本集中使大魚吞小魚，中小資产阶級中有很大一部份分化到無产阶級队伍中来，产業后备軍的队伍愈加扩大，便形成了相对的人口过剩。在农村中，农民在地主、高利貸資本家和資产阶級政府的横征暴敛的重重盤剝下，被逼得透不过气来，紛紛破产而流入城市。于是資本家更能有恃無恐地削减工資、提高劳动强度、延長劳动时間，以最大限度地滿足資本家剝削的欲望。

不言而喻，这种現象的必然趋势是阶級斗爭的白热化，資本主义制度处于摇摇欲墜之中。在十八世紀末叶使資产阶級掌握了政权的大革命的雷声剛剛响过之后，由于产生与資本主义相联系的灾难，資产阶級"科学"中就出現了宣揚仇視人类的反动理論的馬尔薩斯。

我国提出人口問題的出發点与馬尔薩斯所說的情况迥然不同，至于我国提倡适当节育的原因已見前述，这里恕不贅述。

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劳动力的那部份人口在社会生产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居民福利的提高刺激人口迅速增長。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規律。

按照馬尔薩斯的說法，那种"过剩"的人口，就要用"战爭、疾病、瘟疾、飢餓"等办法来消灭。而在我們国家里，是如何使劳动力得到更合理、更充分的使用。我們对于較多的人口，决不是理解为更大的什么自然压力。而是理解为更大的社会的生产力。

無庸諱言，馬尔薩斯人口論在我国是沒有立足之地的。

（三）斬断右派分子伸向人口問題的魔爪

我国的右派分子非常欣尝馬尔薩斯人口論。他們認为在我国已經發生了所謂"人口压力"和"人口过剩"的情况。他們把人口問題提到尖銳的阶級斗爭和政治斗爭的高度，妄圖借以复辟資本主义。在不平常的春天里，右派分子利用人口問題来进行煽动、挑撥和扩大矛盾，企圖在我国挑起"匈牙利事件"。

右派分子陆欽范（农業科学院三級研究員）就是利用人口問題向党进攻的急先鋒。他花了三百数十元印了一万份他自己写的極端荒謬的小册子——"人口問題拋磚集"，在这本小册子中，他把新社会描繪得漆黑一团。試看：

"解放以前是三个人的飯，五个人吃，現在生活改善了，四个人的飯，八个人吃"——"人口問題拋磚集"。

昧着良心說瞎話是右派分子的伎倆之一。解放以后，多少工人从破草棚搬进了工人新村，多少农民脫下了一补再补的棉襖換上了新裝，他們难道都不看見？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是右派分子却丧心病狂地誣蔑新社会。陆欽范妄称中国資源貧乏，人口問題是目前社会主义建設的根本矛盾。他說："假如我是蔣介石或杜勒斯，我就希望大陆上每一个十五岁到五十岁的妇女以每年生一个孩子的速度进行生育。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間里，比匈牙利事件規模更大的騷乱，就会在我国發生了。虽然这种假設的極端情况，仅是寓言性質的，我希望文艺工作者，在此百花齐放之春，可以取材于此，写一些产妇群众們如何不滿，砸医院，砸牛奶場，砸工会要求福利等，这是第一阶段，接着是父母們为了要求送孩子入学，砸学校，城市青年們要求就業，砸工厂，农村青年們为了扩大不了耕地面积，紛紛离开合作社，以至牲口們为了养犢育駒，要求飼料地等等。"（"人口問題拋磚集"）

我們不禁要問：我国的人口問題是否如此严重呢？在現实生活中根本沒有砸医院、砸牛奶場……的事情，那为

什么硬要作为反映現实生活的文艺作品来描写这些呢？右派分子的居心是恶毒的，他妄想在人口問題上抛出一塊砸坏社会主义大厦的"磚"！

利用人口問題向社会主义射出毒箭的老手——右派分子吳景超，把我国龐大的人口，看成是"我們生活的最大敌人"。他老早就認为"节制生育运动是各种救国事業之中一种最重要的事業，是建造新中国的各种办法中一个最有效的办法。"但在解放以后的光天化日之下，他大概也覚得这种"理論"太露骨了，于是把明槍調成了暗箭——在"中国人口問題新論"中，他提出"中国必須实行节育"，而將人口的自然增殖率降低到千分之五左右，降低到旧时代的水平以下，降低到世界最低的水平上。他的基本論点，大致如下：一、人口太多，大量地消費了可以积累的資金，因此無法裝备高度技术，而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所要求的。二、拿这点有限的資金，按照这个規律办事，每年所能新增加的就業人口就很少，就会有越来越大量的人失業。三、如果一定要增加就業人口，就只有降低劳动生产率；但那就是社会的后退，談不上什么社会主义了。四、那么，讓一部分人先走一步，裝备高度技术，讓另一部份人暫时裝备比較落后的技术行不行？不行。因为这不合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的要求。归根結蒂，就是社会主义对中国来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吳景超在积累問題上大做其文章，企圖証明：因为人口过多，所以消費很大——积累極少——不敷分配——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業——只能多搞中小型企業——不可能实現社会主义工業化——而列宁說："沒有大工業，就沒有社会主义"。——所以不可能实現社会主义。

既然吳景超对积累問題深感兴趣，那末，我們就来談談积累問題吧。

在我們国家里，社会主义的积累是通过不断增加的国民收入及將其合理分配为积累基金和消費基金而实現的。积累的多寡乃是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多寡，不断增加的国民收入驅使积累基金和消費基金不断增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資料公有制，消灭了人剝削人的現象，劳动人民作了主人，因此就具有資本主义社会所不可想象的高度的劳动热情，这就成了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長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劳动生产率增長——国民收入增長——分配为积累基金和消費基金亦增長，这是無庸置疑的道理。

显然，吳景超乃是馬尔薩斯主义的忠实信徒。他根本否定了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否認了人是社会产品的唯一創造者，他的"积累問題"的文章的主題思想無非是物質資料的增長远不如人口增長的那么快，这不是很明显么？

事实总是最强烈的証明者。解放八年来，我們的噴气式飞机、解放牌汽車、拖拉机不都是制造了嗎？我們的举世聞名的長江大桥不是通車了嗎？事实雄辯地証明，我們能建設重工業、大工業，而且已經在建設重工業、大工業。从这个角度出發，我們追溯到人口問題上，我們請問右派先生：人口是不是如象你們所說的那样給建設事業帶来了灾难呢？

人口問題是不是如右派分子所說的是"目前社会主义建設的根本矛盾"呢？显然不是的。毛主席說得好："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們各方面的建設事業都在蓬勃地發展着，成績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問題还是很多的。又發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們的方針是統筹兼顧、适当安排。"

右派分子还处心积虑地曲解和誣蔑我們的节育政策，企圖燃起反党的万丈凶焰。請看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黃万里在小說"花叢小語"中的一段描写："……例如东安市場的避孕套解放以来据統計曾經通过無——有——無——特多等反复步驟，实际上是反映着領导对于人口問題的認識的改变，我看不出客观条件有什么改变。尽管馬寅老懂得这些，他也不可能起作用。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作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腦袋被認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的作用。这就是現政治的特点（重点引者所加）……"。

不难看出，这就是右派分子的心声！作者在这短短的几百字中，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登峰造極"的反党的丑恶面目。共产党向来是关怀人民的，却被說作"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作阿斗"，而且还是現政治的特点（！）我們的党对于人口問題的認識是始終不澈的，刘少奇同志早在1953年就亲自召集过座談会来討論人口問題，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他們的报告中都提到了这个問題，难道这能是"領导对于人口問題的認識的改变"嗎？

右派分子之所以在人口問題上猖狂的叫喊，乃是别有居心的。他們想利用人人所关心的节育問題，向党射出毒箭，从而挑起"匈牙利事件"，最后达到复辟資本主义的目的。

不过，紙总是包不住火的，陰謀終归要被揭穿，伸向人口問題的魔爪总要被斬断的。我們的人民指着右派分子的鼻子，坚决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过渡时期社会生产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間的比例关系(下)

鄒 宗 伊

2. 积累与消費比例关系的变动

前面分析补偿基金与国民收入比例变动对兩大部类比例变动的影响时，曾假定积累与消費的比例不变。現实生活表明积累与消費的比例乃是經常有所改变的。积累与消費比例的变动对兩大部类生产比例变动間的相互适应关系如何，請見下式：

$$P_1=C+\Delta m-\Delta V=C+\Delta C$$

$$P_2=V+m+\Delta V$$

$$\therefore P_1:P_2=(C+\Delta m-\Delta V):(V+m+\Delta V)$$

$$\Delta m:(V+m)=(P_1-C+\Delta V):(P_2-\Delta V)$$

上式中的 Δm 是积累基金，ΔV 是以消費資料形式形成的积累。$\Delta m-\Delta V=\Delta C$。$\Delta C$ 是进入积累基金中的生产資料。$V+m$ 是消費基金。所以，按照表式，生产資料的生产取决于补偿基金加上进入积累基金中的生产資料；消費資料的生产取决于消費基金加上以消費資料形式形成的积累。生产資料生产与消費資料生产的比例应当同补偿基金加上积累起来的生产資料生产与消費基金加上积累起来的消費資料生产的比例相适应。由此可見，积累与消費的比例同兩大部类比例变动間的依存关系是比較复杂的。第一，假定 $C:(V+M)$ 的比值不变以及积累基金中 ΔC 与 ΔV 的比例不变，那么，很显然，积累与消費的比例同兩大部类的比例应成同方向的变动，惟二者变动的程度并不相等。因为影响兩大部类比例变动的內在因素不只一个，而是三个。假定其他兩个因素不变，仅有积累与消費的比例發生变动，在这种情形下，兩大部类比例变动的程度必然要慢于积累与消費比例变动的程度。第二，假定其他兩个因素同时發生变动，而其变动的方向和积累与消費比例变动的方向相反，这时候，即使积累与消費的比例有所改变，兩大部类的比例可能不变；相反地，即使兩大部类比例發生变化，积累与消費的比例亦可能不变。所以，純从抽象的理論出發，兩組比例变动之間似乎不一定有直接的相互依存关系。但若考虑到过渡时期現实生活情况，却又不然。

第一，現实生活表明，积累的增进是和技术进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并行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長，使社会总产品中补偿基金的份額提高。与此相适应，要求在全部社会生产中增加新技术的生产，用来提高劳动的技术装备程度，从而引起强度积累之必要。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增进，又为进一步扩大积累規模創造条件。所以，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增进，不但引起补偿基金和积累基金的絕对量迅速增長，而且要求补偿基金与积累基金的增長速度超过国民收入价值量的增長速度。其結果，在社会总产品中补偿基金的比重上升，在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的比重上升，与此相适应，在全部社会生产范圍內第一部类生产的比重亦应上升。

第二，根据現实情况，积累基金的物質內容主要是由生产資料所組成，消費基金則由消費品所組成。很显然，积累与消費比例关系的重大改变，必然要受到生产資料生产与消費品生产間比例关系的制約。当积累比重上升时，第一部类生产比重亦須有相应的上升；积累比重下降时，第一部类生产比重亦須有相应的下降。当然，兩組比例关系的变动，并不存在着数量上一致的相互

关系。

既然积累与消費比例的变动，直接間接要求兩大部类的比例有相适应的变动（同方向而不同程度的变动），那么，为了正确确定兩大部类的比例关系，就有进一步研究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費比例的原則的必要。

在生产資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积累与消費之間，沒有阶級对抗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积累的最終目的，是为了不断地提高人民的消費水平。人們今天节約消費、增加积累，是为了將来能够根本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大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从長远看来，积累与消費的利害是一致的。但在一定时期之內，二者之間仍有相对的矛盾。因为积累和消費是国民收入最終使用的兩个方面，提高一个方面的份額必須降低另一个方面的份額，二者比重的同时提高是不可能的。

在已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积累与消費比例的变动，在經济上存在着下列兩个方面的限界：①

（一）最低积累額的限界　在社会生产力高度發展的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長，积累額与消費額兩俱增加。在每一个計划时期积累額的增長不得少于这样的限度：它使生产規模扩大，使生产性固定資产和流动資产增加，以至达到能够保証：第一，因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从生产过程中解脫出来的劳动力都能就業；第二，有劳动能力居民的增殖数量都能被容納参加生产。提高消費基金的比重要受到这个最低积累額的限制。

（二）最低消費額的限界　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計划时期，消費基金的增長不得少于人口的自然增殖。只有这样，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消費額才不致低于报告期的原有水平。在正常情况下，这是一个最低的消費額，提高积累的比重要受到这个最低消費額的限制。

社会主义社会在处理积累和消費比例关系的問題上，設定最低限度的消費額和积累額的限界，为的是使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得以發揮其完整的作用，为的是使社会主义生产能够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不断增長和不断完善，以保証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随着社会主义社会高度生产力水平的迅速發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收入的增長速度經常大大超过其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这就使得最低限度消費額与积累額限界的范圍日益扩大。在这个限界范圍內，苏联埃国家可以根据各該时期的內外具体条件，适当地改变积累和消費的比例关系。

在我国过渡时期，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国民收入的增長超过人口自然增殖的幅度还不大，同时我們要进行大規模的經济建設，以便在三个五年計划时期或者更多一点时間內完成我們国家的社会主义工業化，建立起一个大体上完整的工業体系，使我国由一个落后的农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工業国。为了实現这一任务，必須要有一定規模和速度的积累。因此，我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便不能要求过高过快。但因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原来就比較低，随着生产的發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能不及时地逐步改善。这就是說，人民生活一方面不能不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又不能有过多的改善。在發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我們国家所掌握和努力貫澈的正确方針。

至于談到积累，那么，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增殖又快，現有生产力水平暫时还不能使积累的規模和速度足以保証有劳动能力居民都能就業，这是我国現实經济生活中的一个矛盾。克服这个矛盾的办法，在于扩大与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同时提倡計划生育。除此之外，我們国家的技术政策和积極貫澈勤儉建国方針，都起着积極的作用。这里我們仅談一談如何加强积累运用的效果，以便在一定規模和速度的积累下，生产更多的生产資料和消費品，从而扩大积累的补充資源，以便容納更多的就業人口。

（一）投資的集中使用　积累基金的絕大部分用于基本建設投資。投資的集中使用是保証投資迅速生效的方法之一。假定現有10个建設

① 参閱諾特金著：“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論概要”，中华書局1952年版，第151、165頁。

單位，每个需要一亿元的投資。再假定每年有十亿元的資金用来建設。如果把这十亿元的資金分散投到10个建設單位上，同时动工兴建，那么，每个建設單位的建設时間都要拖到十年才能动用。如果把每年十亿元的資金集中投到一个建設單位上，在技术条件許可的情况下，那么，每年都有一个建設單位开始动用，投入生产。可見集中使用投資較之分散投資能够减少未完工建筑，縮短建設期限，加快建設速度，迅速增加生产資料和消費品的生产。当然，在集中使用投資的原則下，必須照顧到鄰近部門动用的能力和时間能够取得平衡。也就是說，要防止重点过分突出，以致造成国民經济發展中的比例失調，反而阻碍了重点建設的順利进行。

（二）大、中、小型企業的合理配合　大規模企業有許多优点，它的規模大，便于采用先进技术，实行广泛地分工和劳动專業化，因而，大規模企業的劳动生产率較高，成本較低。我們在社会主义建設期間要建設許多規模巨大的工業企業，以組成我国完整工業体系的骨干，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建設大規模企業需要大量的資金，較長的时間，如果样样大規模，就会使我国有限的建設資金拘束在少数几个工業基点上，在一个相当長的时期內不能發生投資效果。此外，大規模企業的产品專一，生产量大，如果沒有中、小企業相配合，不論在建設过程中往往会發生建筑材料及工人生活資料供应不足的困难，就是在投入生产以后，产品銷路和原材料的供应亦往往發生問題。大規模企業的优点就是中、小型企業的缺点。但是，中、小型企業的建設，投資少、时間短、收效快。例如，建設一个年产150万吨鋼鉄的鋼鉄厂，需要資金12亿元到15亿元左右，从設計到建設完畢需要九年的时間，到第六年才能出鉄。如果用相同数量的資金来建設年产16万吨左右的鋼鉄厂，可以建設11个到13个，每个厂从設計到建設完畢約需四年时間，在开始建設的第三年就可以出鉄。①这就是說，把建設150万吨大型鋼鉄厂的資金用来建設小型鋼鉄厂，它的总产量可以达到170万到200万吨。而且因为小型厂的建設期限比較短，在同样时間內，可以多产几十万吨的生鉄和鋼材。与大規模企業相比較，中小型企業的产品多样化，能满足多方面的需要。中小型企業的建設能分布在全国各地，可以就地取材，充分利用地方資源，使工業分布更加合理。此外，中小型企業的机械化水平較低，能容納較多的劳动力，对于就業問題的解决是有利的。所以周总理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議的报告中說，在每一类企業中，一般地說都应該有一些大型的企業作为骨干，又应該有許多中、小型企業来配合。②为此，在一定时期內的总投資額中必須对大規模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建設之間，即長期建設和短期建設之間，确定一个适当的分配比例。这个比例至少要使長期建設所需要的生产資料和消費品的供应保証能从社会上取得，而在大規模企業投入生产之后，資源和銷路都不成問題。

（三）建筑过程組織的完善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提高建筑过程的組織和技术水平，是直接加快建筑速度的方法。如果建筑部門对于所要建設的每个工程項目的兴工完工的先后次序安排得合理，对于勘察設計、施工及物資供应等各个环节的协調都組織得很好，显然是能够加快建筑速度的。加强和改善建筑工業的技术水平，采用先进的工厂化施工法，推行建筑設計的标准化，都能縮短建筑期限，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

3. 进入积累基金中的生产資料和消費品間比例的变动

影响第一第二兩大部类比例关系变动的第三个內在因素是进入积累基金中的生产資料和消費品間比例的变动。进入积累基金中的生产資料 ΔC 是第一部类产品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应当等于第一部类产品减去补償基金之差。只有第一部类产品大于补償基金所多余的部分，才进入积累基金，組成积累基金中的 ΔC。进入积累基

① 見"人民日报"，1957年4月11日社論。

② 周恩来："关于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議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頁。

金中的消費品 ΔV 是第二部类产品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应当等于第二部类产品减去消费基金之差。只有第二部类产品大于消費基金所多余的部分，才进入积累基金，組成积累基金中的 ΔV。由此，我們得公式如下：

$$\Delta C = P_1 - C$$

$$\Delta V = P_2 - (V + m)$$

$$\therefore\ \Delta C : \Delta V = [P_1 - C] : [P_2 - (V + m)]$$

上式表明，进入积累基金中的生产資料和消費資料間的比例，等于第一部类产品减补偿基金之差对第二部类产品减消費基金之差的比例。在补偿基金和国民收入的比例以及积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比例不变的条件下，ΔC 与 ΔV 比例的变动应該和 P_1 与 P_2 比例的变动相适应。也就是說，兩組比例变动的方向应該是相同的，当然，它們变动的程度并不相等。

必須指出，上述补偿基金与国民收入比例不变而 ΔC 与 ΔV 比例可变的假定，是与現实情况不相符合的。因为，从再生产过程看来，ΔC 与 ΔV 比例的变动乃依存于 C 与 $V+m$ 比例的变动。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曾写道："剩余生产物是以什么比例分割在可变資本和不变資本之間，那要看資本的平均構成而定。"① 資本有机構成是决定資本化剩余价值分成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比例的前提。如果資本有机構成保持不变，也就是說，如果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生产方法依然保持不变，那么，轉化为資本的剩余价值部分分成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兩个部分的比例，也將保持不变。生产發展的程度越是高，轉化为不变資本的剩余价值部分，和轉化为可变資本的剩余价值部分相比，就会越是大。②

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进入积累基金中的生产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比例的变动，是同补偿基金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以及兩大部类生产比例的变动紧密联系着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技术的不断地快速地进步，表現为劳动的技术裝备程度的不断地快速地提高。与此相适应，在归社会的产品中，以追加生产資料的形式积累起来的部分越来越多，以追加消費資料的形式积累起来的份額越来越少；表現在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中，第一部类生产的份額在增加，第二部类生产的份額在減少。

社会主义社会的积累基金，絕大部分用于扩大固定資产的投資。用于扩大生产性固定資产的投資（如工矿企業等的建設）部分，表現为追加的生产資料的生产；用于扩大消費性固定資产的投資（如住宅、剧院等的建設）部分，表現为追加的消費品的生产，前者由进入积累基金中的生产資料所組成，后者由进入积累基金中的消費資料所組成。在过渡时期，技术的根本变革，要求进入积累基金中的生产資料与消費資料的比例，朝着有利于 ΔC 的方向轉变。因此，在扩大固定資产的投資总額中，必須尽可能地縮減消費性投資，提高生产性投資所占的比重。

积累基金在生产性投資与非生产性投資之間分配比例的变动，部分地反映着扩大再生产速度与人民生活改善之間的关系。很明显，生产性投資愈多、进一步扩大生产的可能性也会愈大；非生产性投資愈多，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条件就愈好。所以，我們的計划机关，在确定生产性投資与非生产性投資的分配比例时，必須考虑到国家建設（扩大再生产）速度与人民生活改善之間的正确結合問題。当然，要全面地反映扩大再生产速度与人民生活改善之間的关系，还要看这些生产性投資中以何种比例分配到制造生产資料部門的生产性投資，以何种比例分配到制造消費品部門的生产性投資来决定。关于这个投資分配比例問題，我們留在第三节中再討論。

4. 第一第二兩大部类技术水平增長速度的对比关系

由上所述，第一第二兩大部类比例的变动，須与上述三个因素变动綜合發生作用的結果相适应。如果把这种相互适应关系用一个总括性的公式表示出来，有如下式：

---

①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三联書店 1957 年版，第二卷，第 593 頁。

② 参閱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三联書店 1957 年版，第二卷，第 576—577 頁。

$$P_1 = C + \Delta C$$

$$P_2 = V + m + \Delta V$$

$$\therefore\ P_1 : P_2 = (C + \Delta C) : (V + m + \Delta V)$$

上式表明，第一部类产品价值的增長速度应該和补偿基金加积累起来的生产資料的价值的增長速度相适应，第二部类产品价值的增長速度应該和消費基金加积累起来的消費資料的价值的增長速度相适应。第一部类产品价值与第二部类产品价值間的比例，应該和补偿基金加积累起来的生产資料的价值对消費基金加积累起来的消費品的价值間的比例相适应。这就是我們确定兩大部类比例关系的具体依据。

但是，計划統計工作的实踐告訴我們，在实际工作中确定第一第二兩大部类的增長速度时，不是用价值量来表現，而是用实物量来表現（即按不变价格計算）的。由于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結果，社会产品使用价值总量的增長速度要超过其价值总量的增長速度。如果兩大部类产品的使用价值量的增長速度超过其价值量的增長速度的程度是相等的，那么，用实物量表現的兩大部类增長速度对比关系同用价值量表現的兩大部类增長速度对比关系是一致的。然而，事实上，兩大部类实物量增長超过其价值量增長的程度是不相等的。一般說来，第一部类的技术水平增長較快，劳动生产率提高較多，故第一部类产品实物量超过价值量增長的程度要比第二部类来得大。这就是說，如果从价值量上看，第一部类产品增長速度超过第二部类，那么，从实物量上看，其超过的程度是更大。因此，在确定兩大部类增長速度的对比关系时，根据上述公式确定它們价值量的增長速度，必須再按兩个部类实物量增長速度超过其价值量增長速度的差額来加以修正。例如，假定报告期兩大部类的产值为 400 亿元与 600 亿元之比，計划期第一部类产品价值量增長 100%，第二部类产品价值量增長 50%。再假定第一部类产品实物量增長速度为其价值量增長速度的 1.4 倍，第二部类产品实物量增長速度为其价值量增長速度的 1.2 倍，則計划期兩大部类产品价值量和实物量的比例应如下：

	报告期	計划期			
		价值量		实物量	
	价值量	絕对量	比重	絕对量	比重
第一部类产量	400亿元	800亿元	47%	1120亿元	51%
第二部类产量	600亿元	900亿元	53%	1080亿元	49%

第一部类实物量增長超过其价值量增長的倍数比第二部类实物量增長超过其价值量增長倍数較大的程度，由第一部类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較第二部类增長更快的程度来决定。所以，兩大部类技术水平增長速度的对比关系就成为决定兩大部类生产实物量增長速度对比关系的一个因素。这一因素虽然是由于实际計划工作的需要所引起的，但它却反映着客观的現实情况。

三　改变兩大部类比例的物質經济前提

前面第二节所講的影响兩大部类比例关系变动的各項內在因素，不可以理解为这些因素片面地决定着兩大部类比例的变动。相反地，这些因素变动綜合發生作用的結果，要受到兩大部类比例关系的制約。因为在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生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生产結構的重大改变，能够使社会生产結果的分配發生相适应的变动。所以，就計划工作来說，上述各因素变动綜合發生的作用，只能視为对兩大部类生产結構的改变提出了要求，而生产結構改变的可能性，还要具备一定的物質經济前提。

首先，要改变兩大部类生产間的比例，必須改变兩大部类投資的分配比例。这里我們所說的投資，是指追加的生产性固定資产和流动資产（物資儲备）的投資。全部社会积累基金中用于追加生产性固定資产和流动資产（物資儲备）的数量，由第一部类的产品超过兩个部类补偿生产过程所消耗的生产資料的余額来决定，即由 $I(V+M)$ 大于 IIC 的差額的大小，亦即我們公式中 ΔC 的大小来决定。ΔC 在第一第二兩部类間投資的分配，存在着兩个方面的極限。一个極限是把 ΔC 全部用于第一部类固定資产和流动資产的扩大上，这样，第一部类的生产規模虽然扩大了，第二部类却完全沒有积累，消費品的生产規模不能有

所扩大。人口增長而消費品的产量不变，就会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这样繼續下去，就会使生产完全脫离消費，变成純粹为生产而生产，这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的要求相違背的。另一个極限是把 ΔC 全部投入第二部类固定資产和流动資产的扩大上。这样，第二部类的生产虽然得到迅速增長，人民虽然能够多得到一些消費品，但是，这样下去，整个社会生产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將愈来愈小，因为 ΔC 的数量將愈变愈小。ΔC 是 $I(V+M)$—IIC 的差額，假使把 ΔC 全部投入第二部类，則第二部类的生产規模扩大了，IIC 在增加，而第一部类的生产規模沒有改变，$I(V+M)$ 不变，結果，$I(V+M)$ —IIC 的差額 ΔC 便愈来愈縮小。用不着好久，第一部类的产品就只够补偿兩大部类生产过程中生产資料的消耗，乃至达到簡單再生产的条件，这也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不相容的。在兩个極限的范圍內，国家可以根据各該时期的內外条件，考虑到国家建設速度与人民生活改善之間的关系，考虑到長远利益与目前利益的正确結合，来确定兩大部类投資分配的比例。

假定通过投資而新增加的生产性資产每單位所能获得的年产量在兩个部类是相同的，那么，为了保証生产資料生产比消費品生产能够更迅速的增長（这是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实現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必須使第一部类生产性資产的投資在全部生产性資产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大于其生产在全部社会生产中原来占有的比重。大多少，要看計划期兩大部类生产增長速度的对比关系而定，亦卽計划期第一部类生产增長超过第二部类生产增長的程度来决定，須得注意的是：(一)按照实际情况，新增資产所能获得的年产量在兩个部类是不相同的。一般說来，第一部类技术水平較高，进步較快，出产單位产品所須占用和消耗的固定資产較多，卽使計划期兩大部类生产增長的数量相同，第一部类所需要的固定資产投資亦比第二部类为多。(二)每个計划时期各个部类都有一部分投資在本期內未能动用，因而对本期的增产不發生效果。同时，每个时期各个部类都有一部分投入生产的建設，是过去时期的投資而在本期动用的，它对本期的增产發生作用而無須在本期花費投資。我們把一定时期內基本建設动用量对投資的比例叫做动用系数。如果計划时期兩个部类基本建設动用系数不等，那么，为了保証計划期既定的兩大部类生产增長速度的对比关系的实現，在确定兩大部类投資分配比例上，除了应当考虑兩个部类新增資产所能获得年产量的差額外，还应考虑到計划期兩个部类基本建設动用系数間的差額。如果說計划期第一部类占用在儲备工程上的投資較第二部类为大，因而其基本建設动用系数較第二部类为低，那么，ΔC 在第一部类投資的分配比例就应当更大一些，而投資于第二部类的比例就应該更縮小一些。由此可見，决定兩大部类生产性資产投資分配比例的具体依据是：(1)計划期初兩大部类生产原来已經形成的比例；(2)計划期內兩大部类生产增長速度的对比关系；(3)兩个部类新增資产每單位所能获得的年产量的对比关系；(4)計划时期兩个部类基本建設动用系数的对比关系。

以 ΔC_1 代表投入第一部类生产性資产部分，ΔC_2 代表投入第二部类生产性資产部分，$\Delta C_1+\Delta C_2=\Delta C$。为了使第一部类生产在全部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时，达到占絕对优势的地位，必須使 $IC+\Delta C_1$ 在过渡时期末能够大于 $IIC+\Delta C_2$。这里，兩大部类新增資产每單位所能获得年产量以及基本建設动用系数的差額，也必須另外加算进去。这就是过渡时期确定生产性資产在兩大部类投資分配比例的基本原則。

要改变兩大部类投資分配的比例，也就是說，要把用于扩大生产性資产的投資由一个部門轉移到另一个部門，这不仅仅是一个預算撥款的再分配問題，而且必須使这种預算撥款的再分配得到实物保証。因为，投入第一部类生产性資产的投資，在实物形态上，必須是制造生产資料用的生产資料；投入第二部类生产性資产的投資，在实物形态上，必須是制造消費資料用的生产資料。这兩种生产資料虽然都屬于第一部类的产品，但它們的經济用途是不相同的。例如，各种

車床、熔鉄爐設备及鉄矿石等就是屬于制造生产資料的生产資料；而紡織机器和絕大部分农产原料等就是屬于制造消費資料的生产資料。如果第一部类内部制造生产資料用的生产資料的生产的增長速度快于制造消費資料用的生产資料的生产的增長速度，那么，下一时期，第一部类生产的增長速度也就有可能快于第二部类生产的增長速度。所以，要改变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的生产比例，除了要改变兩大部类投資的分配比例之外，必須相应地改变第一部类内部的生产構成，亦卽改变制造生产資料用的生产資料与制造消費資料用的生产資料生产間的比例。

以IA代表第一部类制造生产資料用的生产資料的生产，IB代表第一部类制造消費資料用的生产資料的生产，則IA与IB的生产構成变动与生产性資产在第一第二兩大部类間投資分配比例变动的相互适应关系如下式：

$$IA=IC+\Delta C_1$$

$$IB=IIC+\Delta C_2$$

$$\therefore\ IA:IB=(IC+\Delta C_1):(IIC+\Delta C_2)$$

这就是說，制造生产資料用的生产資料的生产，应当与第一部类的补償基金加上投入第一部类的生产性資产相适应；制造消費資料用的生产資料的生产，应当与第二部类的补償基金加上投入第二部类的生产性資产相适应。IA与IB生产增長的比例，由兩大部类补償基金原有的比例和增長速度的对比以及兩大部类生产性資产投資的对比关系来决定。当第一第二兩大部类生产性資产投資的分配比例發生动变时，要求IA与IB的生产比例有相适应的改变，否則投資分配比例的变动就会缺乏实物保証。

可是，要改变第一部类内部IA与IB的生产構成，同样要改变IA与IB投資的分配比例，而要改变IA与IB的投資分配比例，又必須改变其他有关的物質生产構成。这样推演下去，整个社会物質生产構成以及生产資料和劳动力的分配都要發生相适应的变动。就計划工作来說，这种变动有賴于編制正确的国民經济平衡表，各种物資平衡表及劳动力平衡表来确定。正确的平衡表必須有相应的措施，才能对客观过程發生效力。然而，在一个短促的时期內，要使整个社会物質生产構成發生相适应的变动，往往是有困难的。例如，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时期要进行以重工業为中心的大規模經济建設，这就需要大量具有高度技术水平的巨型的和精密的机器設备，而国內的机器制造業限于技术水平和制造水平，生产出来的設备不完全适合建設上的需要。这就使得一方面建設上所需的机器設备不能得到滿足，另一方面机器制造業生产出来的产品却又缺乏銷路。要把我国机器制造業改造成为能够制造适合于和滿足国家建設所需机器設备的部門，却不是一个短时期內所能办到的。过渡时期兩大部类投資分配比例的重大变动，引起了物質生产構成改变过程中一系列的矛盾。計划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就在于通过各种有效途徑，对改变物質生产構成的可能性加以最大限度的利用。

第一，通过新建企業的陆續投入生产及原有企業的改造来逐步克服物質生产構成变动中的不平衡現象。以机器制造工業为例，我国从1953年到1956年的四年中間，投入生产的新建和改建的机器制造工厂，限額以上的已經有三十三个，此外还有十几个厂部分地投入了生产。投入生产的三十三个限額以上的工厂，能制造船舶、汽車、大型工作母机、中型和大型發电机、精密电气仪表、全套紡織机器等重要机器設备。它們所增加的年产能力，已經远远超过了解放前我国从1862年建立近代化机器工業以来八十多年內所达到的水平。預計1957年还將有十多个机器制造厂投入生产。①同时这一年已經在齐齐哈尔市动工兴建我国第一座制造全套大型冶煉、軋鋼設备的現代化重型机器制造厂。这个厂建成以后，將能制造我国过去不能制造的最新式大型的初軋机、鋼軌桥梁軋机、無縫鋼管軋机、鋼板軋机、五百吨容量的大平爐和1,500立方公尺容量的大高爐。我国不能生产的許多中厚鋼板、粗大的無縫鋼管都可以用这些設备来制造，它將供給我国电机厂、汽輪机厂、大型机器厂需要的各种大型鍛軸和其他大型鑄鍛件②。与新建企業陆

① 見"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7日第1版。

② 見"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3日第2版。

續投入生产的同时，对原有修配性質的机械工業也已經和正在进行改造，使它們改造成为制造工業。通过对原有机械工業从修配到制造的改造，以提高工厂的技术水平和組織水平，改善产品的質量和提高生产能力，来适应国家建設的需要。通过这些途徑，我国机械工業技术水平已大大提高。1957年我国机器制造工業总产量預計比1952年增加了三倍以上，从1953年到1957年，机械工業試制成功的新产品共达三千种左右。① 机械工業如此，其他許多重要工業部門的情况也是一样。

第二，通过物資的正确分配及节約和合理利用，来扩大原材料資源，緩和原材料供应紧張的矛盾。有許多产品既可供生产資料之用，又可作消費品使用。如煤炭、电力和石油既可用作工农業生产及交通运輸業的动力燃料，又可以供居民家庭日常生活之用。鋼鉄可以制造机器及各种生产工具，又可作为制造自行車、鉄床、鉄椅和食具的材料。各种建筑材料可以用来建筑工厂，亦可以用来建筑住宅。在我国目前原材料供应紧張的情况下，各級物資供应部門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正确的分配原材料，防止和消除人为的緊張現象，以保証生产和建設需要的及时供应。各工業部門及企業亦应主动設法寻找和节約原材料并利用节約下来的原材料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商業部門則应采取积極的措施，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采購計划，以扩大輕工業的原料資源。

第三，通过对外貿易作为改变国内物質生产構成的阶梯。在过渡时期初期，国内生产、建設所需要的机器設备和各种器材，有一部分須通过对外貿易从世界市場上取得，而以出口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去交換。这样一来，原来屬于第二部类的产品就有一部分变成第一部类的产品。因此，通过对外貿易，前述确定兩大部类增長速度对比关系的具体依据② 就应当有所修正。假定进口生产資料，出口消費品，那么，第一部类生产就应該与补償基金加积累起来的生产資料再减进口的数量相适应；第二部类生产应与消費基金加积累起来的消費資料再加出口的数量相适应。

我国是一个地大人多、資源丰富的国家，我們有必要和可能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工業体系。对外貿易只能作为改变国内物質生产構成的阶梯，不能代替生产構成的改变。例如，1952年国内需要的机器設备有50%依靠进口，1953年国内需要的鋼材約有40%依靠进口，由于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对我国無私的援助，我們在这方面具有許多有利条件。通过这些設备器材的进口，我国自己的机械工業和冶金工業也就逐漸成長起来了。到1957年，机器設备的自給率已經提高到60%左右，鋼材的自給程度高达88%，这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机械工業和鋼鉄工業迅速發展的結果。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这些工業部門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將繼續提高，我們可以爭取經过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設，使国内所需机器設备絕大部分由国内自行解决，使自己生产的鋼材和主要有色金屬的数量和品种，能够基本上滿足国民經济各部門的需要。③ 这样一来，国内的物質生产構成就改变了。随着，进出口貿易的品种也要發生变化。在出口方面，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所占比重將要逐漸降低，矿产品和工業品的比重則將逐漸提高。在进口方面，机器設备的比重將要减少，工农業生产所需要的某些原材料和人民生活需要的若干日用品的比重將要有所增加。当然，通过进出口貿易这个手段作为改变国内物質生产構成的阶梯，也是具有一定限度的。我們建設所需的設备器材不是任何种类和任何时候都能从国外买到，而且进口建設物資必須要有出口，因此，进口要受出口貨源供应可能性的制約。

此外，由于現代化大規模机器生产的灵活性，使得我們可以利用同一种生产能力来生产各种不同的物品。同一种机器往往可以由从事生产資料的生产轉而用于从事消費資料的生产。許多机器制造工厂可以由从事第一部类所需机器的制造轉到从事第二部类所需机器的制造。

---

① 見"人民日报"，1957年9月30日第5版。

② 見第二节第四項所列公式：

$$P_1:P_2=(C+\Delta C):(V+m+\Delta V)$$

③ 参閱"人民日报"，1957年9月30日第5版。

例如，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随着机械工業的迅速發展，一部分国防工業的生产能力已經有可能轉向民用生产，这就为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調整兩大部类比例关系的灵活性，提供了一定的物質条件。

現代化大規模机器生产的灵活性，使我們能够利用同一种生产能力轉而从事不同种类的物品的生产，这一点也說明了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必要。重工業是制造生产工具的部門，只有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条件下，才能为未来时期迅速扩大生产資料和消費品的生产提供物質技术基础。

四　优先發展重工業、貫澈执行發展工業与發展农業同时并举的方針

重工業是国民經济一切部門技术改造及增强国防力量的物質基础，沒有重工業的發展就不可能有現代化的輕工業和現代化的农業。实現社会主义工業化必須优先發展重工業，这是我們国家坚定不移的方針。但是，优先發展重工業，决不意味着可以輕視輕工業和农業的發展。我国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划曾經着重地注意到这个問題："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条件下，力求使各个經济部門——特别是工業和农業、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的發展保持适当的比例，避免彼此脫节。"①

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执行的結果，不論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方面，都取得了偉大的成就。截至1956年，全国农戶已經有96.3%，手工業者已經有92%实現了合作化，資本主义工商業几乎全部实現了公私合营。在1953年至1957年的五年内我国工業总产值（不包括手工業产值），平均每年增長17.4%，其中生产資料平均每年增長23.7%，消費資料12.4%。在农業方面，五年内农業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長4.8%，其中粮食平均每年增長4.3%，棉花2.9%。以上各項指标，除棉花外，都超額完成了計划。②通过第一个五年計划执行过程中取得的經驗証明，关于正确处理重工業、輕工業和农業的發展关系問題，党和政府采取的政策方針是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演講中，对于这个問題作了明确的指示。他說："我国的經济建設是以重工業为中心，这一点必須肯定。但是同时必須充分注意發展农業和輕工業。"又說："我国是一个大农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农業同时并举，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業积累較多的資金。"③

根据第一个五年計划执行情况看来，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农業占优势的国家。按照1957年計划数字，現代工業在工农業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还不到一半。在工業总产值中差不多有50%依靠农产品作原料，农業又是輕工業及重工業产品的主要市場。因此，农業收成的好坏，对于整个工業增長速度的快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国内市場主要商品供应量中，約有90%是农产品及用农業原料制成的工業品。由此可見，农業的發展与人民生活的改善息息相关。不但如此，目前我国农業还是积累国家建設資金的重要来源，在我国国家預算收入中50%以上直接間接依靠于农業生产。④我国重工業建設所需进口的机器設备和建設器材，主要是以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出口去交換。可見發展农業不仅与發展輕工業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密切关系，而且对于發展重工業也起着积極推动的作用。

其次，輕工業与农業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目前我国輕工業的原料有90%以上来自农業，輕工業产品約有60%銷售于农村。⑤如果农業發展了而輕工業沒有相应地發展，就会使农業生产出来的原料缺乏銷路，而五亿农民所需要的消費品得不到滿足。这样就会阻碍农業的發展，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及工农联盟的巩固受到不利影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划"，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頁。
② 見"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日第3版。
③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頁。
④ "人民日报"，1957年4月1日社論。
⑤ "人民日报"，1956年7月9日社論。

响。輕工業与重工業也有密切关系。不仅有許多重工業产品需要有一些輕工業品作原材料，更重要的是輕工業产品的一部分也是出口貨源的供应来源之一。通过这些輕工業品的出口可以換回一部分重工業建設所需要的机器設备和器材。輕工業又是我国积累建設資金的来源之一。据紡織工業部副部長錢之光同志在"八大"的發言中說："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全国紡織工業为国家积累了將近100亿元(包括工業利潤和稅收)，相当于国家第一个五年計划工業投資总額的38%左右。① 足見优先發展重工業，不能輕視輕工業的發展。但是，在我国目前化学工業还不發达的情况下，輕工業的發展主要受着农業原料的限制，由此可見农業的重要性。那种認为加速發展农業就会延緩工業發展速度的想法，事实証明是不正确的。毛主席曾經指出："如果我們的农業能够有更大的發展使輕工業相应地有更多的發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經济会有好处。农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会更快地發展。这样，看起来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② 因此，在今后的建設計划中，我們必須实行工农業并举的方針，一方面要保証工業經济稳步上升，一方面要适当地增加农業投資的比重。③ 这个方針同国家經济建設以重工業为中心的方針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以重工業为中心的建設，或者优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是肯定的，工农業同时并举正是为了保証这个方針得到貫澈。在重工業必須得到优先發展的前提下，充分注意輕工業和农業的發展，这正是为了使兩大部类及国民經济各大部門發展中的比例，更能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更有利于整个国民經济的全面發展，更有利于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9頁。

②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頁。

③ "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日社論。

(上接第24頁)

素。目前，美国耐用品大半是靠分期付款的办法来消售的，以分期付款办法銷售的汽車占銷售总量的60%。建筑在軍事化和信用膨脹基础上的美国經济是不稳定的，是靠不住的。事实胜于雄辯，随着生产扩大与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局限性之間的矛盾的增長，美国工商業的存貨总值在不断增加。

美国工業和商業中的存貨总值①

(美元)

1954年	1955年	1956年末	1957年初	1957年8月
310亿	821亿	870亿	885亿	912亿

上面說过，消費信用的增長，也是生产和消費的矛盾增長的表現。

与此同时，美国工業生产出現了下降趋势。1955年12月份工業生产指数为144，1956年1、2月份3、4月份、12月份各为143、142和147；1957年1、2月份降为146，到8月份又降为143，根据11月1日"美国新聞与世界报导"估計到明年上半年將会进一步下降到140。1956年1月份美国工業中的就業人数比1955年12月份少127万人；美国制造業的就業人数从1956年10月份到1957年的2月份已減少了20万人；美国失業人数現是290万，根据上述这家杂志估計到明年下半年將增加到500万。美国农業和农民的狀况也在不断恶化。这充分表明，美国經济危机日益迫近前的紧張狀态。美国壟断組織对当前美国經济狀况十分憂慮。"美国新聞与世界报导"估計，在今后一年內，美国經济可能再一次發生"調整"，这次"調整"虽然不会如前总統胡佛所預言的像1929年的經济危机那样，但企業的下降很可能达到1948—1949年或1953—1954年那样的規模。这样的估計，不是沒有根据的；但現在看来这个估計是很不够的。

事实粉碎了右派关于美国經济很"順利"的讕言，美国是处在經济危机的前夕。

* * *

以上的分析說明：企圖借助經济軍事化来摆脫經济危机，这完全是幻想，馬克思列宁主义曾經不止一次地这样指出过。赫魯曉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結报告"中写道："軍备扩張并不能医治这种病，反而会使病势加重。經济軍事化越广泛，它給資本主义造成的后果也就越严重。……

……由国家干預經济活动，并不能消除資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缺陷。国家决沒有力量消灭这种造成生产無政府狀态和經济危机的資本主义經济的客观規律。危机是包含在資本主义的本質中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段話对右派分子的确是一服清醒剂，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余地的。(1957年11月6日)

① 資料来源："經济譯叢"1957年第9期，第9頁；"国际譯叢"1957年第8期，第43頁；1957年11月1日"美国新聞与世界报导"。参看1957年11月9日"新聞日报"。

农業社收入分配核算問題的研究(上)

吳滬生　陈治鈞　何俊祥

农業生产合作社是劳动人民根据自願和互利的原則組織起来的社会主义集体經济組織。合作社应該在国家經济計划的指导下，組織集体劳动，进行生产，同时將集体生产的成果，进行合理的分配。

生产和分配是密切相关的，它們是發展生产不可分割的一个完整过程。生产是分配的基础，只有在搞好生产的前提下，才能保証搞好分配；反过来說，产品分配的好坏也大大地影响生产的發展。分配工作做得好，可以鼓励社員提高生产的积極性，如果分配工作做得不好，就会引起社員的不滿，影响当前的生产和今后社的巩固和發展。因此，做好农業社收入分配工作是一件具有重大的政治經济意义的工作。

农業社的收入可以分为实物收入和貨幣收入兩大类，这兩类收入都要参加农業社的分配。实物收入是指农業社的各个經济部門在整个年度內所获得的各种产品。包括种植業部門、畜牧業部門和副業部門的各种产品。

农業社生产的产品除完成对国家的稅收，滿足本身需要之外，相当大部分的产品是以商品的形态供应国家在各方面的需要，农業社出售农产品后所得的現金是农業社貨幣收入的主要来源。此外，农業社对外工作所得的現金报酬以及公債、銀行存款利息也应包括在农業社的貨幣收入中。

由此可見，各种农产品的实物收入是农業社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業社貨幣收入的多寡基本上决定于实物收入的大小，而扩大农業生产的播种面积，提高單位面积的产量，增加牲畜头数，提高畜产品的生产率，發展多部門經济是促进农業社产品收入不断增長的源泉。

农業社的收入分配，要根据国家政策和高級农業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規定进行，此外，还要参考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業生产合作社秋收分配中若干具体問題的指示办理。

农業社示范章程第四十三条規定："农業生产合作社全年收入的实物和現金，在依照国家的規定納稅以后，应該根据既能使社員的个人收入逐年有所增加，又能增加合作社的公共积累的原則，按以下的項目进行分配。

（1）把本年度消耗的生产費扣除出来，留作下年度的生产費和归还本年度生产周轉的貸款和投資。

（2）从扣除消耗以后留下的收入当中，留出一定比例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公积金一般地不超过8%，包括归还到期的基本建設的貸款和投資在內。公益金不超过2%，經营經济作物的合作社，公积金可以增加到12%。

（3）其余的全部实物和現金，按照全部劳动日（包括农業生产、副業生产、社务工作的劳动日和奬励給生产队或个人的劳动日）进行分配。

如果合作社的生产增加不很多，为了增加社員的个人收入，公积金可以少留。遇到荒年，公积金可以少留或者不留。遇到丰年，在保証社員收入增加的条件下，公积金也可以酌量多留。收入分配的方案应該由社員大会或社員代表大会討論通过。"

在进行收入分配时，必須貫澈以下几个原則：

一、首先，应注意国家、农業社、社員三者之間利益正确的互相結合，收入的分配既要增加大多数社員的收入，又要增加公共的积累，在年景正常的地区，增产的社应保証將60%—70%的收入分給社員，并且爭取90%以上的社員增加收入，但在受灾地区，遭灾减产的社，或者由于經营不良而减产的社可以根据示范章程的精神，酌量减少公共积累的比例和合理确定扣款数額以保証社員获得一定收入。

二、貫澈"按劳取酬"的原則　农業社是社会主义性質的集体經济組織，它的收入必須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則进行分配。这里必須指出，在貫澈按劳取酬的原則进行分配时，必須遵守国家粮食統購統銷政策的規定，并且注意实物和現金的搭配問題，农業社应該把分給社員的現金、粮食和其他实物統一計算在一起来体現按劳取酬的原則，而不能把粮食和現金分开逐項按照社員所做的劳动日进行分配。

三、貫澈"以奬励为主，多奬少罰或不罰"的原則　目前多数农業社都实行了三包奬惩制度。在三包中一般都規定着"超产受奬，减产受罰"的办法，由于三包制度推行不久，缺乏經驗，原来的包产指标已不尽正确，各生产队之間难免又有偏高偏低的毛病。因此要查明超产或减产的原因，必須結合群众民主評議，对包产指标进行必要的調整，要具体分析眞正超产或减产的原因。凡是超产的，

一般都应該予以适当的奬励，凡是減产的，除了因为明显的責任事故減产而应予以适当的处罰外，一般应給以批評教育而不必处罰。

农業社的收入要在生产年度終了时才能进行决算分配，但在平时，为了照顧社員的生活需要，应將年度中的收入預先分配給社員，年終再正式进行决算分配。

以下就有关預分、預支和决分等方面的問題作初步的探討。

一 預 分

农業社收入的預分工作，就一般农業社而論，最主要的有兩次，卽：夏收預分和秋收預分。根据高級农業社示范章程第 44 条的規定："春季和夏季收获的农产品，农業生产合作社在留下所需要的部分以后，应該按照社員已經得到的劳动日的多少，預先分配給社員，到生产年度終了的时候再进行結算。合作社的現金收入和国家对农产品的預購定金，在留下所需要的部分以后，应該根据社員已經得到的劳动日和实际需要，分期預支給社員，到生产年度終了的时候，再行結算"。

为了保証預分工作的順利进行，預分前应按上述規定作好預分計划并編制各种分配表格。以下分別就夏收預分和秋收預分的一般程序扼要介紹如下：

(一) 夏 收 預 分

夏收前必須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首先，农業社要估計各种作物的产量以及可以預分的蔬菜、畜产品和副業产品和現金收入。一般是由各个队組織估产小組，將各种作物，根据土地的肥瘠程度和作物的生長情况，逐垡、逐塊进行分类排队，以便計算各种类型的亩数，正确估定各种类型田地的每亩产量，交管理委員会审查，根据各种类型亩数，按类計算其收入的金額，并計算夏收的总数。其次，清理有关帳目，包括計算全社和每戶社員可以参加預分的劳动日（从年度开始到夏收預分截止期止的全部劳动日数）；計算出下季度生产所必須的資金和应留存在社內的种籽、飼料和粮食儲备、預交农業稅和交售給国家的統購粮、償还实物貸款等所需要的各种产品数量。

做好上述各項准备工作之后，会計員要根据估計产量編制夏收产品处理計划。夏收产品处理計划可运用下面的表式来計算：

夏收产品处理計划　　年　月　日

产品名称	預計收获量	預交农業税	交售給国家	社內留存					社員实际預分数
				种籽	飼料	粮食儲备		合計	
小麦									
大麦									

根据上表中預計收获量減去各項扣留数額以后，卽可計算出社員实际可以預分的各种产品数量。此外，为了确定每戶或每个社員可以預分的产品价值和現金数額，还要編制社員夏收預分明細表。

第　队第　組　社員夏收預分明細表　　年　月　日

社員戶或社員姓名	按劳預分（劳动日單价＿＿）		扣除数			实际可以預分数	粮食消費定量	实际預分数							
								小麦		大麦				現金	金額合計
	劳动日数	金額	預支数	借支数	小計			数量（斤）	金額（元）	数量（斤）	金額（元）				

社員夏收預分明細表应分队按小組編制，以便交各預分小組掌握执行。根据夏收产品处理計划中"社員实际預分数"欄內所列的各种产品数量按規定的估价标准折成金額，加上实际可以預分的农副業現金收入数，求得社員在該季的应預分总数，然后將此項預分总数除以全体社員的劳动日总数，求得每个劳动日的預分單价；按照各个社員实做的劳动日数，卽可分別求得每戶社員的預分总数，填入"应預分总数"欄內。

关于实物的分配，应先滿足每个社員（或社員戶）口粮与必要飼料用粮的数量。就是說，实物的分配，在夏收預分时，农業社至少要保証（缺粮社由国家供应的例外）夏收到秋收預分前一段时期的口粮与飼料用粮的需要量。至于各种产品品种的搭配可用社員协商的办法或按劳动日与产品数量的比例确定。

將各社員戶的"应預分总数"欄中的金額減掉預支借支等等的扣款数額以后卽得实际上可以預分的金額。从此項金額中減去各項实物的現金数額后，就是合作社尚須分給社員的現金数。

产品处理計划和預分明細表編好以后，应該提交合作社管理委員会与社員討論修正，然后經社員大会（或社

員代表大会)通过作为正式的預分方案。公布时,管理委員会要說明編制計划的根据,說明对有关預分政策的处理办法,同时进行思想教育。經社員大会或社員代表大会审查通过以后,即可据以进行預分。实物預分工作最为細致复杂,在預分过程中,必須做好产品的保管、过秤、登記等工作,管理委員会应当指派專人負責掌握各項工作,以免临时慌乱,使产品遭受損失。

(二)秋收預分

农業社的秋收預分是一年內最重要的一次預分工作,它距离年終决算很近,而且預分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又比較多,所以預分得是否确当,对于决算分配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分配前必需要有愼密的計划,使預分工作順利进行。

秋收預分前必須做好下列准备工作:首先,成立分配工作組。在合作社管理委員会之下,組織一个分配委員会,由社主任、社会計、保管員及生产队長等人組成,負責領导全社的秋收工作;此外,各队也要成立分配小組,由生产队長、队会計員、記工員等人組成,分別負責預分中的記帳、估产和保管产品等項工作。其次,清理帳目。秋收預分时,必須組織一定人力,如会計、出納、記工員等,清理財务帳和劳动工分帳,編制收支平衡表,借以檢查帳上的記录有無錯誤。劳动工分帳由生产队記工員先行清理,再和管理委員会的劳动工帳进行核对,然后以队为單位,向社員公布,并且發动社員与自己的劳动手册核对,檢查其是否記錯;第三,估产、估工、估开支。此項工作主要由各队分配小組会同有估产經驗的社員进行,估产工作大体上与夏收預分时相同。在估产时,同时可以进行估工、估开支的工作,以便确定在各項农、副業工作上尚須投入的劳动日数以及各項必要的开支。

进行估产、估工时,可編制如下的估产、估工表:

第　队　　估产表　　年　月　日

田地种类	亩数	現有作物				晚秋作物				
		名称	每亩产量	总产量	需要劳动日数	名称	亩数	每亩产量	总产量	預計劳动日数

第　队　第　組　　估工表　　年　月　日

社員姓名	应得劳动日数			应扣劳动日数				应参加分配的劳动日数
	已做劳动日	估計在决算前可能得到的劳动日	合計	基建工	义务工	下年生产用工	合計	

估产表中現有作物的"尚需劳动日数"与晚秋作物的"預計劳动日数"兩欄总数应当与估工表內"估計在决算前可能得到的劳动日"欄列数相等,該欄一般由社員自报,再經生产队审核决定后填入。

上述各項准备工作就緒以后,进一步应該編制各种分配表格。

一、編制全年收支概算表:首先根据帳上記录确定各項收支的全年累計發生額。其次,估算出在年終决算分配前还可能發生的各項收支数,这一部分收支数字应該按照合作社的生产計划和財务計划的規定,根据平时該社的实际情况来估算,將帳面上記录的收支数和估算出来的收支数(如农業收入、畜牧業收入、副業收入、非生产收入以及农業支出、畜牧業支出,……管理費、稅金、保險費等等)逐項相加,即可編制全年收支概算表。

二、編制秋收預分概算表:根据全年收支概算表的估計数字,編制秋收預分概算表,这是秋收預分时一項重要的財务会計工作,如果秋收預分概算編制得不正确,收益分配就很难做到公平合理。因此,管委会应当严格掌握,反复研究审查。秋收預分概算表与决算分配表在指标方面应当取得一致。編制概算时,必須根据党的政策原則和社章的規定,处理各項具体問題。会計員要根据社員代表会議决定的办法,計算下列各項数字:(1)应繳納的农業稅款,(2)应提存的公积金和公益金的数額,(3)应归还各戶社員的投資数,(4)各戶社員預支和借支的扣回数,(5)全社粮食的統購数和各戶社員的全年粮食保留数,(6)为了避免年終發生超支,在秋收預分时,社里可規定留出一定数量,作为决算时的找补数。

全年收入合計減去全年支出合計,余数即当年可以分配的数字,再从此項数額中,按社章規定提存了公积金和公益金以及年底找补数以后,其余便是可以預分給社員的数字。秋收預分概算表的格式如下:

秋收預分概算表　　年　月　日

全年估計收入		全年估計支出		本年收益分配	
項　目	金額	項　目	金額	項　目	金額
1.农業收入 稻谷 …… 2.畜牧業收入 养猪 …… 3.副業收入 粉坊 4.非生产收入		1.种植業支出 肥料 …… 2.畜牧業支出 养猪 …… 3.副業支出 粉坊 4.非生产支出		1.公积金 基本建設基金 生产費基金 粮食儲备基金 2.公益金 3.留存年底找补数 4.社員劳动报酬	
合　計		合　計			
		应分配数		計划分配数合計	

三、編制全年全社粮食处理計划：此表反映全年全社各种粮食的收支情况，其中应包括夏收預分时已經处理的粮食。

四、編制社員秋收預分明細表。

社員秋收預分明細表

第　　队第　　組　　年　　月　　日

社員戶或社員姓名	应分配数					应扣除数			实际預分数	其中应分粮食						实际預分				签章
	按劳預分（劳动日單价____）		应偿还本年投資		合計	已預分数	預支及借支数	合計		应分粮数	口粮消費定額	飼料消耗定量	已分口粮数	已分飼料数	应預分余額	粳稻	山芋		合計	
	劳动日数	金額																		

在預分明細表中所分配的粮食数量，包括口粮、飼料用粮与余粮在內。在分配粮食时，农業社必須要按照每个社員（或社員戶）的口粮定量与牲畜飼料用粮先行分配，以每个社員（或社員戶）的粮食消費定額的价值与其按劳动日預分單价分配的金額比較，还有余的社員（或社員戶），再按一定的比例或协商的办法分配余粮，在分配粮食后的差額找补現金。分配余粮的比例可按这样的方法确定：以全社所分粮食金額减去全社口粮（或粮食消費定量）价值的余額去除以全社粮食分配总数减去口粮价值后的余額所求得的比例，即余粮分配比例（上述粮食分配总数系指自年初起的累計数，即秋收預分总数中包括春夏收的数字在內）。例如：某社秋收預分总数为200,000元，其中粮食80,000元，全社粮食消費定量50,000元；参加預分的劳动日总数为200,000个。根据此項資料計算出余粮的分配比例为：(80,000－50,000)÷(200,000－50,000)＝20%，即对于那些分配口粮与飼料用粮后尚有余額找补的社員（或社員戶），每找补1元可分配值0.2元的余粮。至于粮食品种的搭配，在分配前，可用統計方式征詢每一社員戶需要粮食品种与数量的意見，以此統計数与用之于預分的粮食品种数量比例平衡，或用协商办法平衡之。

上述預分表格編制以后要以队为單位加以公布，并且分别通知社員。粮食开始收获时，要按照"社員秋收預分明細表"进行預分。粮食的分配以社員所在队分配其各該队的粮食为主，各队之間的多余与不足可以平衡調剂。在分配粮食时，可以打一場分一場，也可以采取輪流分配的办法，譬如，今天打一場由这些戶分，明天打另外一場，由那些戶分；但一定要注意到粮食質量的好坏，适当搭配均勻。

秋收时（夏收同），各队收获的产品应一律填制产品收获报告單。产品收获报告單与社員分配明細表都要上报管理委員会做帳。

社管理委員会收到社員預分清單和产品收获报告單时，应由会計員作成下列分录：

（1）当产品通过倉庫分配給社員时：借：劳动日报酬結算，貸：貨幣資金或产品及材料

（2）当收获的产品及副产品未經入庫立即預分給社員时：借：劳动日报酬結算，貸：种植業收入

对于农業社的夏收、秋收預分工作的核算程序已簡要的叙述如上。从此可知預分工作，由估收入、估支出、扣留各种需要、到算出分配給每个社員（或社員戶）的数字，实在是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工作。为便于在收获时預分工作的順利进行，就一般言之，分配方案須在农产品收获之前制定。在制定預分方案中最困难的是估产（估收入）的問題，在收获前估产很难做到估产数与实际收获量相符。在实务上，农業社管理委員会与核算人員为制定分配方案，由于估产不准，往往要花費大量时間（有的社花半年以上的时間）开会討論并作反复修訂的計算工作。因此，影响生产。大量的計算工作又会妨碍会計人員正常核算業务工作的进行，所以对于預分制度实有改进或簡化的必要。对于一般以谷物生产为主的农業社，在为滿足社員粮食需要以及为收获大量农产品集中貯藏不便的情况下，必須要进行預分工作的，应該大力簡化預分工作；在那些一年四季都有收入的农業社（如以蔬菜、畜牧業为主的，以及副業經济較为發达的农業社）可考慮尽量减少預分的次数（也要簡化預分工作），主要实行定期預支制度，或取消預分制度而改行定期預支制度。

在簡化預分工作方面，在有些农業社中已行之有效的簡化預分的方法，主要有下述三种：

第一种方法，預分方案的制定，要等到接近农作物收获期或作物成熟期，在能够相当确切的估計作物收获量

时（即是說产量稳定期），才制定全面的預分方案。在制定全面的預分方案前，先作好制定分配方案的各种准备工作。假如預分方案在分配时与实际有出入（估产高低关系），仍可按原訂分配計划进行，只要計算其收入增減的百分比，在各社員（或社員戶）之間比例增減；如果对于計算分配时所用的社員預計劳动日与分配时的实作劳动日有出入，如相差不多的可不予更动，相差过大的便作局部調整，这样可避免分配方案的返工重复修改，因为預分还要經过年終决分調整找补，所以不必算得过細过繁。但是，要特别注意秋收預分，防止社員超支劳动报酬，形成在决分时無法找补的現象。

第二种方法，在农作物收获前只作好为制訂預分方案的一部分准备工作，不估产、不估支出、不估劳动日、不作預分方案，在收获时只按社員口粮的定量分給一部分口粮，等作物收获完畢，产量确定，才制定預分方案，根据社員实际所作劳动日数計算每个劳动日的預分單价，并根据此單价按每个社員实作劳动日（自年初起的累計数）計算分配到每个社員（或社員戶）。

第三种方法，在年初制定春、夏、秋收的預分方案（多用于产量稳定的經济作物区），确定劳动日的預計單价，但不計算每个社員的分配数，待作物收获时（也可在产量稳定期）檢查产量与年初計划的分配方案有無出入，对于出入大的修改，出入甚小的維持原方案不动。修改办法是計算年初預計收入与实际收入相差的百分比，以此比例調整劳动日值，再按照社員实作劳动日（自年初起的累計数）分配計算到每个社員（或社員戶）。

上述三种預分办法，在每个社員（或社員戶）每次应預分的总数中都要扣除以前的預分、預支与借支的数字。預分所用的劳动日單价，为簡化社員預分分配表中的計算工作起見，都是取分厘以上的整数，不計零星尾数。这些方法只要核算工作人員有相当的業务水平，都可按照自己的条件选擇实行，确能对預分工作起簡化的作用。

以上三法虽然在不少农業社中是行之有效的經驗，但是未必尽能行之各地而皆准。我們認为在簡化預分工作的方法上，須要分析、研究，把握住影响收入分配的各个因素，針对各个变动因素，因时因地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

如前所述，社員的收入分配数，就是农業社的收入总数在完成对国家的义务、扣留生产費、提存公积金与公益金后的余額；而各个社員所得的收入（預分数）是按每个社員所作的劳动日数按劳动日單价分配的。因此，影响社員預分数大小的因素，基本上决定于兩个方面，即农業社的收入与社員所作的劳动日数。在以上兩个因素决定之后便可計算出每个劳动日的單价，然而每个社員收入的多少，則主要取决于其所作的劳动日数。

現在我們分析一下影响农業社收入預分的各方面的因素：在完成对国家的义务上，即交納农業税、交納收購粮食，在三定政策之下是三年不变的，故为已知因素；在滿足农業社内需要部分的生产費，根据农業社当年度的支出数及来年的扩大再生产情况，应扣留的实物与現金数是可以根据次年的生产規划确定的；只有农業社的收入总額与提存的公积金与公益金在产量未定前是未知因素，在保証增加社員收入，又能扩大农業社生产的前提条件下，农業社收入总額的大小直接影响公共积累的提存数，即是說，公共积累的大小是随收入总数的大小成比例（因变关系）变动的。关于按劳分配的劳动日数，就全社而言，在生产任务（包括农、牧、副業）确定的条件之下，按照农作物的各个作業阶段与劳动定額以及产品（畜牧、副業产品無定額时）与劳动日支出的因变关系，是可以計算出到預分时为止的劳动日支出总数的（包括上年結轉参加当年分配的劳动日数）；在实行三包的农業社里，对于农作物的劳动日支出更是可以根据每种作物的包工数（或按每种作物在各作業阶段的劳动日支出計划）計算，畜牧業和副業产品的劳动日可按产品需工定額或产品与劳动日支出的因变关系計算，从而可求出全社参加預分的劳动日总数。但是，对于每个社員参加預分的劳动日預計数，要按每个社員逐一預計；这是一項非常繁重而不容易計算正确的工作。

从上分析可知，在預分工作中存在着問題的是估收入和預計每个社員劳动日的問題。

对于估收入的問題，我們認为，在正常年景，在农業社的产品种类固定的情况之下，农業社的总收入是随着扩大再生产而逐年增長的。因而农業社在春、夏、秋收获的各种产品及全社的总收入，可参照往年各該时期的各种农、牧、副業产品收入的数字，并考虑到扩大再生产的情况加以預計，或就用去年的实际收入減去各項扣留数的余額分配給社員。在前后年度生产任务發生变动，或年景不正常的情况下，我們認为可先作好編制預分方案的各項准备工作（确定分配原則，計算各种扣留数，預計全社劳动日等等），待产量稳定估产后，便可确定用于預分的数額。

已知全社的預分总数，全社預分的劳动日总数，則可根据这兩个数字求出每个劳动日的預分單价。

关于社員参加預分的劳动日数，我們認为应根据每个社員实作的劳动日数計算，不必根据每个社員預計到預分时为止的劳动日数来計算。例如，在秋收預分时不必預計每个社員的全年劳动日数，只要根据已作劳动日数进行分配，就可以了。

如果要为每个社員預計其劳动日支出，工作量不但很大，而且預計数也很难正确。預分主要是为滿足社員日常生活上的需要，在决算时还要按实作劳动日結算找补，所以不必計算得太繁。对于每个社員的預分数，按預分前实作劳动日（帳面数字）計算，即使在秋收預分时也按秋收前实作劳动日（不預計每个社員全年的劳动日总数）計算預分数，这样可以簡化很多工作。

按实作劳动日分配給社員，当然也有可能發生这样的情况：个别社員（戶）的劳动日支出在上半年与下半年之間存在着不均匀的現象。如果上半年（秋收前）出勤少，按实作劳动日分配口粮，便不能滿足他們在生活上的需要。像这种特殊情况，农業社可允許其在夏收預分时超支（或借支）到秋收預分时为止的口粮数，在秋收預分时允許其超支（或借支）到决分时为止的粮食需要量。但是，农業社对于这种社員在以后分配工作时应加以特别的安排照顧，使其在全年內能作滿口粮的工分（劳动日）。至于老弱疾病無劳动能力或缺少劳动力的社員（戶）所需的口粮数，应当从公益金中开支，不作为預支或借支而作为困难救济处理。

农業社的收入分配包括实物与現金兩部分，在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業社里，实物的分配数中基本上是口粮的分配，也有相当数量的余粮，一般来說是不会超过口粮数的，在以畜牧生产为主或副業生产比較發达的农業社，实物分配少些，現金分配数較多。因此，在預分时基本上已將大部分实物分給社員，而农業社留存（包括找补数）作为支付以后社員劳动日报酬的数量不多了。

按照上述預分方法，按預分前一段时期实作劳动日計算每个社員的分配数，先要滿足口粮需要，然后分配余粮，如有余数再找补現金，如是多出工多分配，符合按劳取酬的原則，可以鼓励社員多作劳动日，提高生产的积極性。

农業社参考去年春、夏、秋的实际收入（或就用去年实际收入）确定預分的总收入，而用年初到春、夏、秋收时期为止的和全年度的預計劳动日总数（包括上年結轉数）为根据分配春、夏、秋的收入，以此求出的劳动日預分單价按春、夏、秋收前一时期的实作劳动日（帳面資料）分配計算到每个社員名下（或社員戶）其中的差額就是农業社应留存作为日后社員所做的劳动日报酬的支付数，以及預分与决分的差額找补数，这样的分配方法，保証农業社有足够的資金支付每个社員的劳动日报酬，也不会形成社員在劳动日报酬結算上的超支現象。

从上述可知，在預分工作中，最困难的是估产与預計社員劳动日的問題，故农業社在生产中平时就应該注意劳动組織与劳动工分的核算工作，在劳动組織中实行基本口粮劳动日对于簡化預分工作起着很大的作用。农業社在年初（或去年編制計划时）就应該根据去年的收入分配情况，确定当年每个社員（或社員戶）的基本口粮劳动日数，責成生产队（小組）监督每个社員必須完成此基本口粮劳动日数；这样在收入分配中分配实物时，可以減少很多困难。假如农業社对于每个社員在平时出工的情况能按劳动計划和基本口粮劳动日的需要加以安排与监督，照顧到社員生活上的需要，在每个作業阶段都能檢查劳动計划的执行情况，这就为收入分配的順利进行創造了良好的条件。

以上叙述了預分制度的一般原則及其簡化的方法，預分工作不論怎样都是相当繁重的工作，所以預分的次数在年度中不宜太多，（在年度中，在收入占全年收入总数比重極大的季节里，須用預分）而解决社員平时生活上的需要，在实行預分制度之外，都应該考慮采用定期預支制度，在以現金收入为主的农業社里（如蔬菜栽培、乳牛飼养的农業社）或者就只采用定期預支制度，在年終进行决分結算。

定期預支制度，是將农業社在一定时期（半月、一月、二月等等）內的收入在扣除各种需要之后的余額按該时期內社員所作的劳动日总数来分配；对于前一段时期已經分配过的劳动日不再参加分配，即是說分一段丟一段。

按劳定期預支制度有許多优点，除了补救預分中所存在的困难与分配工作繁重的缺点外，最主要的优点有下述各个方面：首先，要实行定期預支，农業社就須合理地組織生产，开展多种經营，保証在一年四季都要有相当收入；第二，由于按劳定期預支，解决了社員日常生活上的經济困难；同时也促进社員进行自我监督，組織出工，从而提高社員生产情緒，推动生产的發展；第三，由于按劳預支，可使領导生产的干部在分配工作时，对于那些缺少劳动力（或劳动力弱）而人口多的困难戶在事前能予以适当的安排照顧，这样，保証每个社員都有适当的工作可作，而能够得到适当的收入，解决其生活上的困难，減少农業社的負担；第四，由于預支制度是按农業社当时的經济情况来分配的，这样，減少了大量核算工作，同时实行按劳預支之后也減少了許多社員的困难借支情况，因而可克服財务工作上的混乱現象，从而提高核算工作的質量；第五，由于有了定期預支制度，可促进社員更好地安排生活，消除浪費，树立节約的習慣。

在实务上有这样的作法：以各生产队的收入的70%按各該队的劳动日数預支，其余30%的收入上交管理委員会。这种預支办法，假若各队的收入不平衡（作物的經济价值大小相差悬殊）很有可能發生个别社員超支的情

況，以致在年終結算时找补發生困难。所以这种办法在一般的农業社不宜采用，只有在那些以生产队为独立的經营單位的社、某些經济作物社以及个别以蔬菜生产为主的农業社(各生产队的农作物价值相差不大)可采用。

定期預支，將各时期收入按各該时期劳动日数进行預支，分一段，丟一段，是否会由于个别社員在一个年度内出勤不均衡，就全社自年初的累計收入与累計的劳动日数計算会發生超支的現象；另外一方面，可能由于个别社員出勤不均衡，造成个别社員与其他社員之間的預支数与其劳动日数不成比例的現象，劳动得少的社員預支多，劳动得多的社員預支少。例如，某社1—6月份定期預支情况如下表：

据下表資料可知，甲与丙比較，在1—6月份甲作180个劳动日应預支275.4元，而实际支了285元，計多支

时　期	全　社			甲		乙		丙	
	預支数	劳动日	預支單价	劳动日	預　支	劳动日	預　支	劳动日	預　支
1—2 月份	20,000	20,000	1.00	30	30	60	60	75	75
3—4 月份	30,800	22,000	1.40	75	105	70	98	75	105
5—6 月份	60,000	30,000	2.00	75	150	75	150	35	70
实际預支計	110,800	72,000	—	180	285	205	308	185	250
应計預支	110,800	72,000	1.53	180	275.4	205	313.65	185	283.05

9.6元；而丙作185个劳动日应預支283.05元，实际預支250元，計少支33.05元。这里便發生不公平的現象：甲在分期預支中实际預支超过其累計应繳数，而丙則比应預支数实际少支了；甲作180个劳动日支了285元，而丙作185个劳动日只支了250元，多劳而少得。因此，有人認为按劳定期預支制度，分一段丟一段的办法是行不通的，还是应該用預分办法按自年初起累計的收入与累計的劳动日計算分配給每个社員。我們認为上述例子仅是在农業社中可能發現的一种較特殊的情况，而不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忽而出勤少，忽而出勤多，只是个别社員因病因特殊事故在某一段时期可能發生的情况，也不是在全年度中都如此。对于这样的社員生产队在組織劳动派工时便应該注意到，只要生产队通知会計員在預支时注意，便可于事前防止超支。会計員如果按以上表式編制一張全社分队的預支累計表，在每次預支前加以檢查，就可以全面地防止任何社員超支的現象。至于社員預支与其应得劳动报酬及个别社員之間比較有少許出入，还要結算找补。对于任何社員如無特殊疾病事故，都应当参加农業社生产，在劳动生产上每个社員都应先公而后私。除掉个别社員当农業社在預計社員全年出勤日数时，事前向社提出，并規定各月出勤日数(例如1月份10个，2月份30个，三月份5个等等)，經全社平衡允許，其余的社員在参加公共劳动生产上都应該受到一定限度劳动組織紀律的約束，不然，农業社为完成生产計划所需的劳动力將無法保証。破坏劳动組織与紀律，不遵守农業社的規定出勤，都应該是为农業社所不容許的。另外，就社員的个人利益而言，多劳多預支，参加农業社的劳动是社員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所以社員个人的利益与农業社的利益是互相結合的。因此，随便缺勤以致發生劳动日在各时期之間忽高忽低的現象不会是普遍存在的情况。从以上論証可知，上述的定期預支办法是行得通的。而在农業社中应該积極推行。

最后还須特别指出：实行定期按劳預支制度还是需要与适当的困难照顧相結合，如个别社員因为有特殊的困难急需用款，經过管理委員会的同意后可酌情借支，对于無劳动能力的(或暫时因病缺少劳动力)社員給予困难补助等。

論統計学是一門社会科学

鄒依仁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直認为統計学是一門社会科学，而現代美英資产阶級統計学者以及我国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总是歪曲地說統計学不是一門社会科学，說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或是一門万能的通用科学。由于統計学是进行阶級斗爭中强有力武器之一，所以这种分歧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論爭，而且也是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兩条不同路綫的斗爭。为了破資本主义統計思想，立社会主义統計思想，搞清楚究竟誰是誰非，对我們思想認識的提高，可能有所帮助的。也就是說，論証統計学是一門社会科学，对划清資产阶級統計思想与社会主义統計思想的界綫，是有重大意义的。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从統計学的历史發生和發展来論証統計学是一門社会科学，而不是数学的一个分支。

大家知道，統計發生于古代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發展而發展着。古代与中世紀的統治阶級为了战爭与征稅，就曾对他們所統治的地区作过有关人口、土地和农業現况的調查。当然，这些調查只是最原始的、極簡陋的統計調查，尚不足以称为統計学。到了16、17世紀，随着社会的發展，統計逐漸形成一門統計科学。統計学这一名詞起源于拉丁語 Status，意思就是指国家的政情而言的。这个名詞最早是由德国学者阿卿华尔(Gottfried Achinwall 1719—1772) 作为关于一个国家的全部复杂的主要显著事項而首先提出的。由此可知，統計学在它的最初發生与形成阶段时的研究对象，是有关人口、土地、財富以及政治等的社会經济現象，因此，毫無疑問，統計学应当是一門社会科学。

在16、17世紀以后，統計学随着資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与發展而發展着。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目前为止，統計学前后一共交叉地产生了三个主要学派。現在我們簡單地闡述这三个学派的經过情况，这对于搞清楚統計学究竟是一門社会科学或者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有很大的帮助。

一　国家学派 (Staatenkunde)

国家学派亦称記述学派，它的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臘的亞理斯多德(Aristotle)。亞氏著有他当时158个国家的情况的文献。由于年代已久，这些文献的絕大部分已經散失，仅仅关于古代雅典的文献还是被保留着。从这个文献就可以看出亞氏的叙述内容与方法的一斑。这个文献所叙述的，主要是关于雅典国家当时的历史、行政、司法、美术、宗教以及風俗習慣等的情况。

16世紀，意大利的孙沙維挪 (Francesco Sansovino 1521—1586) 与鮑得罗 (Giovanni Boters 1540—1617) 二个学者都作了与亞氏几乎相同的闡述。他們对古代国家以及他們当时的各国作出了比較的叙述。这些都是国家学派統計学的前驅。

从1660年起，德国学者康令 (Hermann Conring 1601—1681)，在德国勃倫司威克(Brunswick)的赫尔姆斯达特 (Helmstedt) 大学，以"欧洲最近国家学"为題，講述了当时各个国家的秩序、立宪、行政、人口与經济情况以及各国的組織結構与方法，引起了当时一般学者的重視，因此，这种研究傾向，在当时德国各大学中亦曾風行一时。对康令一生来說，他对其他方面虽亦有所貢献，但他的主要功績是为国家学派統計学奠定了基础。

康令的著作于他逝世后出版。他的有关国家情况的著作，主要論述了下列四个項目：实質的因素，形式的因素，实力的因素以及目的的因素。在实質的因素下，主要叙述了国家的領土与人口；在形式的因素下，主要叙述了国家的政体与行政；在实力的因素下，主要叙述了国家的財政与陆海軍；在目的的因素下，主要叙述了国家的目的。

在康令的論断中，特别引起当时的注意的，就是有关人口的詳細記載。在調查形式上，首先談到了自然的、經济的、社会的区别。在国家整体上，从性别、年龄、职業、地址、兵役、教育等情况談起，一直到人口比率以及人口过剩以至于人口不足的問題为止。康令这种研究方法，極受当时社会人士的欢迎，甚至到了18、19世紀的时候，資产阶級統計学还受着这种研究方法的一定影响。

在1748年德国格丁根 (Göttingeu) 大学教授阿卿华尔發表了兩部著作："欧洲各国国家学阶梯"，"近代欧洲国家学概論"。在这个时候，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統計学这个名詞。根据他的論点，統計学应該叙述国家的严格的主要显著事項。所謂主要显著事項就是指各国的領土、

人口、产業、貿易、政治、法制等，而国家的組織机構与强弱程度，尤屬为最主要的事項。他更强調統計学必須涉及現在的时間，而不必涉及过去的历史；有关国家变迁的历史仅須作一簡單扼要的介紹。他主張在表达事項时应該用一般語言，而数字也不可缺少。

阿卿华尔对当时的西班牙的記述，除了在最初几頁中簡單叙述了历史以外，接着就說明了气候、地理位置、殖民地以及生产物品等事項。再次，他对西班牙当时的科学、产業情况、通貨、財政、陆海軍等事項亦加以記述。最后，他对西班牙的人口稀薄原因以及国家利害关系亦有所闡明，主要偏重于怎样可以增进西班牙統治阶級的利益的方法。在他的著作中，有关数字的表达一般是不多的、所采用的計算方法有时也是錯誤的。例如，他仅仅根据当时納稅家庭的数目来估計西班牙全国的人口数，結果当然是不太正确的。同时，他对西班牙以外的当时欧洲其他七个国家，如葡萄牙、法国、英国、荷蘭、俄国、丹麦、瑞典等也有相类似的記述。

到目前为止，在他的著作中某些作为形容詞的少数統計术語仍为后世所采用。資产阶級統計学者所以称他为統計学之父，就是从这个事实作为出發的。国家学派統計学到了阿卿华尔的时候可謂已是極盛时代。虽在他以后的年代中，还有不少的后繼者，但都未能越出他与康令的記述范圍之外。

总的說来，康令与阿卿华尔的統計学比較古代与中世紀的簡陋的統計是有某些發展的，但是他們的統計学是仅限于記述性質的，以現代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統計学的科学性是不够强的，对現象仅作記述，沒有任何推論以及說明或反映現象的規律性。对欧洲各国作出記述的最后目的是要想使当时德国普魯士地主統治阶級熟悉管理国家的方法，熟悉各国的財富以及取得治国的智慧。因此，国家学派統計学是为当时的統治阶級服务的。

由此可見，国家学派統計学的研究对象是限于政治、經济方面的社会經济現象，因此，当时的統計学，毫無疑問，也是一門社会科学。

二　政治算术学派

17 世紀政治算术学派統計学是随着英国資产阶級的兴起而兴起。这一学派的产生受着当时英国社会背境的影响亦很大。从 1348 年倫敦發生鼠疫起，1563、1592、1603、1625、1665 等年仍有鼠疫大流行。尤其是 1665 年的鼠疫流行，引起当时英国政府及一般市民的恐慌。由于这种原因，倫敦市民对人的死亡、出生、結婚、受洗礼的統計資料的公布，極为注意。編制有关人的出生、死亡圖表开始于 1592 年；1595 年以后曾一度中断，1603 年开始定期每周公布，并于每年聖誕节前的星期三把过去一年的統計数字彙总制表公布。当然，以目前的統計标准来看，这种报告还是不够严密和完全正确的。从当时倫敦究竟有多少人口，只有一个約略統計数字来看，就可以完全証实这样的講法是对的。政治算术学派的格朗特(john Grannt 1620—1674)就在这个时候出生于倫敦。

格朗特于 1662 年發表了"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的著作，这是第一本有关人口統計的著作，在統計科学的發展上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后世推崇他为政治算术学派統計学的鼻祖。

他的著作的主要內容是：人口数，男女人数，男女嬰孩出生数，已婚与独身的人数，可能生育年齡的妇女数，适合兵役的人数，倫敦各年人口比例，鼠疫流行及复原时期，一般的与特殊的死亡原因，各年出生与死亡人数的比較，不經过教会仪式的市民的地位，非国教派市民的增加程度，教区大小的比較，为何倫敦的死亡人数比較出生人数为多，而英国內地恰恰相反等的情况。

格朗特的死亡表著作是他的多年研究的成果。他积聚了与研究了倫敦市在 80 年間所發表的死亡、出生資料，开辟了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奠定了資产阶級統計学的基础。依照格朗特的計算，在平均每 100 个出生者中間，各个年齡的死亡人数都有着一定的規律。他是第一个人發現男女嬰孩出生的經常比率为 14 对 13。他也是第一个人計算当时英格蘭的人口数为 6,500,000 以及倫敦的人口数为 460,000。他还計算出每年由于好几种死亡因素如慢性病、事故、自杀等所致的死亡人数与全部死亡人数間的比率是約略固定的。这些都是他对統計学的最大的貢献。当然，如以現代的統計标准来看，他的推算結果还是非常簡陋的。例如，他仅以一个地方教区的受洗礼人数与埋葬人数，就来推算出倫敦以外的英国全国人口总数的結論，是仅仅屬于估計性質的。

大家知道，資产阶級統計学的創立，首先与英国天才学者彼蒂(William Petty 1623—1687)分不开的。

彼蒂对政治經济学也有很多的研究，他首先为資产阶級古典学派政治經济学打下了基础。他是第一个人想到商品价值是由于在商品上所化費的劳动所决定。馬克思与恩格斯对彼蒂在学术上的評价很高。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說过，彼蒂是政治經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統計学的發明者。

彼蒂的論文著作很多，單單在統計方面的著作就有 65 种之多。在 1690 年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算术"出版了。这本書不仅运用了美丽的詞句，而且首先以具体的数量、重量以及尺度作为計量事物的标准。什么是"政治算术"呢？彼蒂的所謂"政治算术"，就是用数字测定的方

法来研究和处理具体的社会生活現象。

"政治算术"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如下：

第一章：英国領土狹小人口不多，必須依据那一种产業与政策，才能适应它的位置，而使它富强。如果要使英国与人口多領土大的国家相竞爭，那末發展航海与便利水运是最重要的根本办法。

第二章：几种重要的租稅与課捐关系于国家財富，所以宁可增加而不能減少。

第三章：法国在自然方面經常受到天然灾害，而英国人与荷蘭人極相似，必須在海上有些办法。

第四章：英国的臣民与領土，在自然方面所得的財富与力量，同法国的情况沒有什么差别。

第五章：英国的偉大所以受到妨碍，必須消除原来不是英国所固有的缺点。

第六章：40 年英国的实力与財富的增長。

第七章：如果能够严格执行賦稅政策，只要英国臣民每年支付出他們的收入的 $1/10$，就能够維持优良軍队，包括步兵 10 万，騎兵 3 万，水兵 4 万。其他有关經常临时費用，可用捐助方式解决。

第八章：目前英国臣民中較富裕的每年收入达 200 万英鎊，同时有好多的劳动工人沒有事做，应当加以适当使用，而使他們有工作可做。

第九章：为了便利于产業的进展，必須有足够的貨幣。

第十章：为了便利英国臣民在世界市場上进行产業活动，必須掌握有充分而适当的資产。

从这些內容，我們就可了解所謂"政治算术"主要內容就是怎样使英国富强的經济方案。这本書所涉及的都是有关土地、人口、建筑物、农場、工厂、商業、漁業、小手工業、兵士、水手、国民收入、利息、賦稅、利潤、船舶与銀行等的数量指标与价值指标的研究。除此以外，这本書也涉及了艦队、民兵、港埠与海权国家的航运等的指标。总的說来，这些指标都是涉及有关土地、人口、財政、經济等各方面的社会經济現象。

在彼蒂以前，社会生活現象早已被人研究过，但是研究方法都是用一般范疇和抽象的概念，而沒有从一定系統取出事物的具体数字指标来研究的。彼蒂与此相反，他总是对被研究的社会現象在每一步上作出具体数字的估价。

另外，在彼蒂以前，統計仅仅是記述性的，所搜集到的数字資料仅仅用于直接的实际需要，但彼蒂在分析数字資料时，就或多或少地說明了和反映了社会現象的規律性。在社会現象的科学分析中，他是第一个人能够比較广泛地和正确地利用平均数指标这个概念的。例如，他在研究有关英国的土地与工資問題时，他就充分利用了英国的平均地租，农民平均寿命以及英国一般人民的平均开支来分析上述問題。

从彼蒂的著作內容以及其他政治算术学派的研究方向，很容易看出政治算术学派統計学比較国家学派統計学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政治算术学派統計学的确是服务于当时英国新兴的資产阶級的。事实上，政治算术学派也是通过自己的統計学完成了帮助当时新兴的資产阶級夺取政权的历史使命。但是，無論彼蒂与格朗特或者他們的繼承人都是澈头澈尾的唯心主义者，因此，政治算术学派統計学与資产阶級其他学术一样，它的科学性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例如，政治算术学派的繼承人——英国的僧侶德汉 (Will Derham 1657—1735) 与德国的僧侶苏司密橱 (J. P. Süssmilch 1707—1767)就是以"神的秩序"来解釋从大量观察所得出在資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口發展規律，包括着人口出生規律和人口死亡規律。

总的說来，我們不能否認，政治算术学派統計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經济現象而不是其他，这就說明了資产阶級統計学在它的产生和發展过程中是一門社会科学。

三　数理学派

我們可以說，資产阶級数理学派統計学的創始人是比利时学者凱特萊 (Adolph Quetelet 1796—1874)。他的有关統計方面的論文著作是很多的，在 1835 年出版的"社会物理学"(論人类)是他的一本主要著作。在他开始研究統計的时代，数学中的概率論正在逐漸發展中。例如巴斯格 (Blaise Pascal 1623—1662)、白諾意 (Jameo Bernoulli 1654—1705)、拉潑拉司(Laplace 1749—1827)和高士(Gauss 1777—1855)等对概率論中的基本規律都有很大的發明。并且在凱特萊的时代中，有关自然科学中自然界現象的規律性观念亦已經巩固地建立起来了。例如，天文学中支配着天体运动的規律性的观念亦已被發明了。这种規律性的观念使 19 世紀中叶的凱特萊把資产阶級統計学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他認識到社会現象亦是严格地服从于規律的。他認为不但人类的出生、發展和死亡都是有一定的規律性，而且連人类的行为，如婚姻年龄、犯罪以及自杀等等都有一定的規律性。他曾以具体的統計資料証实当时欧洲各国的犯罪人数是相差無几的，并且欧洲各国自杀人数对总人数来說亦具有一个几乎固定的比率。

凱特萊能够确定社会現象具有規律性一点固然是他的功績，但就在这一点上他把資产阶級統計学引导到完全反动的道路上去。就以他的主要著作"社会物理学"的書名来說，就可以知道他是企圖用数学的和自然界的規

律的作用来解釋社会生活現象的規律性，这种解釋当然是大錯特錯的。例如，他認为决定人类行为的最主要因素是自然界中一年四季气候的循环以及每天晝夜的更替。他更認为其他經常的与永久的因素就是人类本身的自然生理，如性别与年龄等。也就是說，这些自然因素都是决定性的因素，因而力量是最大的。他認为社会因素如教育、国家等等仅仅具有扰乱的作用，因而这些因素的力量比較前面的因素要小得多，而且是微不足道的。

另外，他更認为影响社会生活現象的各种因素以及社会現象的規律性是永恒不变的。也就是說，这些因素和規律是鉄的因素和規律，适如与自然界現象的因素与規律相雷同。前面这些論点是凱特萊的学說的最反动的一面。实际上，人类受着社会因素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而且从大量統計資料所証实的社会現象的規律并不是永久地、經常地存在于任何时間与任何民族的，相反地，社会現象的規律是随着社会經济条件的改变而变动的。

从 19 世紀中叶凱特萊把自然規律硬套在社会生活現象的研究以后，資产阶級数理学派統計学家，如高尔頓 (Fraucis Galton 1822—1907)、皮尔生 (Karl Pearson 1857—1936)、哥塞特 (William Sealy Gosset 1876—1936)以及埃·爱·費煦 (R. A. Fisher 1899—)等都是沿着凱特萊的研究方向走入了更深的歧途。实际上，他們都是数理統計学者，他們硬把数理統計学和作为社会科学的統計学——社会經济統計学完全混同起来。他們硬把数学中的方法和規律来研究社会生活現象，又把社会發展規律和自然發展規律完全等同起来，最后使統計学完全走上了形式主义数学的道路。他們从統計学的研究对象既是社会現象而又是自然現象作为出發，因而断定統計学是一門万能的通用科学或者是数学的一个分支。

例如，埃·爱·費煦在他的主要著作"对研究工作者的統計方法"一書的开头就說："統計科学主要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并且可以看作为应用于观察資料的数学"。目前，美国資产阶級統計学者狄克生 (Wilfrid j. Dixon) 与馬西 (Frauh J. Massey) 在他們的 1957 年最新著作"統計分析概論"一書中第二頁說道："并不存在着仅仅可以应用于經济学或教育学的統計学理論。在数量观察已經作出的条件下，确实存在着可以应用于任何方面的研究的統計学一般理論"。这就說明了目前美英資产阶級統計学家們还是錯誤地坚持統計学是一門万能的通用科学或者是数学的一个分支。

更荒謬的，就是現代美英資产阶級統計学者們認为从 19 世紀末叶起統計学已进入了数理統計学时代，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統計学已从数理統計学时代进入了推計学 (S'tochastics) 时代了。这就是說，从凱特萊时代起，数理統計学已可完全頂替了社会經济統計学，而到目前，数理統計学的一个分支——推計学就可以完全頂替了社会經济統計学了。

上面所提到的現代資产阶級統計学者的說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当然，現代資产阶級統計学者可以强辨說，統計学的研究对象从政治算术学派的社会經济現象扩充到自然現象，这种研究对象范圍的扩大，不是表示現代統計学的眞正發展嗎？我們的回答是：統計学的研究对象从社会經济現象扩展到自然現象，实在不是資产阶級統計学的發展，而是它的沒落。因为社会現象与自然現象具有本質的不同。根据自然規律絕不能認識社会現象的本質。社会發展規律与自然發展規律的根本区别在于：(1)社会規律只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發生作用，而自然規律一般是比較經久不变的。(2)社会規律的發現与应用要遇到垂死阶級的反抗，而自然規律的發現与应用一般是沒有什么抵抗的。我們可以說，决定沒有一門通用科学，既研究具体的社会現象而又同时研究具体的自然現象。

資产阶級統計学者要把数理統計学来頂替統計学，或者認为数理統計学是統計学的理論基础以及把統計学看做是概率論在社会現象的研究上的应用，都是沒有科学根据的。因为数理統計学的研究对象根本不同于統計学的研究对象。数理統計学与統計学是兩門不同的科学。所相同的仅仅是"統計"兩个字而已。数理統計学研究抽象的总体以及組成这一总体的对象的分配情况，而并不涉及客观世界中每一个别領域所固有的屬性，因此，数理統計学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說，数理統計学在研究偶然事件出現的抽象概率时，并不結合从屬于客观世界中某一定領域的屬性的具体事件的。但統計学的研究对象应該是在質与量的密切联系条件下的大量社会現象的数量方面，这些社会現象当然根本不同于無机界和有机界的現象。統計学虽然也利用数理統計学的方法来研究某些社会現象的数量方面以及数理統計学所研究的客观規律也可能表現在一些社会生活中，但在这些社会生活中决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反过来，統計学的某些方法也有被用来研究某些技术和自然現象。然而，我們决不能就这样把統計学和数理統計学完全等同或混淆起来。

至于以推計学来頂替統計学的說法也是沒有理由的。我們知道，推計学这个名詞是起源于希臘文 Stochastic，意思是指偶然事件随着机会出現而言的。因此，推計学亦称随机学。这种推計学实际上就是抽样方法。我們应該承認把推計学施用于大量工業产品品質的抽样檢查是有一定成效的。但是我們决不能把推計学施用于一般社会經济現象，因为这些現象很少是屬于自發性和偶然性的。

現代資产阶級統計学者們为什么一定要說統計学不是一門社会科学呢？这是和他們的唯心主义哲学根源和阶級根源分不开的。我們知道，从資本主义發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阶級矛盾日深，阶級斗爭亦日益尖銳化，很明显地資本主义已走向总崩潰的道路，資产阶級統計学者为了阶級利益不敢揭露資本主义社会的眞相，不得不混淆是非，把統計学的研究对象說成既是社会現象而又是自然現象，把社会發展規律与自然發展規律混淆起来，最后目的是要想掩盖壟断資本家的丑恶面貌并企圖証实所謂資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謊言。因此，現代資产阶級統計学的研究对象从社会現象扩展到自然現象，我們决不能說这是發展，而实际上，这种扩充是随着資本主义走向崩潰道路的一种沒落表現。

大家知道，随着偉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的誕生，产生了社会主义的統計学。社会主义的統計学一开始就确定为一門社会科学。作为社会主义的統計学的創始人之一——列宁曾經說过，統計是認識社会的强有力武器之一。事实上，統計也是建設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有力工具之一。

由于社会現象和过程的数量特征是在許多因素的作用之下形成的，而社会的生产方式与它們的發展規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統計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应当是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統一当中的有关社会生产的数量方面。当然，統計学也应当研究社会的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現象的数量方面。另外，由于自然因素和技术因素对社会現象的規模和数量关系的变化也有某些影响，因此，統計学也要研究自然和技术因素对于社会生活的量变的影响以及研究社会生产的發展对于社会生活的自然条件的影响。这就是說，統計学在研究自然和技术因素的影响时，完全是从社会現象的角度来研究的。所以社会主义統計学的研究对象的范圍虽然比較政治算术学派的研究对象的范圍要大得多，但是終究沒有越出社会現象的范圍之外。因此，对社会主义的統計学来說，它还是一門社会科学。

总的說来，除了現代資产阶級数理学派統計学者以及我国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歪曲了統計学的研究对象和歪曲了統計科学的性質以外，从它的历史的發生和發展来看，統計学是一門独立的社会科学，而且由于它能够反映一定社会阶級的利益关系，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是一門阶級性的科学。因此，資产阶級統計学是为資产阶級以及資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而社会主义統計学是为人民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并且只有建立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發展規律学說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統計学，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統計学，才是眞正科学的統計学。

“財經資料索引”

上海財經学院研究处資料室編印

本索引自 1955 年初按月油印發送以来，各界紛紛函索，难于供应。茲决定自本年 11 月份起改为按月鉛印分發。每期从 160 多种国內杂志报紙中选擇有关財經論著編成目录索引（每期 16 开紙 60 余頁）約 1500 多条，內容比較丰富，有助于教学、研究工作者参考。現每期暫收工本費三角，半年一元八角，全年三元六角（邮資在內）。欲訂閱者可徑向上海財經学院研究处資料室函訂。

上海財經学院研究处謹啓

1957 年 12 月 15 日

苏維埃政权四十年来的成就

——从数字上看社会主义的偉大胜利

苏联中央統計局根据苏共中央"关于准备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紀念"的决議，即将出版一部統計彙編——"从数字上看苏維埃政权四十年来的成就"。苏联"眞理报"在本年10月13日扼要轉登了这一彙編中的許多宝貴而有价值的各种資料。我們特把这項資料翻譯出来，供大家参考。从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苏联在各方面發展的速度大大超过了最發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体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無比优越性以及資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腐朽性。这完全証明了苏联共产党領导的英明、正确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無限生命力。当此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四十周年普天同庆的今天，这对于我們学習苏联建設社会主义乃至走向共产主义的新中国，实有其非常重大的意义——譯者。

苏維埃社会和国家制度的强大力量

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領土說，占世界第一位，就人口說，占世界第三位。在苏联全部兩亿人口中，約有四分之三是在苏維埃政权下誕生和接受教育的。

在苏联，沒有剝削阶級——地主和資产阶級。社会主义社会是由兩个友好的阶級——工人阶級和农民，以及同他們有着根本連系的知識分子組成的。1956年，工人和职員及其家庭成員的人数占总人口的59.5%，集体农民和手工業合作社社員及其家庭成員的人数占40%，个体农民和未参加合作社的手工業者及其家庭成員的人数占0.5%。

在苏联，全部政权屬于城乡劳动者，由劳动者代表苏維埃实現之。苏联的民主，是眞正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維埃代表的有1,347人，当选为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維埃代表的有5,271人，当选为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維埃代表的有1,944人，当选为边区、省、州、区、市、乡和鎭苏維埃代表的有1,549,777人。所有这些代表都是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

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以生产工具和生产資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資料公有制在一切国民經济部門都占着完全統治地位。苏維埃政权建立以来，公有制一再有所增長。1956年，苏联全部固定基金(牲畜在外)比1913年增加了6.8倍，其中，固定生产基金增加了13.8倍，这里面，工業和建筑業的固定基金差不多增加了32倍，农業增加了6.7倍，运輸業和邮电業增加了7.2倍。

全国固定基金結構的根本变化，說明了苏联已經变为一个强大的工業国。在国家全部固定基金(牲畜在外)中，固定生产基金的份額在1956年占64.6%，其中，工業和建筑業的固定生产基金占37.3%。1913年，固定生产基金的份額占33.8%，而工業和建筑業的份額总共才占8.9%。

苏維埃社会和国家制度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它較之資本主义有着無比高的經济發展速度，人民的物質福利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大众的积極性在国家、經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不断增長。

社会主义經济制度保証了高速度的工業化

年份	全部工業总产品	其中	
		生产資料的生产(第一部类)	消費品的生产(第二部类)
	1913年=1		
1913	1	1	1
1917	0.7	0.8	0.7
1928	1.3	1.6	1.2
1940	8.5	15.5	5.0
1945	7.8	17.4	3.0
1956	30	67	12
1957(估計)	33	74	13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我国工業遭受了慘重的損失，但1957年我国的工業产量已比1913年增長了32倍，比1917年增長了45倍。其中發展速度最高的是生产資料的生产。現在苏联每8天所生产的工業产品，就等于1917年全年所生产的那么多。

在革命前的俄国，生产資料的生产仅占工業产品三

分之一，而現在，生产資料生产的比重已占70%以上。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础上，保証着农業的發展和消費品生产的不断增加。

苏联工業占欧洲第一位，占世界第二位

	1913年		1956年	
	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欧洲的地位	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欧洲的地位
工業总产量	5	4	2	1
机器制造業	4	3	2	1
拖拉机（以15匹馬力計算）	革命前的俄国不生产		2	1
載重汽車（包括公共汽車）	革命前的俄国几乎完全不生产		2	1
电力	8	6	2	1
煤	6	5	2	1
鉄矿	5	4	2	1
生鉄	5	4	2	1
鋼	5	4	2	1
水泥	5	4	2	1
食糖	4	2	2	1

苏联就工業产量發展速度来說，大大超过最發达的資本主义国家。苏維埃政权建立以来四十年內，苏联工業生产每年平均增長10%，而在主要的資本主义国家里，甚至在最好的、沒有危机的年代，生产也是增長得很少，而仅仅在战爭年代依靠軍事生产而有所增長。

在我国，按人口計算的工業品产量正在不断地增長。从1913年到1956年，按人口計算的全部工業产量，增加了20倍，其中，生产資料的生产增加了46倍，消費品的生产增加了7.2倍。

就最主要种类工業品的生产量来說，苏联早已超过了欧洲最主要的国家，并且正在赶上美国。就苏联按人口計算的工業品生产水平来說，目前还落在最發达的資本主义国家的后面，但是，苏联在这方面落后于美国及其他某些国家的距离，正在日益縮小。

苏維埃国家現在拥有一切必要的条件，以便在和平經济竞賽的道路上，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內解决苏联的基本經济任务——在按人口計算的产品生产方面赶上并超过最發达的資本主义国家。

工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社会主义为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和迅速的提高創造了一切条件。这些条件具体表現在采用新式技术、掌握先进經驗和提高工人的熟練程度及文化水平等方面。

苏联工業中工人的年平均劳动生产率，在工作日时間縮短的条件下，1956年比1913年約提高了8倍。就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来說，苏联占世界第一位，这从下表可以看出：

1913年=100

年份	苏联	美国	英国	法国
1913	100	100	100	100
1928	120	126	94	105
1937	318	135	113	129
1940	422	150	105*	114*
1950	580	185	124	127
1956	約增了8倍	224	138	184

* 193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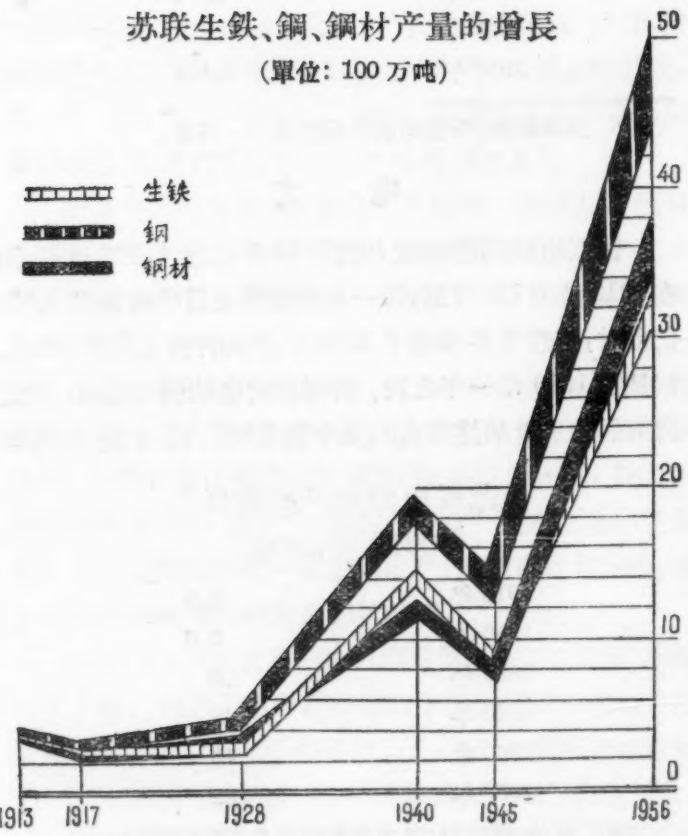
現在苏联已超过了英国和法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而且在劳动生产率水平方面大大縮短了同美国的距离。

冶金工業

苏維埃政权建立以来，苏联建立了大規模的先进的黑色冶金工業。生鉄产量从1913年的420万吨增加到1956年的3,580万吨，鋼产量从420万吨增加到4,870

苏联生鉄、鋼、鋼材产量的增長

（單位：100万吨）



1957年（根据計划）生鉄产量为3,800万吨，鋼产量为5,150万吨，鋼材产量为4,000万吨。

万吨，鋼材产量从 350 万吨增加到 3,780 万吨。單是馬格尼托戈尔斯克一个鋼鉄联合企業 1956 年所产生鉄、鋼和鋼材，就比 1913 年整个沙皇俄国所产的还要多。

在沙皇俄国，实际說来并未生产过优質金屬。在苏联，已熔煉出几百个品种的优質金屬，并且掌握了新品种的鋼、硬合金和超硬合金的生产。

机器制造業

苏联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立了本国强大的、拥有技术裝备的机器制造業。苏联摆脫了历来对外国經济的依賴，而变成了一个不仅是生产，而且是輸出現代机器和裝备的国家。就机器制造業总产量来說，苏联占欧洲第一位，占世界第二位。1956 年，机器制造業和金屬加工工業的产量，比 1913 年增長了 183 倍，而在 1957 年將增加为 1913 年的 200 倍以上。

机器制造業超速度的發展，保証了国民經济各个部門有可能在技术上进行重新裝备，并保証了苏联拥有可靠的国防。

苏联金屬切削机床生产的增長*

（單位：1000 台）

1913 年	1.5
1917 年	0.2
1928 年	2.0
1940 年	58.4
1945 年	38.4
1956 年	124.0

* 原系圖表，为便印刷改成現表——譯者。

电　力

苏联电站的發电能力在 1956 年已达 4,300 万瓩，而在 1913 年为 110 万瓩，同一年度的發电量已增加到 1,920 亿瓩时，这差不多相当于 1913 年沙俄的發电量的 100 倍。單是在 1956 年一年之內，新开动的电站發电能力，就比像第聶伯水电站这样大的九个發电站的發电能力还要大。

苏联电力生产的增長*

（單位：10 亿瓩时）

1913 年	1.9
1916 年	2.6
1928 年	5
1940 年	48
1945 年	43
1956 年	192

1957 年（根据計划）电力产量將达 2,110 亿瓩时。

* 原系圖表，为便印刷改成現表——譯者。

現在，就电力的生产水平来說，苏联已占欧洲第一位，占世界第二位，而在 1920 年通过全俄电化委員会計划的时候，苏联仅占世界第十八位。

煤

俄国拥有最丰富的石炭蘊藏量，它在革命前在石炭开采方面曾占世界第六位，占欧洲第五位。苏維埃政权建立以来，苏联建立了强大的、高度机械化的煤矿工業。煤的开采量，从 1913 年的 2,910 万吨增加到 1956 年的 42,920 万吨。1956 年在苏联，每 25 天所开采的煤比 1913 年全年所开采的还要多。

在社会主义建設过程中，煤矿工業的已往的片面性配置有了根本的改变。在苏联东部，建立了新的、强大的煤炭基地。

石　油

苏联石油的开采量，已經从 1913 年的 920 万吨增加到 1956 年的 8,380 万吨。單是 1956 年一年的石油开采量的增加額，就差不多相等于革命前俄国全部石油开采量的一倍半。1956 年，煉油工業的总产量比 1913 年增加了 22 倍。

在沙皇俄国，巴庫区是主要的采油区。在几个五年計划年代里，在烏拉尔—伏尔加河地区建立了新的、强大的石油基地。1956 年，伏尔加河流域、烏拉尔、远东、中亞細亞和哈薩克斯坦的各地区所提供給国家的石油，相当于 1913 年整个俄国所开采的石油 6.4 倍还多。

化　学

革命前俄国的化学工業是一个技术上落后的、完全需要依賴进口原料的部門。苏維埃政权建立以来，化学工業已經变成一个强大的国民經济部門，而且是作为技术进步的最重要的方向的生产化学化的基础。

1956 年，化学工業（包括冶金化学工業在內）的总产量，已經相当于 1913 年的 115 倍。例如，同时期內矿物肥料的生产，从 69,000 吨增到 10,906,000 吨。

輕工業和食品工業

重工業的發展保証着人民消費品生产的不断增長。

織物的生产，从 1913 年的 284,800 万公尺增到 1956 年的 685,900 万公尺，皮鞋从 6,000 万双增到 29,000 万双，肥皂（以含油量 40% 計算）从 128,000 吨增到 1,266,000 吨，針織工業和縫級工業，有了特别大的發

展。針織工業的总产量，比 1913 年增加了 115 倍，縫紉工業增加了 31 倍。同时，新建立了許多文化一生活用品的生产部門，以及改善生活和減輕家庭劳动的各种商品的生产部門。

肉类的生产量（不包括集体农庄和居民生产的），从 1913 年的 1,042,000 吨增到了 1956 年的 2,671,000 吨，动物油及其他乳制品（折合牛奶計算）的生产量（不包括集体农庄和居民生产的，也不包括来料加工的原料），从 230 万吨增到 1,730 万吨，沙糖从 1,347,000 吨增到 4,354,000 吨，糖果点心从 109,000 吨增到 1,582,000 吨，鑵头食品从 9,500 万标准盒增到 360,200 万标准盒。

加盟共和国工業的高漲

在社会主义建設的过程中，在澈底貫澈列宁的民族政策的基础上，胜利地解决了扫除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各民族从沙皇时代所承繼下来的經济落后狀态的任务。苏維埃政权建立以来，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里都建立起了現代的工業。

全部工業总产量，1956 年比 1913 年所增長的情况如下：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29 倍，烏克蘭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7 倍，白俄罗斯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21 倍，烏茲別克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3倍，哈薩克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35倍，格魯吉亞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28 倍，阿塞拜疆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2 倍，立陶宛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比 1940 年）——4.7 倍，摩尔达維亞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比 1940 年）——4.6 倍，拉脫維亞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比 1940 年）——5.7 倍，吉尔吉斯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41 倍，塔吉克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26倍，亞美尼亞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44倍，土庫曼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6 倍，愛沙尼亞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比 1940 年）——6.5 倍。

一个偉大的鉄路强国

苏联的鉄路对于保証貨物以及旅客运輸起着主要的作用。到 1957 年年初为止，苏联普通使用的鉄路运輸綫已相当于 1913 年的鉄路运輸綫的 2 倍多。1956 年，苏联鉄路运輸業貨物运轉量已相当于 1913 年俄国鉄路貨物运轉量的 16 倍。就貨物运轉量来說，苏联鉄路运輸業已占世界第一位。鉄路运輸業的技术裝备水平正在不断地提高。

苏联的海上运輸、內河运輸、汽車运輸、航空运輸和石油管运輸都在高速地發展着。

苏联貨物运轉量的增長*

（單位：10 亿吨公里）

	各种运輸	鉄路运輸
1913 年	114.5	65.7
1928 年	119.5	93.4
1940 年	487.4	415.0
1945 年	374.6	314.0
1956 年	1,301.0	1,079.1

* 原系圖表，为便印刷改成現表——譯者。

从木犁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

沙皇俄国是一个木犁的国家。农戶們在革命前是以原始农具耕种土地的。根据 1910 年的調查，他們共有 780 万副木犁和旧式木犁，220 万副木制犁鏵，420 万副鉄制犁鏵，及 1,770 万把木耙。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業化使有可能对农業进行技术上的重新裝备。到 1957 年年初为止，苏联农業共拥有：拖拉机（以 15 匹馬力計算）1,577,000 台，谷物联合收割机 385,000 台，載重汽車 631,000 輛，以及千百万其他复杂的农業机器。

1919 年，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弗·伊·列宁說道："如果我們明天能够拿出 10 万台头等拖拉机，供給汽油，供給駕駛員（你們很清楚地知道，这在目前还是一种夢想），那末中农就会說：'我們贊成康姆尼'（即贊成共产主义）"（見"列宁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184—185 頁——譯者）。現在，苏联农業每年都可以得到將近 25 万台拖拉机（以 15 匹馬力計算）。

在革命前的农業中，耕畜几乎是唯一的动力。当时机械动力还占不到 1%。現在，机械动力已占农業动力的 95%。1957 年的农業动力已相当于革命前的差不多 5 倍，相当于 1941 年年初的 2.5 倍。

在革命前俄国的农業中，几乎一切操作都是用手或者用馬拉的。1956 年，春播作物的耕种有 98% 是机械化的，春播谷类作物的播种有 97% 是机械化的，谷类作物的收获有 89% 是机械化的。現在，摆在面前的任务是：在最短期間內把一切农業生产，包括畜牧業在內，从个别操作的机械化轉向全盤机械化。

1956 年，苏联农業的电力消費量，比战前 1940 年增加了 8 倍，相当于革命前俄国整个国民經济中的电力消費量的 2.5 倍。到 1957 年年初为止，几乎全部机器拖拉机站、93% 的国营农場和 34% 的集体农庄都已經电气化。

对农業供应的矿物肥料，一年比一年增加。1956 年农業所得到的全部矿物肥料（以标准單位計算），相当于

1913 年的 50 倍，相当于战前 1940 年的 3 倍。

农業操作的技术裝备水平的不断增長，是迅速提高社会主义农業和畜牧業劳动生产率的物質基础。

一个大規模的、高度机械化的社会主义农業国

由于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結果，在苏联，消灭了地主阶級，并实現了全部土地国有化。苏維埃政权把 15,000 万公頃以上的地主、官僚和寺院的土地轉交給了农民；这些土地超过了从前农民手里所拥有的土地。农民由于免繳地租和免購土地所节省的費用，每年計达 70,000 万金盧布。

社会主义建設最复杂的任务之一，是把落后的小农經济改造为大規模机械化的社会主义农業。农業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則，是由弗·伊·列宁在其合作社計划中所制定的。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領导下，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現了农業的集体化。在苏联，不再是个体小农經济的汪洋大海，而是建立了以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場等制度为形式的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农業生产。由于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社会主义經济制度已經成为苏联农業的唯一形式。

在开展集体化的前夕，即 1927 年，在苏联共有：国营农場 1,400 个，集体农庄 14,800 个，貧农和中农 2,370 万戶，富农 110 万戶。1957 年共有：国营农場 5,800 个，机器拖拉机站 8,000 个，集体农庄 78,900 个；个体农戶大約还有 100,000 戶。

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意味着在这以前在生产資料私有制占优势的农業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出現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集体农庄制度以其全部發展过程，証明了它比涣散的个体小农經济的优越性。

近几年来，党和政府实行了急遽發展农業的巨大措施。以先进技术来裝备农業，开垦千百万公頃的生荒地和熟荒地，配备領导干部和專家来加强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实行新的計划制度，提高农产品收購和采購价格，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們有可能增加谷物的生产并保証畜牧業的高漲。

苏联农業的發展水平已达这种地步，以致党已經提出了在最近几年内要使肉类、乳类和油类按人口計算的生产量赶上美国的任务。这一任务的解决將保証人民福利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农業中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載重汽車总数的增長

（在年初：單位：千架）

播种面积的增長

（單位：100 万公頃）

	1913 年（以現版圖計）	1913 年（以 1939 年 9 月 17 日以前的版圖計）	1928 年	1940 年	1945 年	1953 年	1956 年
总播种面积	118.2	105.0	113.0	150.4	113.8	157.2	194.7
谷类作物	104.6	94.4	92.2	110.5	85.3	106.7	128.3
其中：							
小麦（冬播和春播）	33.0	31.6	27.7	40.3	24.9	48.3	62.0
玉蜀黍粒	2.2	1.3	4.4	3.6	4.2	3.5	9.3
技术作物	4.9	4.5	8.6	11.8	7.7	11.5	13.1
蔬菜瓜类作物及馬鈴薯	5.1	3.8	7.7	10.0	10.6	10.3	11.6
飼料作物	3.3	2.1	3.9	18.1	10.2	28.7	41.7

产品牲畜的总头数

(單位：100 万头)

	在1月1日						在10月1日	
	1916年(以現版圖計)	1928年(以現版圖計)	1941年	1946年	1951年	1953年	1953年	1956年
牛	58.4	66.8	54.5	47.6	57.1	56.6	63.0	70.4
其中：								
奶牛	23.8	33.2	27.8	22.9	24.3	24.3	26.0	30.9
猪	23.0	27.7	27.5	10.6	24.4	28.5	47.6	56.5
綿羊和山羊	96.3	114.6	91.6	70.0	99.0	109.9	135.9	145.7
其中：								
綿羊	89.7	104.2	79.9	58.5	82.6	94.3	114.9	129.9

开垦了3,600万公頃生荒地

在为急遽發展农業而进行的斗爭中，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是最大的措施之一。由于集体农民、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場工作人員忘我劳动的結果，在工人阶級的积極参加之下，已經光荣地完成了共产党和苏維埃政府开垦生荒地的任务。

最近三年內 (1954—1956)，共开垦了3,600万公頃生荒地和熟荒地，这超过欧洲的法国、意大利、西德、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荷蘭、西班牙和瑞典等九个国家谷类作物播种面积的总和。

农業的商品生产

随着农業生产的增長，社会主义农業和畜牧業的商品产品不断地增多。

1956年，谷物的商品产品，比革命前俄国最丰收年的1913年差不多增加了2倍（从136,600万普特增到373,800万普特），其中，小麦增加了4倍(从51,500万普特增到254,900万普特)。

同时期內，甜菜的商品产品几乎增加了2倍(从1,130万吨增到3,150万吨)，馬鈴薯几乎增加了2倍(从610万吨增到1,670万吨)，原棉几乎增加了5倍(从74万吨增到433万吨)，向日葵几乎增加了5倍（从43万吨增到286万吨)，蔬菜几乎增加了5倍（从110万吨增到690万吨)。

同一时期內，各种肉类和油脂的商品产品(以活牲畜的重量計)增加了1倍(从340万吨增到620万吨)，乳类和乳产品(以原乳計)增加了2倍(从700万吨增到2,040万吨)，各种毛类增加了2倍（从77,000吨增到223,000吨)，其中，細毛和半細毛增加了3.7倍(从22,000吨增到103,000吨)。

谷物的国家收購和采購量有了特别多的增長。

由于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結果，近三年来(1954—1956)，谷物的国家收購和采購量的增加情况如下(單位：100万普特)：

	1953年	1956年
国家收購和采購的谷物的总計（不包括代用品）	1,899	3,304
其中在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主要地区：		
在哈薩克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46	984
在烏拉尔和西伯利亞	472	1,119

如果說在开垦生荒地以前，哈薩克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西伯利亞和烏拉尔地区，在最丰收的年份里所交給国家的谷物是6亿普特，那么，1956年在这些地区里所收購粮食就在20亿普特以上，其中，在哈薩克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所收購的谷物最近三年来曾增加了6倍。

肉类、乳类的国家收購和采購量，以及动物油的生产量近三年来(1954—1956)的增加情况如下：

	1953年	1956年
国家的收購和采購量—100万吨：		
肉类(以活牲畜的重量計)	3.7	4.4
乳类	10.6	17.3
动物油的生产量（不包括居民的自产)—千吨	382.0	557.0

1955年，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从交售和出售給国家的农产品中大約获得了340亿盧布，而在1956年所获得的則比1952年多540亿盧布。

苏联国民經济的基本建設投資

社会主义制度使国民經济各个部門都有可能展开巨大的建設工作。苏維埃政权建立以来，苏联国民經济的基本建設投資，以1955年7月1日价格計算，并考慮到从1956年起实施的新的單位造价，計达16,940亿盧布。此外，集体农庄还进行了总額达1,610亿盧布的基本建設投資。

为建立强大的重工業而进行的投資达7,280亿盧布，这占为發展社会主义国民經济而进行的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43%。同时，为發展輕工業、运輸業、农業及其他国民經济部門也投放了巨額的資金。在苏联，已建成了强大的建筑工業和建筑材料工業。

苏維埃政权建立以来，建成、修复并投入生产的有32,000多个大型国营工業企業和大批中小型企業，建立了5,800个国营农場和8,000个机器拖拉机站（不包括被合并到大型机器拖拉机站和新建立的国营农場去的机器拖拉机站），修建了111,000公里的新鉄路綫（包括專用綫），修复了大約65,000公里的鉄路綫。

共产党的意志，苏联人民的英勇劳动，建立起了工業的巨人——馬格尼托戈尔斯克和庫兹涅茨鋼鉄联合企業、哈尔科夫和契利亞賓斯克拖拉机制造厂、烏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列宁第聶伯水电站，等等。战后时期，世界上最大的水力發电站之一——古比雪夫水电站，已开始供給工業用电，列宁伏尔加河—頓河通航运河已經建成，并已开始通航。

現在正在建設中的有：布拉茨克水电站，發电能力为3,600,000瓩，斯大林格勒水电站，發电能力为2,310,000瓩，新西伯利亞水电站，發电能力为400,000瓩，布赫塔尔明斯克水电站，發电能力为435,000瓩，等等。

祖国地圖上的新兴城市

在苏維埃时代，我国城市的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从1913年的666个增至1956年4月为止的1,569个），大批城市型的市鎮建立起来了。

1926年以后，新兴的城市有：卡拉干达、馬格尼托戈尔斯克、阿穆尔共青城、斯大林諾戈尔斯克、埃列克特罗斯大尔、安加拉斯克、諾里尔斯克、馬加丹、巴尔哈什、日古列夫斯克、克拉斯諾烏拉尔斯克、苏姆加伊特、麦德諾戈尔斯克、科特拉-雅尔維、伊加尔卡、新卡霍夫卡、布拉茨克，等等。

人民物質福利的提高

苏联的国民收入

在苏联国民收入的增長是人民物質福利提高的基础。1956年，苏联的国民收入比1913年增加了18.1倍。同时期内，按人口計算的国民收入增加了12倍。国民收入如此快速的增加，是任何一个資本主义国家所沒有过的。例如，美国在这个时期内按人口計算的国民收入增長还到不了1倍，而在英国和法国，則仅增長了0.6倍多一点。

工業和建筑業工人的实际工資（除掉稅款，加上养老金、补助金、免費教育、公費医疗及其他支付和国家优待，并考慮到失業現象的消灭和工作日的縮短），在1956年比1913年增加了3.8倍。

劳动农民从公有农業和个人农業中所得的貨幣收入和实物收入（除掉稅款，并考慮到免費教育、公費医疗、养老金、补助金及其他支付和国家优待），按每一工作者以可比价格計算，1956年比1913年增加了4.4倍，而把为增加公积金和儲备所使用的收入計算在内，則增加了5倍。

劳动权和休息权

苏联公民拥有劳动权，即有权获得有保障的工作，并按其劳动数量和質量取得劳动报酬。

在苏联，到1930年年底为止已經澈底消灭了失業。伴随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不断增長而来的是工人和职員人数的不断增加。工人和职員人数在1957年为5,260万人，即比1913年增加了4,000万人，也就是增加了3倍多。苏維埃政权为妇女积極参加一切国民經济部門創造了条件。

1913年，俄国大工業中工作日的平均时間为9.9小时，而在个别部門則在10小时以上（加班加点还不包括在内）。1956年，苏联工業中工作日的平均时間为7.96小时，而如果把假日前夕工作日的縮短考慮在内，工作日时間則为7.6小时。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議，在第六个五年計划期間，所有企業和机关的工人和职員都要过渡到縮短了的7小时工作日；而从事地下作業的采煤和采矿工業的主要职業的工人，則过渡到了6小时工作日。縮減工作日將在不減少工人和职員工資的情况下进行。

苏联的工人和职員每年都获得保留原薪的休假。1956年，除單日的休息以外，有500万以上的劳动者在疗养院和休养所享受了治疗和休养。

大規模的住宅建筑

共产党和苏維埃政府过去和現在始終对改善苏联人民的居住条件表示巨大的关怀。城市的全部住宅已經从1913年总住宅面积18,000万平方公尺增加到了1956年的66,800万平方公尺。

苏維埃政权建立以来，国家和合作社組織（不包括集体农庄）以及城市居民自費或用国家貸款新建并修建的住宅总面积已达50,700万平方公尺。近十一年来（1946—1956年），集体农庄庄員及农村知識分子新建的住宅有560万所。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長会議“关于發展苏联住宅建筑事業”的决議，規定要进一步增加住宅建筑数量，以便在最近10—12年內消除劳动者住宅方面的不足現象。

苏联住宅建筑的增長*

国家和合作社組織（不包括集体农庄）及城市居民平均每年开工建筑的住宅

（总面积100万平方公尺）

1918—1928年	3.9
1929年—1941年6月战前几个五年計划期間	9.8
从1941年7月1日到1946年1月1日	11.1
第四个五年計划期間	20.6
第五个五年計划期間	30.4
1956年	36.9

* 原系圖表，为便印刷改成現表——譯者。

商品銷售量增多了

苏联劳动者实际收入的增長，使居民的营养显著改善，使工業品（服装、靴鞋等）的消費显著增加。国营和合作社商業出售給居民的重要人民消費品的数量大大增加。

1956年，通过国营和合作社商業出售給居民的肉类产品，比1932年增加了1.9倍，魚类产品——1.1倍，动物油——7.7倍，乳类和乳产品——7.8倍。出售給居民的非食品，特别是絲織品增加了21倍，毛織品——7.1倍，針織品——9.3倍。

养老金和补助金

在苏联，实現了年老及患病和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質保証的权利。苏联的养老金完全是从国家資金和公有資金中撥出来的。現在領取国家养老金的共有1,800万人。根据1956年通过的国家养老金法，个别部分的領取养老金者的养老金数額已經提高了一倍多。

国家支付給居民的，还有下列各种补助金：工人和职員的社会保險补助金，多子女母亲及單身母亲补助金、学生助学金，并且給予公費医疗，給予免費的和优待价格的疗养証和休养証，实施免費教育，等等。1957年，由于从1956年10月1日起养老金标准的提高，各种免費和优待的金額至少增加到了1,920亿盧布。

人民的保健事業

在苏維埃时代，对居民的医疗帮助有了显著的改善。在沙皇俄国，每10,000居民只能攤到一个医生，而目前在苏联，每10,000居民可以攤到17个医生；过去每10,000居民可以攤到13張病床，而現在已經可以攤到70張了（美国在1954年每10,000居民攤到13个医生）。医生的人数（不包括牙医和軍医），从1913年的23,100名增到了1957年的346,000名（估計），而病床数目（不包括軍医院），則从207,300張增到了1,432,000張（估計）。

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殖率

在苏联，人口死亡率是最低的，而人口的自然增殖率却高于絕大多数資本主义国家。如果說沙皇俄国的死亡率相当于美国、英国死亡率的兩倍多，相当于法国的一倍半，那么，現在苏联的死亡率水平則低得多，而人口的自然增殖率，則比这些国家都来得高。

	每1000居民中的出生数	每1000居民中的死亡数	每1000居民中的自然增殖率
苏联	25.0	7.5	17.5
美国	24.9	9.4	15.5
荷蘭	21·2	7.8	13.4
澳大利亞	22.3	9.1	13.2
芬蘭	20.8	9.0	11.8
西班牙	20.7	9.9	10.8
日本	18.4	8.0	10.4
葡萄牙	22.3	12.0	10.3
挪威	18.7	8.5	10.2
丹麦	17.3	8.9	8.4
意国	18.1	10.3	7.8
瑞士	17.5	10.2	7.3
法国	18.3	12.4	5.9
德国	16.3	11.0	5.3
瑞典	14.8	9.6	5.2
英国	16.1	11.7	4.4
比利时	16.8	12.6	4.2
奥地利	16.4	12.3	4.1

苏联人口的总死亡率，比革命前减少了四分之三，而兒童死亡率减少了六分之五。

單是在第五个五年計划期間，苏联人口就由于自然增殖的結果而增加了1,630万人，这超过瑞典、挪威和芬蘭人口总数的总和。

1955—1956年，苏联居民的平均寿命，比革命前俄国的平均寿命提高了1倍多，比1926—1927年苏联居民的寿命提高了一半。

文化成为劳动大众的財富

在苏維埃政权建立以来，苏联在共产党的領导下实現了文化革命，使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內容的苏联各民族的文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革命以前，全国大部分人民是不識字的。根据革命前俄国唯一的人口調查的材料，文盲曾占9岁以上的人

口的76%，而在妇女当中占88%。苏联曾經进行了巨大的扫盲工作。

現在，全国都在实施普及的七年制教育，并广泛实施中等和高等教育。在1956—1957这一学年中，普通教育学校的学生人数，比1914—1915学年增加了2.1倍。同一时期，8—10年級的学生人数，从152,000人增到600万人以上，或者說增加了39倍。在1956—1957这一学年中，参加各种各样学習的人数共达5,040万人。这就是說，現在我們每4个公民当中就有1个人在学習。

如果說在沙皇俄国，小学和其他学校中基本上只是用俄語进行教学，那么，現在我們在学校中正在使用59种語言进行教学。苏維埃政权建立以来，从前沒有文字的40多个民族，第一次获得了自己的文字。

社会主义制度为一切民族的劳动人民打开了接受教育的大門。革命前，在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薩克斯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亞尼美亞和土庫曼，都沒有过高等学校。現在，在这些共和国里，都有了自己的高等学府。

1918—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共培养了380万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專門人材；中等技术学校及其他中等專科学校培养了620万受过中等專門教育的人材。1956年，高等学校的学生人数，比1914年增加了15倍，而中等專科学校的学生增加了36倍。在中等技术学校及其他中等專科学校学生中，女生占52%，高等学校学生中，女生占51%，研究生当中，女生占29%，科学工作者当中，妇女占36%。在苏联，1956年畢業的工程师有71,000人，而在美国，仅有26,000人。

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过程中，培养出了数以百万計的熟練的專家。1913年，在沙皇俄国总共才有200,000个受过高等和中等專門教育的專家。到1956年年底为止，在苏联国民經济中从事工作的、受过高等和中等專門教育的專家达630万人，这比革命前俄国的專家人数差不多增加了32倍。

科学創造的繁荣

随着偉大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的科学开始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苏維埃政权建立以来，从工人和农民的队伍中，有許許多多的科学工作者干部成長起来。共产党和苏維埃政府非常注意于發展科学，提高科学在技术进步和經济与文化建設中的作用。

在苏联，建立了广大的科学机構網。其数目从革命前的289个增加到1957年的2,756个，即增加了8.5倍。科学工作者的人数，到1956年，比1914年增加了22.5倍（从10,200人增到239,900人）。在1939年至1955年期間內，科学工作者的人数增加了1.3倍，其中，基尔吉斯科学工作者的人数已增加了6.8倍，哥薩克科学工作者的人数增加了3.3倍，乌兹别克科学工作者的人数增加了2.4倍，等等。

1956年在科学工作者当中，有9,800人取得了博士学位，有85,700人取得了碩士学位。1956年度畢業的研究生超过了1940年的3.3倍，其中，1956年畢業的非脫产的研究生，比1940年几乎增加了10倍。

在每个加盟共和国都建立了最大的科学中心——科学院，而在摩尔达維亞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了包括几十个科学研究机構的苏联科学院分院。在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設有分布在全国最边远地区的12个苏联科学院分院。

若干資料簡述

★各种圖書館的数目已經从1914年的76,000所增加到1957年的394,000所，而其圖書总数則从4,600万册增加到15亿册。

★許許多多的俱乐部網建立起来了。1956年已有127,000个俱乐部，而在1914年只有237个民間俱乐部。

★苏联博物館的数目已經从1914年的213所增加到1957年年初的849所。1956年，参观博物館的人数达3,300万人以上，而1950年为2,700万人。

★1956年电影設备的数量，比1913年增加了40倍。电影观众的人次，1956年为28亿，比1940年增加了2.2倍。

★1956年，苏联約有3,100万个無綫电点，而1928年是92,000个。無綫电收音机的数目，已經从1928年的70,000个增到1956年的738万个。1956年計有1,324,000个电視机，其中，98,000个是在农村。無綫电广播是用苏联各民族的和外国的80种語言进行的。

★苏維埃政权建立以来，在苏联出現了数以百計的职業剧院。其数目已从1914年的177座增加到1957年年初的512座。苏联的剧院用40多种民族語言进行演出。1956年，剧院观众达7,600万人次，而1948年为5,900万人次，1950年为6,800万人次。

★在苏联，書籍、杂志、报紙及其他定期刊物的出版，已达巨大的規模。从1918年到1956年共出版了書籍130万种，計达190亿册以上。1956年出版的書籍为10亿册以上，即比1913年增加了10.2倍；报紙的一次印数为5,400万份，即比1913年多15倍。苏維埃政权建立以来，苏联出版書籍所使用的苏联各民族的和外国的語言已达124种。

（詹汝嘉譯自1957年10月13日苏联"眞理报"）

讀者来信

对于成本計划完成情况的检查方法的一些意見

林志健

在"中国工業"1955年第11期，"統計工作通訊"1956年第16期，以及"財經研究"創刊号上，华伯泉、陈澤昆、唐庆洪三位同志先后發表了关于工業产品成本計划檢查方法的意見。我覺得：爭論的焦点在加权的权数問題——究竟应当以实际产量来加权，还是以計划产量来加权？如果兩者兼用，則又在什么情况下要采用以計划产量来加权？学習了这三篇文章以后，我談談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看法。希望同志們指正。

討論这个問題，很自然地会联想到会計报表的补充資料上的"計划降低率""計划降低額""实际降低率""实际降低額"。

在單一产品的企業，或是在多种产品的企業而各种产品成本与品种計划的比重相一致的时候，"計划降低率"与"实际降低率"的比較就是計划單位成本与实际單位成本的比較。但是，縱使在这样的企業或这样特定的情况下，"計划降低額"与"实际降低額"的比較，也不見得跟"按計划成本計算数"与"实际数"的比較相一致。例如：某企業計划生产500件，每件比基期降低4元；实际生产700件，每件比基期降低3元。就是說，"实际降低額"比"計划降低額"多100元。在这个例子里，只有在采用可变組成指数$\left(\frac{\sum q_1p_1}{\sum q_np_n}\right)$的时候，才会被認为是完成了計划。無論采用那一种固定組成指数$\left(\frac{\sum q_np_1}{\sum q_np_n}\text{或}\frac{\sum q_1p_1}{\sum q_1p_n}\right)$来計算，都是認为沒有完成計划。

但是，在多种产品的企業，实际品种与計划品种完全一致，或是它們之間的比例保持一点不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在檢查成本計划的完成情况的方法上，产生了"按計划产量加权"还是"按实际产量加权"的問題。

巴克拉諾夫同志曾經举出过这么一个突出的例子：

产品种类	产量(件)		产品單位成本(盧布)		計划产量的总成本(盧布)		实际产量的总成本(盧布)	
	計划 q_n	实际 q_1	計划 p_n	实际 p_1	按計划成本計算 q_np_n	按实际成本計算 q_np_1	按計划成本計算 q_1p_n	按实际成本計算 q_1p_1
甲	600	300	10	12	6,000	7,200	3,000	3,600
乙	400	800	5	4	2,000	1,600	4,000	3,200
合計	—	—	—	—	8,000	8,800	7,000	6,800

本例中，如果以計划产量为同度量系数，得出

$$\frac{\sum q_np_1}{\sum q_np_n}=\frac{8800}{8000}=110\%,$$

即产品成本比計划超支10%。如果以实际产量为同度量系数，得出

$$\frac{\sum q_1p_1}{\sum q_1p_n}=\frac{6800}{7000}=97.14\%。$$

即产品成本比計划降低2.86%。

虽然从公式的演变上来說：$\frac{\sum q_1p_1}{\sum q_1p_0}=\frac{\sum q_np_n}{\sum q_np_0}$，既可以化为$\frac{\sum q_np_1}{\sum q_np_n}$，又可以化成$\frac{\sum q_1p_1}{\sum q_1p_n}$。(見"財經研究"創刊号，59頁)。本例中品种脫离計划的程度是十分惊人的。但我認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認为像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按計划产量来加权。而应当根据該企業該期造成品种脫离計划的具体情况，再决定用那一种作为权数。

造成实际品种脫离計划有兩种可能：一是由于产供銷失却平衡或是技术上的原因改变了品种計划，因而造成單位成本的显著增高或降低(其中，成本增高的可能性較大)。巴克拉諾夫同志的这个例子，如果是由于产供銷失却平衡而引起的話，甲产品比計划压縮了一半，而乙产品比計划增产了一倍。可以設想：一定需要改裝机器，調整劳动組織(包括改变工种)等一系列的措施。这就必然造成甲产品的成本超支；而乙产品必須等到全部改裝、調整完畢才能發揮潜力。像这样的情况，产品單位成本的变动是由于非企業所掌握的外来因素而改变品种計划所引起的。所以对它的成本計划完成情况进行評价的时候，就不应当以計划产量来加权。

品种脫离計划的另一种可能，就是企業有意識地破坏品种計划。凡是屬于这一类的情况，我認为必須以計划产量来加权，才能剔除品种变动的人为因素。在产品的成本中变动支出占較大的比重的时候，在改变产品的品种不需要对机器設备、劳动組織进行重大的变动的时候，这种情况可能發生。企業的財会人員与主管机構，主

管部門的財会人員应該勇敢地站在“国家監督員”的立場，負起責任来揭發这种投机取巧的欺騙性行为。

总而言之：在檢查成本計划的完成情况的时候，究竟应当用計划产量来加权还是用实际产量来加权？这不仅是指数方法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应当看作这是監督企業生产財务的一种重要手段。先判明企業品种脫离計划的原因，然后才能决定应当采用的計算方法——是采用 $\frac{\sum q_n p_1}{\sum q_n p_n}$ 还是 $\frac{\sum q_1 p_1}{\sum q_1 p_n}$？

（上接第 18 頁）

用心正是在于恐吓工商業者，挑撥国家与工商業者之間的关系，模糊工商業者对自己的正确估价，以达到进一步破坏工商業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而决不是什么为了“充分的發揮他們的积極性”！說中国民族資产阶級有兩面性（这个兩面性構成对我国的資本主义工商業进行和平改造的根据），正是从中国民族資产阶級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出發，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情况相結合的典型實范例；因时因地的灵活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倒成了“教条主义”，这恐怕只能說明章乃器是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实际上却在反对馬克思主义，偷运着修正主义的私貨，而不能說明什么其他的問題了！

其次，我們認为資产阶級作为一个阶級来說是不能改造的，而是必須被消灭的；但作为資产阶級分子，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却是可以通过劳动实踐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但是，这不等于說“阶級本質与人的阶級特性是有所不同的。”因为，資产阶級是全部資产阶級分子所構成的有机整体，資产阶級的剝削本質正是通过每一个資产阶級分子而得到体現，世界上任何資产阶級的本質都是剝削成性的，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个資本家是不剝削工人的，因此，阶級本質与人的阶級特性不是有所不同而是密切相关的。脫离了資产阶級的阶級本質而奢談所謂資产阶級分子的阶級特性將是抽象的；而实質上就是否定了人的阶級性，把任何一个人都看成是抽象的、自然的人。因为，人們生活在世界上，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总要屬于一定的阶級，而且，阶級烙印不是“只能盖在皮膚上”而是必然要深入到“骨子”里去的。右派分子章乃器从历史上一直發展到反右派斗爭以前的一系列的罪惡活动，特别是在反右派斗爭中經过了各式各样的、無数次的帮助而仍死抱住資产阶級的立場不放，不正是說明資产阶級的阶級烙印不是盖在章乃器的皮膚上而是深入到他的骨子里去了的明証么？

最后，我們認識到在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都需要改造，剝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但是，对剝削者的改造与对劳动者的改造却有着本質上的不同。对資产阶級分子的改造就是对他們阶級特性的改造，要改造掉他們消極性的一面，逐漸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对工人阶級来說，只不过是整頓其队伍中成員的非工人阶級的思想与作風（而这种旧思想、旧作風主要是受旧社会的影响和資产阶級思想的侵蝕所致），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取得不断的进步。同时不仅是資产阶級与工人阶級有着本質上的区别；而且資产阶級分子与工人阶級分子也有着本質上的区别。因为，在工人阶級队伍中，沒有一个人願意走資本主义道路，使自己再陷身到被剝削的雇佣奴隶的地位；而資产阶級分子却不同，其中的極大部分人仍然留恋資本主义，沒有放弃資本主义立場，动摇于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因此，工人阶級与資产阶級之間的本質差别就在于被剝削与剝削的差别（不是如章乃器所說的“工人阶級是不剝削或反剝削的，”而“資产阶級是剝削的”所謂“本質”差别），是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的差别，而不是什么先进与落后的差别。章乃器硬是把工人阶級与資产阶級說成是先进与落后的程度上的差别，把資产阶級輕描淡写地說成只不过比其他阶級稍多了一些消極性；不仅如此，甚至按照章乃器的說法，似乎資产阶級比工人阶級还要“高明”一些，因为，他們不是赤手空拳喊口号进社会主义的，而是帶着“礼物”进社会主义的。当然，这样一来，首先就說明資产阶級分子就不必进行什么本質的改造了，因为，他們只不过消極性稍多一些吧了！要改造，工人阶級分子也要改造，只不过資产阶級分子要在程度上多改造一些而已！从而，就一笔抹杀資产阶級分子接受脫胎換骨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其次，既然工人阶級与資产阶級沒有什么本質上的不同而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当然也就談不上什么工人阶級的領导了。資产阶級分子有技术，有管理企業的經驗，（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应讀作有剝削工人的經驗。）是国家的財富，（这只有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徹底改变自己的資产阶級立場的条件下才談得到。）何况他們又是帶着“礼物”来的，不言而喻，当然应該是由資产阶級来領导了。章乃器硬是說这“并不会混淆領导与被領导的界限，”然而，他的“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解釋，却是欲盖弥彰地暴露了他的惡毒的企圖。此無他：無非是要抹杀工人阶級与資产阶級本質差别，从而达到篡夺工人阶級的領导权，反对資产阶級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已！

1857 年 11 月 6 日

甲

十七

財經科學

于1957年5月創刊，截至現在已出版了三期，各期目录如下：

第一期

原子能利用上的兩条路綫……刘詩白
我国对資本主义工商業和平改造政策的客观依据……譚維、肖天南、崔国华
鴉片战爭前夕中国財政制度……湯象龙
中国工業分布原則的政治經济意义……蔡家彪
貿易中的价格政策……溫嗣芳
关于制定农業生产合作社工作定額与劳动报酬計算标准的研究……刘秋篁
农村金融工作与农業合作化……梅远謀

第二期

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积累的若干問題……雷起荃
四川地方工業的發展情况及其今后發展方向的意見……吳岐山
关于財政学的对象問題……許廷星
論我国过渡时期貨幣的本質与职能……何高著
試論劳动生产率指数的性質与指数公式的选擇……刘心銓
編制工業劳动生产率指数的一般方法論問題……何国坚
論劳动生产率指数体系……高成庄
解放以来涼山彝族自治州的民族貿易…馮肇伯

第三期

論科学事業的兩条道路……湯象龍
費孝通到底是誰的代言人——批判右派分子費孝通关于中国农村經济問題的謬論……刘詩白
讓我們高举起馬列主义眞理的大旗为粉碎資产阶級反动經济理論而斗爭……雷起荃
关于价值規律在农業生产合作社(高級社)中的作用問題……吳忠观
四十年来苏联社会主义工業管理組織形式及領导方法的产生及發展……程明鑑
中国民族資本主义近代工業的产生……李运元
关于农業生产合作社产品分配的兩个問題——資料耗費的补償問題，产品分配的原則和比例……王叔云
"劳动生产率倒指标"在劳动生产率动态分析中的应用問題——兼評高成庄，刘心銓，何国坚三位同志关于这个問題的若干論点……陈宗潞
对云南怒江傈僳族社会性質的初步探討……楊曉航

訂閱办法： 1. 每本定价七角，每三月出版一期，1958年度已开始訂閱，希讀者从速办理手續。

2. 訂閱地点：成都市四川財經学院学报編輯委員会。

每册四角

全国各地邮电局發行

（代号4—37）